



2009年第4期（总第19期）

本期导读

冬日的惊喜，不仅因为春节临近，还有意外的发现呢！“苏门四学士”之一张耒《春日》诗曰：“残雪暗随冰笋滴，新春偷向柳梢归。”在天寒地冻、冰雪消融、寒气袭人之际，春天偷偷地悄悄地暗暗地从柳条上回来了呢！你发现了吗？或许竹外桃花、春江水暖也会与你不期而遇的。在与文本对话的过程中，你发现了什么呢？

著名苏学专家孔凡礼先生的《苏轼与李唐》、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曾枣庄教授的《〈苏轼为官之道〉序》，在娓娓道来的评说中你会感受到他们开阔的视野、从容的气度、雄浑的气象和大家的风范。

杭州的一组文章，你将感受到苏轼流动的生命经验与空间对话，所表现出来的强大的生命力，如此丰富、平静与温暖。杭州的美景、丰饶、和宜的气候变成他们生命中永恒“家”的原型。从杭州政绩可见苏轼“以民为本”的核心价值观，他堪称古代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典范。

黄州的一组文章，探赜索隐苏轼一举登极峰的原因，由此反观自我，你可以学习：面对人生的悲欢离合，如何调适心情？遭遇磨难和穷困，如何施展抱负？“苏轼家族与二十七、二十八的难解之缘”饶有趣味，发人深省。

“清风两袖何惆怅，意足东坡伴此生。”苏学专家韩国强的事迹让人感动不已，而史钩的《苏东坡这个人》让我们再次见识“无厘头”如何解构传统、大煞风景。

蘇 軾

2009年第4期(总第19期)

研究 SUSHIYANJIU



目 录

□编辑出版:《苏轼研究》编辑部
□主办单位:中国苏轼研究学会
□协办单位:四川省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
 四川省眉山三苏祠博物馆
□主 编:张志烈
□执行主编:周成仕
□副 主 编:宋明刚 蔡心华
□责任编辑:刘清泉
□编 辑:唐雅兰
□特邀编辑:孙开中

地址: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三苏纪念馆三楼
邮编:620010 电话:(0833)8299103
[Http://www.3swh.com](http://www.3swh.com)
E-mail:sushiyanjiu@163.com
准印证:四川省刊型内部准印证
 (2006)第03-007号
设计:上观设计
印刷:四川省南方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9年12月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苏学论坛

- 苏轼与李廌 孔凡礼/4
苏轼与王适 谢飞/11
流动的生命经验与空间对话(台湾)张蜀蕙/14
——从苏轼“历杭”作品看其南方意识的形成
苏东坡主政杭州面面观 乔建功/21
苏颂、苏轼任职杭州科技政绩之考述 邹彦群/25
何能一举登极峰 涂普生 张龙飞/30
人生道路的转折 郭杏芳 刘红星/33
——谈苏轼对黄州团练副使角色的适应
是巧合还是天意 王琳祥/37
三苏父子的出生地——眉山市纱縠行 何家治/41
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高纯林/46
——读史钩《苏东坡这个人》
论苏轼的酒诗创作及其原因 李靓/51
沈祖棻著《东坡与词乐》解读 刘成志/56
竹韵与高洁——读苏东坡诗词文札记 杨逢春/58

□顾问：蒋仁富 李 静 苏 灿
(以下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兴荣 孔凡礼 王水照
刘乃昌 朱清华 刘尚荣
邱俊鹏 周先慎 曾枣庄

□编委：(以下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影聪 王晋川 方永江
刘川眉 孙开中 苏 灿
陈 弼 李显平 宋明刚
何家治 张志烈 张忠全
杨胜宽 杨常沙 周成仕
周裕锴 蔡心华

□苏帖鉴赏

浅析《秦邮帖》拓本 万 波/60
读《黄州寒食诗帖》的体会 翁寒春/61

□新书序评

《苏轼为官之道》序 曾枣庄/62

□苏学专家

苏海畅游情甚笃 王诗波 王 霞/65
——记知名苏东坡研究者韩国强

□研究史话

日本苏轼研究述略(一) 池泽兹子/67

□景苏札记

苏东坡的政治人生(二、三) 雷金贵/70
翁寒春/61

□本期关注

刘小川《品中国文人》获两项大奖 张炜等/77
巴金文学院第六届茅台文学奖授奖词·上海文艺出版社给刘小川的贺信·青春的激情和力量——评刘小川《品中国文人》·刘小川获奖感言

□苏学动态

儋州将举办东坡国际文化节 流 水/80
杨明照诞辰百年学术研讨会召开 任 俊/80
黄冈市东坡文化研究会成立 白 水/80

苏轼与李廌

孔凡礼

内容提要：作者以翔实的史料考证了苏轼与李廌在熙宁、元丰、元祐、绍圣和崇宁时期的交往，由此可见，苏轼对李廌特别深切的关爱和李廌对苏轼特别深厚的感情。

关键词：苏轼 李廌 交往

李廌的父亲名惇，字宪仲。嘉祐二年（1057）进士，与苏轼为同年。《苏轼诗集》（以下简称《诗集》）卷二五有《哀词》，次元丰八年（1085）。据《宋史》卷四四四《李廌传》，廌六岁而孤。据宋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四，廌生于己亥（嘉祐四年，1059），知惇卒于英宗治平元年（1064）。也许因为这个缘故，李廌受到苏轼特别的关爱。

廌字方叔，祖上由郓州徙华州（今陕西华县）。自号太华逸民（周紫芝《太仓稊米集》卷六七《书月岩集后》）。廌所撰《济南先生师友谈记》（以下简称《师友谈记》）宋咸淳刊本第一叶第二行即署“太华逸氏溢超旷文子李廌方叔”，当为廌自署。其“济南先生”，亦当为廌之自号（并采宋谢采伯《密斋笔记》卷三）。又自称“陇西匹夫”，见廌所撰《济南集》卷三《题郭功甫诗卷》）“太华逸民”、“关西匹夫”，显示其不忘本。中年以后居颍昌阳翟（今河南禹县）。

一 熙宁时期

《宋史》廌本传说廌父亲死后“能自奋立，少长，以学向称乡里”。廌所撰《济南集》已佚，今传本乃《永乐大典》辑本，不过寥寥八卷。其少年时作品，可以肯定写作时间者，唯作于熙宁

十年（1077）十九岁时的《题郭功甫（1035-1113）诗卷》。此诗洋洋洒洒一百二十句，纵论当时诗坛。诗云：

盛朝能诗可屈指，少师、仆射、苏与梅。
少师新为地下客，苏、梅骨化成尘埃。
金陵仆射今已老，班班丝雪侵颐腮。
当今儒生迂此道，如使杞柳为棬杯。

少师乃欧阳修，卒于熙宁五年。苏谓舜钦，梅谓尧臣，已早卒。金陵仆射谓王安石，时年已五十七岁。“杞柳”、“棬杯”出《孟子·告子》上。“杞柳”，木名。枝条韧，可编制箱框等器物。“杯棬”，谓盘盂之类。“当今”二句谓当代读书人只知道读经书求得一第，于作诗一道以为迂阔不合实际，急需加以引导，使他们在诗坛中发挥作用。

那么，诗坛的希望在哪里呢？作者接着写道：

好古爱诗惟有君，独使笔力惊风雷。
清音绕齿嚼鸣玉，烂光满纸如琼瑰。
古原夜烛光夺月，立使万物有灰煤。
清泉漱石白凿凿，湍落急瀨成渊洄。
才雄句险骇人胆，九月秋水滟滪堆。
有时清贞叩玄关，至诚直可歛郊谋。

郭功甫乃祥正之字。李廌热烈、真诚地希望郭祥正继欧阳修之后为诗坛盟主，把领导诗坛的责任担当起来，自己早已做好准备，愿在他的领导下尽一份力。他写道：

非君鼓吹力主持，是道不世将倾颓。
关西鄙夫怀此愤，白石空炼如女娲。

“是道”即为诗道。上面已说“关西鄙夫”是作者的自称。作者运用女娲炼石补天的故事，表明决心之大。

李廌说郭诗“才雄”，乃当时的公论。梅尧臣盛称郭为“天才”，“真太白后身”（《宋史》卷四四四郭传）、释契嵩称其“天才逸发”（《镡津文集》卷一三《送郭公甫朝奉诗叙》），王安石称其诗“豪迈精绝”（《永乐大典》卷七八九二引《临汀志·郭祥正传》），曾巩谓其诗“天才超逸”（《宾退录》卷六）。

李廌谓郭诗“句险”，“句险”乃由“才雄”而来。读廌之诗，亦可谓“才雄句险”。可见郭诗对他的影响之深。

李廌此诗，表现出自己的独立见解，值得重视。这种见解，在当时估计有一些代表性，也可以说是当时一部分年轻诗人的共同想法，可以看作是一种思潮。

这种现象，对研究苏轼和苏轼诗的影响，很有意义。过去似乎没有注意到。李廌虽然有父亲和苏轼是同年这种特殊关系，但他在熙宁期间，没有认可苏轼在诗坛中应有的地位，至少是没有完全认可。苏轼在诗坛中领导地位的确立，开始于元丰时期，奠定于元祐时期。因为说到苏轼与李廌的交往，顺便把这个问题说一说。

二 元丰时期

《宋史·李廌传》：

谒苏轼于黄州，贽文求知。轼谓其笔墨澜翻，有飞沙走石之势，拊其背曰：“子之才，万人敌也，抗之以高节，莫之能御矣。”廌再拜受教。而家素贫，三世未葬，一夕，抚枕流涕曰：“吾忠孝焉学，而丧未葬，何以学为！”旦而别轼，将客游四方，以蒇其事。轼解衣为助，又作诗以劝风义者。

这是研究李廌的第一手资料，但核以《苏轼文集》（以下简称《文集》）、《诗集》，事实有错位之处。

“笔势澜翻”云云，乃《文集》卷五五与李昭王（成季）简中语，拙撰《苏轼年谱》（以下简称《年谱》）系于元丰五年。“三世未葬”、“解衣为助”、“作诗”云云，参见《诗集》卷二五《李宪仲哀词》，文字有不同，如“轼解衣为助”，《诗集》则作“以绢十匹丝百两为赆”。此诗作于元丰八年。《李廌传》乃综合李廌与苏轼交往事加以叙

述。《传》所云“轼……拊其背曰”云云、“一夕抚枕流涕曰”云云，《文集》、《诗集》皆未记载，然极可信为事实，乃其价值所在。《传》所云当据廌之《墓铭》及《行状》。

《文集》卷四九《答李琼书》，作于元丰四年；书中云及“恶热不可过”。《文集》卷五三答廌第一简云及“今岁暑毒十倍常年”，知亦作于元丰四年。此简首云“久不奉书问为愧，”知此前李廌与苏轼已有文字交往。云“久”，知李廌与苏轼文字交往，当在苏轼到黄州之初，约可定为元丰三年。苏轼答廌第二简，言及秋试，祝鼎甲之捷。作于“署名”秋试即解试。解试得中，元丰五年即可参加礼部试。知轼此简亦作于元丰四年。苏轼答李廌第三简亦云及秋试，并云及侄婿王适（子立）“往彭城取解，或场屋相见”，知廌秋试亦在彭城（徐州），此简亦作于元丰四年。

《文集》卷四九《答李方叔书》云及：“别后递中得二书，皆未果答。专人来，又辱长笺，且审比日孝履无恙，感慰深矣。”末云“冬寒”，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别后”。以上所引苏轼答李廌简，未云及“别后”，知李廌与苏轼相见约在元丰五年之春。李廌别苏轼后，接连给苏轼写了两封书简，轼“皆未果答”，大约廌简的内容并不是非常重要，直到“专人来辱长笺，”才知廌新持丧，故很快复简，简中有“孝履”云云，劝李廌“节哀”之语。也隐约知道元丰四年李廌的秋试并不顺利，因为如果顺利，元丰五年春初李廌就到汴京去应礼部试了。廌持丧大约是夏秋间事。

苏轼此书，对李廌关怀备至。苏轼肯定李廌的“古赋近诗，词气卓越，意趣不凡”，观今传廌作，轼并无溢美之处。苏轼深知李廌创作正处于旺盛时期，需要在肯定同时，指出其不足之处，这就是“微伤冗”，这也是很自然的现象，一个具有丰富创作潜能的作者，在其创作初期，往往才思喷发，想控制也控制不了。苏轼认为，不能勉强以强制的手段控制，而是在一定时间内任其发挥，然后“稍收敛之”。这也就是下面苏轼针对李廌实际所深刻指出的：“足下之文，正如川之方增，当极其所至，霜见水落，自见涯涘。”这自然是苏轼创作经验的总结，也指出李廌在创作过程中应不断提高发现创作中问题的能力，不断提高，“自见涯涘”，包含了作者主观努力。

苏轼在答书中，拒绝了李廌两项请求。用词

十分委婉，而立意极为严正。李廌受孙之翰之托，欲苏轼书其《唐论》入石。苏轼以为，文章之传于世与否，决定因素在文章自身品位，此其一。其二，李廌既然代人请求书其文字，自然对苏轼为人与书法有一番称誉的话。苏轼指出：“近日士大夫皆有僭侈无涯之心，动辄欲人以周、孔誉己，自孟軻以下者，皆怃然不满也。此风殆不可长。”这里，实际是批评李廌沾染了这种不好的习气，指出其如何做人。李廌在来书中说家中有丧未葬，欲求名世之士为志墓之文。其意盖欲求苏轼为志文。苏轼以为未葬“于礼未安”，首要在葬，也就拒绝了李廌的请求。《文集》卷五三与廌第八简，云及“近日与温公行状书墓志”，知作于元祐元年或二年，知李廌明确请求苏轼为其已故亲人作墓铭，苏轼以“从来”“不书不作铭”的一贯作风为辞，没有应其请，这里顺便说一下。

接着上面的苏轼《与李方叔书》叙述。《文集》卷五三与廌第四简首云廌“辱书累数百言”。廌简大约作于苏轼《与李方叔书》后，其时约为元丰六年。简云“承持制良苦”，大约李廌家中又遭到了不幸，与苏轼《与李方叔书》所云“孝履”不同。简云“便欲走诣，而自谪官以来，不复与往还庆吊”，不便去，于是“谨遣小儿问左右”，表示哀悼、安慰之意，益可证李廌家中有新丧。此小儿乃苏迈，其时迈已二十五岁，可以代替父亲去办一些事。李廌此时当住在阳翟，因为阳翟去黄州还不算很远，如果此时李廌仍在华州，那就显得远了一点，苏轼未必放心。

据拙撰《苏轼年谱》，元丰八年三月间，苏轼在南都（今河南商丘），李廌自阳翟来见。这是二人第二次见面。苏轼作廌父惇（宪仲）哀词。其时李廌因为饥寒，“四丧未举”（本文此前云及苏轼劝李廌葬亲，大约因为家庭困难，没有办），苏轼乃以老朋友梁先所赠绢十匹、丝十两赠之，并作此哀词告知李廌及其父惇的友人“解衣助孝子”。足见苏轼对李廌的深切关怀。

李廌《济南集》卷三《以古画观音易眉子石砚歌》首云“畴昔翰林苏谪仙，溪藤写赠眉石篇”自注：“先生顷于南京，尝写此篇赠廌。”即为此时事。《眉子石砚歌》见《诗集》卷二四。

三 元祐时期

李廌在南都告别苏轼，回到了阳翟，大约不久，归葬了累世之丧，这大约是元祐元年的事。《文集》与廌第九简云及“承遂举十丧，哀劳极矣，此古人之事，复见于君”，当作于元祐元年。《宋史·李廌传》云廌“尽致累世之丧三十余柩，归寗华山下，范镇为表墓以美之”，可见苏轼所云“哀劳极矣”乃实际情况。

元丰八年末，苏轼回京师任职，自是至元祐四年四月离京师赴知杭州任前，李廌与苏轼的交往多了起来，因为阳翟离京师不远。《宋史·李廌传》说他举丧后，“益闭门读书。又数年，再见轼，轼阅其所著，叹曰：‘张耒、秦观之流也。’”这里的叙述，时间仍有错位，详考《文集》、《诗集》及李廌作品，苏轼称赞他为“张耒、秦观之流”，可能为今年举丧后事。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七元祐元年九月丁卯（十二日）纪事，苏轼以试中书舍人为翰林学士、知制诰。《济南集》卷五《金銮赋》，即为贺苏轼而作。赋盛赞苏轼：“惟超然之先生（按：苏轼知密州时，作超然台，故以超然先生称之）兮，冠百世而称杰。操忠而秉哲，执义而全节。文章鲜丽于古今，德行争光于日月。”这可以看作是天下读书人的公论。虽然苏轼说此赋“过相粉饰，深非所望”（《文集》卷五三与廌第十一简），那是出于谦逊和严格律己。李廌其时即在京师。

元祐元年十二月十九日，苏轼五十一岁初度。《济南集》卷四《上翰林眉山先生苏公》诗，即为贺苏轼生辰而作。诗云：“佑圣生贤佐，天心在抚民。昌期膺治运，谷且降元臣。”又云：“咸知帝责说，复请岳生申。”知为贺生辰作。诗云：“视草金銮殿，登庸凤诏春。”切轼为翰林学士。细读廌之赋和诗，可以感受到李廌对苏轼发自内心的景仰和崇拜，决不是应景之作。在苏轼的众多交游中，贺任翰林学士赋与贺生日诗（特别是后者），流传者仅此。这一点，值得研究者注意。拙撰《苏轼年谱》、《三苏年谱》系廌诗于元祐元年九月，不当，特在这里更正。

李廌《师友谈记》云：

廌少时有好名急进之弊，献书公车者三，多触闻罢，然其志不已，复多游巨公之门。自丙寅年，东坡尝诲之，曰：“如子之才，自当不没，要当循分，不可躁求，王分之门何

必时曳裾也。”尔后常以为戒。

丙寅乃元祐元年。苏轼教诲李膺之语，详《文集》卷四九《与李方叔书》。此书云及《(鲜于)子骏行状》。(按：其文见秦观《淮海集》卷三六。)据苏轼《与李方叔书》，乃李膺撰，知为膺代秦观而作。据《行状》，鲜于侁(子骏)卒于元祐二年五月二十日，知苏轼与膺书即作于元祐二年(可参拙撰《年谱》)。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一元丰八年十一月丁酉注文亦谓侁《行状》为膺作。

《与李方叔书》显示出苏轼作为一位文学导师对具有极大潜能的青年作者提携的大家风范。他指出李膺《兵鉴》一文“未甚有得于中而张其外，所以‘读之终篇，莫知所谓’”(按：《宋史·李膺传》谓元祐中献《兵鉴》于朝，此所献者，当经过膺之修订)。意思是说，李膺对所论问题的了解没有达到精深的程度，甚至可以说没有达到一定的深度，论点不明确；还有，对所论问题的有关材料掌握不够，论据不充分。给人的印象是虚张声势，夸夸其谈。苏轼严肃地指出，一个作者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德”(道德、品质)有问题。因为苏轼深知，李膺写这类文章，是想显示出自己的才华，扩大和提高自己的声誉。苏轼为什么把问题提到“德”的高度，是因为李膺这样做是对读者、对社会不负责任；也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也就是苏轼在本书中另一外所指出的不“自重”。对于一个青年作者作品中的问题，苏轼这样明确地指出，除李膺以外，没有第二人。足见对李膺爱护之殷。苏轼的深意是希望李膺“积学不倦，落其华而成其实”，希望李膺为“礼义君子”，不要成为“丰于才而廉于德”的人。苏轼反复强调提高“道德”素养。今天犹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苏轼对李膺教诲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李膺在《师友谈记》中已提到了。在《与李方叔书》中，苏轼盛誉陈师道(履常)“居都下逾年，未尝一至贵人之门，章子厚欲一见，终不可得，”欲李膺立身行事，以陈师道为法。

苏轼在坦诚指出李膺作品中的问题同时，盛情地赞扬李膺在创作中显示出卓越的才华：

《永乐大典》卷二二五三七引膺《济南月岩集》转引李之仪(端叔)《济南月岩集序》：

“吾宗方叔，初未相识，得其文于东坡老人之座。读之如泛长江，溯秋月，直欲掣云上

汉，不知其千万里之远也。为之愕眙久之，而不能释月。东坡笑相谓曰：‘子何谛观之不舍耶？斯文足以使人如是。谢安蹈海，至于风涛荡滴而不知返，徐问舟人曰：去将何之？子岂涉是境界以追谢公乎？’又曰：‘吾尝评斯文如大川湍注，昼夜不息，不至于海不止。’余曰：‘不腆所得亦几然。’东坡曰：‘闻之欧阳文忠公曰：“文章如金玉，固有定价，不能异人之目也。”’已而曰：‘或者患其多，子颇觉乎？’余曰：‘觉则殆矣，惟其不觉其殆，所以为斯文也。’”

……

《大观录》卷五《苏长公与李方叔诗卷》吴泳跋文：“昔李端(按：原作‘方’，误，今正)叔见月岩之文于东坡坐上，谛观不舍，公笑谓曰：“谢安蹈海，至风涛荡覆而不知返，子岂涉是境界而欲追谢公也。”公于方叔，固雅所推重也。既典礼部，乃失之。

据《大观录》，知苏轼与与李之仪论李膺创作，在元祐三年苏轼典礼部前，与苏轼作《与李方叔书》时间相近。

上面引录的李之仪评论李膺作品的文字，其本身就是绝妙的艺术作品。这里写到了读李膺作品的两种境界。一种是驾一叶之扁舟，在月夜中，在水波不兴的大江上漫游，高秋的明月，显得格外清澈，不知不觉间，跟着明月，驾着浮云，来到了天上，完全忘记了自己到底走了多少路。一种是航行在浩瀚无际的大海中，起始风平浪静，一会儿，狂风大作，汹涌浪涛，所乘的船忽高忽下，随时都可能倾覆，然而乘客好像没有看到这一切，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完全沉浸在作品中(参看《晋书》卷七九《谢安传》)。前者是平静的境界，后者是惊险的境界。无论是平静中，或者惊险中，李膺的作品为什么有这么强烈的吸引力？在这方面，苏轼与李之仪有同感。这就说明，苏轼的评价，不是出偏爱，而是合乎客观实际的公论。苏轼发自内心地赞美李膺超出寻常人的创作才华。一个伟大的作家，从来就是全面热忱地关怀新进青年作者的。

这里附带说一下，李之仪所作序谓《济南月岩集》乃膺之子颖所编。陈振孙《直齐书录解题》卷二〇卷，谓《济南集》又号《月岩集》，又著录《苏门六君子集》，其中收有《济南集》二〇卷。

《永乐大典》卷二二五三〇《笔记》谓《月岩集》

“蜀中有极小字本，又有中字本。”前面提到的南宋初周紫芝所著《书月岩集后》，成于妙香寮，虽不详所借为何本，然可以肯定，《月岩集》在南宋流传尚广。今所传《永乐大典》辑本，才八卷。

上面已经说到，元祐三年，苏轼典礼部即知贡举。对李廌来说，这是一个机遇。然而，其结果却出苏轼意外。李廌竟名落孙山。《诗集》卷三〇有《余与李廌方叔久矣，领贡举事而李不得第，愧甚，作诗送之》中“平生漫说古战场，过眼终迷日五色”之句。后者出《唐摭言》谓唐代有人应试，试题为《日有五色赋》，其文之破题为“德动天鉴，祥开日华”然其人竟榜上无名。有人为此不平，去问主文（主考官），主文说这个破题非常好，“非状元不可”，那人说这样，您可失去了真才了。苏轼的意思是，自己平生经历了不少考场（“战场”即谓考场），多次担任过地方考试的考官，然而这一次眼睛花了却没有看清楚，失去了李廌这样的真才，表示出深刻的自责。

为李廌不平的大有人在，《宋史·李廌传》就说后位至宰辅的吕大防感叹此次礼部试竟“失此奇才”。现存宋人笔记及诗话至少有五种记载李廌有关落第轶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一〇、赵彊父《养疴漫笔》谓李廌的老乳母七十岁因廌落第自缢死，罗大经《鹤林玉露》甲编卷五《李方叔》谓李廌的老母亲也以此抑郁而卒。传闻也多多少少有一些失实之处，但其可能性是充分存在的。她们对苏轼的希望值过高，对李廌的希望值过高，一旦失望，转不过弯来，就走向极端。这样事情，过去有，现在更不少见。这个事实说明不少人因为李廌落第内心存在着不平衡。当然，也有的笔记如叶梦得《石林诗话》竟说李廌因为落第书责苏轼“不荐己”，轼“后稍薄之”。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李廌对苏轼一直感激不已，苏轼对李廌更是关怀倍切。

那么，李廌的落第原因何在呢？苏轼在送廌诗中，有“青袍白纻五千人”之句，谓参加此次礼部试的人为五千人，考以史料，实际人数为四千七百三十二人，五千乃举成数。这么多人应试，这么多试卷，都得分给考官分头去看。考官们的修养、功底各不相同，鉴赏标准不同，一份试卷，有人认为可入甲等，有人却认为只能入乙等或丙等。真才也就这样被埋没了。这只能用“时运不

齐，命途多舛”来解释。

不过，从另一方面看，李廌的落第，恰恰说明由苏轼担任主考官的这次礼部试是十分公正的。《诗集》注文引南宋魏了翁《跋苏文忠墨迹》，盛赞苏轼送李廌诗所云“愧甚”，乃“终不以一时之愧，易万世之所甚愧”，乃“先生行己之大方”。可谓光明磊落。

李廌落第后，决定回到阳翟去，苏轼总觉得心里过意不去，约他离京师前“夜话为别”（《文集》卷五三答廌第十五简），其时约在四月初、中旬。话别以后，还是觉得对不起李廌。据《宋史·李廌传》，苏轼与范祖禹商量，说：“廌虽在山林，其文有锦衣玉食气，弃奇宝于路隅，昔人所叹，我曹得无意哉。”准备联名向朝廷推荐，但不久二人相继离开京师，此事也就作罢（据《宋史·李廌传》）

然而，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三〇却说苏轼荐了：李方叔如许，东坡也荐他。朱熹生活的年代远远早于《宋史》的编纂者，更可信。苏轼虽然荐了，但没有结果。朱熹对李廌印象不好，大约是因为元祐以前李廌“好名急进”，“多游巨公之门”（前已云及此），殊不知此时已改掉。推廌无结果，当由于朝中士大夫对他不了解。

李廌大约于元祐四年春，自阳翟来到了京师，在即将离开京师回到阳翟的四月十五日，苏轼与李廌之间发生了一件富有喜剧色彩的事。原来在此前的三月十六日，朝廷新任命苏轼知杭州，赐给了一匹名为玉鼻骍的良马，而元祐元年，朝廷已经赐给了一匹玉鼻骍，因为李廌（方叔）没有马，所以将新赐的马赠给他。赠马也就罢了，可他偏偏要立个字据，这就是后人所称的《赐马卷》，说什么“恐方叔别获嘉马，不免卖此，故为出公据”。于是李廌作诗（已早佚），苏辙次韵，黄庭坚作跋，李之仪作诗（俱见拙撰《三苏年谱》卷四二），着着实实地热闹了一番。

苏轼不会不知道，他赠给李廌的马，李廌生活再艰难，也不会卖，况且这是朝廷赠的马，是一种很高的荣誉。也不会不知道李廌从别的渠道得不到非常好的马。但他偏偏要这么说，其目的当然是增添生活情趣，显示出彼此亲密无间的那样一种和谐、融洽的气氛。这样说来，和苏轼在一起，可以享受到和别人在一起无法得到的乐趣。当然，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有一个好的大环境。

应该说，从太皇太后高氏实际掌握政权以来，时和岁丰，老百姓安居乐业，外到北辽、西夏，内则朝廷上下，都相安无事，汴京到处都是一片繁荣景象。在这样的大环境中生活，心情自然顺畅。没有这，就无从谈起。

苏轼书赠马券后几天（不出四月），离开汴京去杭州。《济南集》卷一有《送杭州使君苏内相先生》，某用先生旧诗“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犹爱水云乡”为韵，作古诗十四首》组诗送行。其五云及“奈何江湖去”，知作于离京师赴杭时。其四云：“纷纷竞干禄，汨汨第谋身。先生独任重，忧道仍忧民。精诚贯白日，孤忠横云辰。求之千载上，古亦无若人。”乃实录，非溢美。其一、其二皆称轼为“至人”，苏轼在李膺心中形象之崇高，无人可以替代。《苏轼年谱》、《三苏年谱》系此组诗于元祐六年，不妥。

元祐六年二月末，苏轼以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自杭守召还，三月初，离杭，夏，经宋（南都），《济南集》卷二有《元祐六年夏自阳翟之睢阳，迓翰林苏公，自杞放舟至宋》诗，乃五古；卷三有同题七古诗。后者有“放舟适未觏君子”之句，没有见到，未免惆怅。当时一定有书简往还，可惜散失了。

苏轼此次在朝的时间很短，八月除知颍州，闰八月到任。李膺觉得这是拜见苏轼的机会，他在《济南集》卷六《汝阴唱和集后序》中说：

先生在汝阴（按：谓颍州），友人陈师道履常为郡吏，膺虽无位于朝廷，欲挈妇携子，受廛为氓，往从之游。先生止之曰：“吾将上书乞梓州，欲过家上冢而去，颍虽乐土，非能久留。”膺遂不果行。

当时当是通过书简联系，可惜这些书简也散失了。李膺以为，苏轼“文章忠义为当世准的”，能跟随他朝夕学习，是无上的荣幸。

这样的机会终于来了。苏轼知颍后，复知扬州，于元祐七年九月复召回京师。自此至元祐八年十月离京赴知定州任，李膺是苏轼门下的常客。

元祐三年李膺科场失利，元祐六年又失利，从此，遵循苏轼的教导，知道天下事不可强求，浮躁的心气也就进一步平和下来。在上述一年多的时间中，写了一部《师友谈记》，记下了他与苏轼、范祖禹、秦观等师友的交往与他们当时的言行，这些都是实录，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在宋

人笔记中，堪称第一流。中华书局2002年版我点校的此书前言中有比较详细的说明。

此书共六十一则，记苏轼的二十则，另加二则涉及苏轼，共二十二则，记苏轼次子迨（仲豫）、三子过（叔党）的共五则，总计二十七则，几及一半。

李膺记述苏轼文章的传承和兴盛需要文章盟主（领导人）的宏论。苏轼说欧阳修把文章盟主的重任交给他，希望门下诸君将来把这个重任担当起来。苏轼是从时代的高度看待文章，看待自己，要求门下士的。

李膺此书有二则记下了苏轼口述的祖父苏序的富于传奇色彩的故事。其中一则叙及祖父敢斗妖神。此书另一则记及苏轼屡与鬼神辩论的故事，可以看出祖父的明显影响。另一则叙及祖父宽厚、不看重功名，在本书叙及苏轼的其他则及苏轼立身行事中，可以看出祖父的影响。苏序的轶事，在当代苏轼研究中，被广泛引用。

此书谓苏轼盛赞秦观（少游）文章为天下奇作，谓李膺立身行事当循分，对青年作者的成长深切关怀。

本书所记苏轼轶事大多为他书所不载，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引用多则。

李膺与苏轼交往既多，自身的学术修养与品德修养自然得到不断提高，对于苏轼所言所行，比其他人的了解更深一层，其他人对苏轼的记述未必能做到这一点。这也是李膺记述价值之所在。

《济南集》卷一有《月岩斋诗》：

南山之北，北山之南。环冈绕岭，紫翠相参。奔腾蹲蹴，万里马单骖。丘衍沃若，灵秀所涵。平峦蔽亏，伐日西崦。月生大东，错落夕嵒。凝辉万壑，澄若渊潭。有宴人室，架楹维三。其名实佳，佳哉月岩。宴人者何，贊皇之黔。伊谁名之，宗伯子瞻。嗟嗟宴人，天民之淹。昔也方将，愚妄所渐。喜好功名，虎穴屡探。轮般矮堕，却战犹酣。老不及人，绵力弗堪。饮冰食蘖，处约已甘。天匪靳予，事有莫兼。俾予有知，锡福则廉。余龄数奇，展也不占。异时著书，虽俟桓谭。心劳用寡，远愧周聃。今师农圃，穠（biao，义为除草）稼崇芟。年半岁乐，糠粃求餍。褐宽縕敝，怀此不贪。万子之责，责我丁男。我居区中，如茧之蚕。身外余地，乌用沉潜。逝将扫迹，

于焉养恬。披风溯景，玩目嵌巉。彼无养嘲，居之不惭。

这首诗对研究李廌的思想发展很重要。他已经从名利的羁绊中解放出来，决心做一个农民，月岩斋就是他的农舍，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只有放弃了名利的追求，才能拥抱大自然，享受他的恩赐。苏轼为他的农舍命名，就是在元祐末在京师时。

李廌十分喜爱月岩斋，以“月岩”名他的集。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前面已经提到，兹不重复。

四 绍圣至崇宁时期

从元祐八年十月李廌与友人张耒（文潜）等送别苏轼知定州，整个绍圣期间，李廌与苏轼交往的文字，今皆不传（或者无法通音问，没有交往文字）。直至元符三年（1100）北归，才有文字联系。《文集》卷五三与廌第十七简：

比辱手教，迩来所履如何？某自恨不以一身塞罪，坐累朋友。如方叔飘然一布衣，亦几不免。纯甫、少游又安所获罪于天，遂断弃其命，言之何益，付之清议而已。忧患虽已过，更宜掩口以安晚节也。

李廌与苏轼简，有可能作于苏轼离儋前。细味轼简，知廌来简中提到了范祖禹（纯甫，李廌在《师友谈记》中称为太史者）的死。祖禹卒于元符二年十月初十日，见《长编》卷五三〇（秦观卒于元符三年八月十二日，见《苏轼年谱》，时轼已离儋渡海北归）。据轼简，李廌受到了苏轼的连累，惜不知其详。轼此简约作于元符三年末，或作于建中靖国之初，前者可能性较大。按理，北归途中，李廌和苏轼的书简交往一定很频繁，可惜只有此简传下来。

苏轼北归途中，病逝常州，其时为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据《宋史·李廌传》：

轼亡，廌哭之恸，曰：“吾愧不能死知己，至于师事之勤，渠敢以生死为间。”即走许、汝间，相地卜北授其子，作文祭之曰：“皇天后土，鉴一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万古英灵之气。”词语奇壮，读者为悚。

苏轼对待门弟子的教育方式，因人而异。对于李廌，有时几乎是不留情面地指出其立身行事

和创作中的问题，因而李廌对苏轼的感情特别深。他的祭奠苏轼的文字特别感人，是由于他倾注了全部的激情。在苏门弟子中，他是一个最为突出的性情中人，他的感情投入很深。

很可惜，李廌这篇祭奠文字，没有完整地传下来。《太平治迹统类》卷二五《苏轼立朝大概》的引文保留得较多，今录于下：

德尊一代，名满五朝。道大不容，才高为累。惟行能之盖世，致忌媚之成仇。

久蹭蹬于禁林，不遇故去；遂飘零于瘴海，卒老于行。方幸赐环，忽闻亡鉴。识与不识，罔不尽伤；闻所未闻，吾将安放。皇天后土，知一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千古英灵之气。系斯文之兴废，与吾道之盛衰。兹乃公议之共忧，非独门人之私议。

这是天地间感人最深的文学作品，同时是完全符合历史实际的实录。在这里，文学和历史高度统一起来了。当然，最感人的最有代表性的还是“皇天后土”一联。忠义是苏轼立身之本，他的一言一行，皇天后土皆可以为证。再没有比这更确切的表达了。苏轼出生时，就有眉山的草木一下子变得枯萎的传闻。以眉山为中心世世代代积累下来的钟灵毓秀之气汇入了苏轼的身上，于是草木枯萎了。现在，苏轼已经离开了人间，原来赋予他的那种钟灵毓秀之气，不仅仅回到了眉山，也同时滋润了中华大地所有的名山大川，这些山更青，水更绿，他与这些名山大川同在，永远同在。

2009年4月27日于北京城一陋巷，8月30日重订。

（著名苏学专家，中国苏轼研究学会顾问）

苏轼与王适

谢飞

内容提要：主要依据苏轼与王适交往的诗文十七篇，评述他们之间的交游故事和深厚情谊。

关键词：苏轼 王适 诗文

王适，字子立，赵州临城人。祖王鬷，父王正路，兄王蘧，弟王遹。王氏家族系北宋时期河北名门望族。王适生于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自幼聪颖好学，受到家庭的熏陶和良好的教育。熙宁十年（1077），王适始入苏门，从学于徐州守苏轼。此时，王适23岁，已成为皮肤白皙、英俊潇洒、朝气蓬勃的青年。从徐州到湖州，王适跟随苏轼学习三年。之后，又从学苏辙六年。大约元丰二或三年，苏辙将次女许配王适，成为苏门爱婿。元祐四年（1089）十月二十五日，王适卒，享年三十五岁。

王适两考不第，终生未仕，但文学造诣颇深，在当时小有名气。王适为人谦和友爱，与黄鲁直（庭坚）、张文潜（耒）、晁无咎（补之）、秦少游（观）、陈无己（师道）都很好，多有诗文往来。苏轼在为王适撰写的墓志铭中曾断言：“百世之后，其姓名与我皆隐显也。”苏辙也有诗赞扬其“性如白玉烧犹冷，文似朱弦叩愈深。”明代陆深也曾评论说：“宋朝王氏文章盛出于一时者，临川王安石（介甫）、王安礼（和甫）、王安国（平甫），介甫之子雱（元泽），侯官王回（深父），王向（子直），王同（容季）皆一家。又有扬州王令（逢原）并称大家。又有王鞞（定国）、王诜（晋卿）、王无咎（补之）（疑王字为晁字之误）。稍后有王适（子立），苏颖滨婿也。”

因特殊关系，苏轼与王适的诗文交往较为频繁，苏轼著作中存有诗十五首、文二篇。王适有

诗文十五卷，可惜尽失。熙宁十年四月，苏轼到徐州任职，从这时起，王适、王遹兄弟二人开始从学于苏轼。

苏轼与王适有关的诗句最早见于元丰二年（1079），本年二月，苏轼与王适、王遹及张师厚饮酒于杏花树下，赋《月夜与客饮杏花下》诗一首。苏轼在引中说：“仆在徐州，王子立、子敏皆馆于官舍。二王方年少，吹洞箫，饮酒杏花下”，诗云：

杏花飞帘散余春，明月入户寻幽人。
褰衣步月踏花影，炯如流水涵青苹。
花间置酒清香发，争挽长条落香雪。
山城酒薄不堪饮，劝君且吸杯中月。
洞箫声断月明中，惟忧月落酒杯空。
明朝卷地春风恶，但见绿叶栖残红。

这是苏轼自己非常得意的诗作之一。作者运用幽雅清秀的诗句，既表现出自己畅快淋漓的心情，也描绘出此时此刻朋友、杏花、明月、美酒、洞箫相互映衬交融、“对月酣歌美清夜”的情景。因此，苏轼对这次饮酒赋诗印象颇深，常有思念和酬唱。

元丰二年四月，苏轼罢徐州，转任湖州知州，王适、王遹也随同到达湖州。苏轼转任湖州，内心是很不平静的，闲暇间经常与王氏兄弟等游赏赋诗。四月间曾为学生赋诗二首，其一为《与王郎夜饮井水》：

吴兴六月水泉温，千顷菰蒲聚斗蚊。
此井独能深一丈，凛然如我亦如君。

其二为《与王郎昆仲及儿子迈，绕城观荷花，登岘山亭，晚入飞英寺，分韵得“月明星稀”四首。

昨夜雨鸣渠，晓来风袭月。
萧然欲秋意，溪水清可啜。
环城三十里，处处皆佳绝。
蒲莲浩如海，时见舟一叶。
此间真避世，青蒻低白发。
相逢欲相问，已逐惊鸥没。——其一
清风定何物，可爱不可名。
所至如君子，草木有嘉声。
我行本无事，孤舟任斜横。
中流自偃仰，适与风相迎。
举杯属浩渺，乐此两无情。
归来两溪间，云水夜自明。——其二
苕水如汉水，鱗鱗鸭头青。
吴兴胜襄阳，万瓦浮青冥。
我非羊叔子，愧此岘山亭。
悲伤意则同，岁月如流星。
从我两王子，高鸿插修翎。
湛辈何足道，当以德自铭。——其三
吏民怜我懒，斗讼日已稀。
能为无事饮，可作不夜归。
复寻飞英游，尽此一寸晖。
撞钟履声集，颠倒云山衣。
我来无时节，杖履自推扉。
莫作使君看，外似中已非。——其四

从诗中看来，苏轼和自己的学生们完全沉浸在美景之中，显得悠闲、潇洒。诗中“两王子”即指王适、王通，他赞扬王氏兄弟学道日精，学业日上，诗文崭露头角。同时，苏轼还借此告诫他们，人和文学的修养，“当以德自铭”。

元丰二年七月，因御史中丞李定，御史舒亶、何正臣等诬陷苏轼谤讪朝政，遣皇甫遵前来湖州勾摄苏轼，苏轼遂罢湖州。行前，苏轼与妻子及家人诀别。亲戚朋友多怕受牵连而躲避，唯有王适、通兄弟将老师送出郊外。苏轼在《王子立墓志铭》中说：“余得罪于吴兴，亲戚故人皆惊散，独两王子不去，送余出郊，曰：‘死生祸福，天也，公其如天何。’返取余家，致之南都。”年底，苏轼被责授为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元丰三年（1080）正月初一，苏轼离别京师奔赴贬谪地，于二月一日到达黄州。本月，苏轼作《次韵前篇》，诗云：

去年花落在徐州，对月酣歌美清夜。

今年黄州见花发，小院闭门风露下。
万事如花不可期，馀年似酒那禁泻。
忆昔扁舟溯巴峡，落帆樊口高桅亚。
长江衮衮空自流，白发纷纷宁少借。
——其一
竟无五亩继沮溺，空有千篇凌鲍、谢。
至今归计负云山，未免孤衾眠客舍。
少年辛苦真食蓼，老境安闲如啖蔗。
饥寒未至且安居，忧患已空犹梦怕。
穿花踏月饮村酒，免使醉归官长骂。

——其二
真是人生苦来多，去年事业蒸蒸日上的处境和潇洒淋漓的心情，转眼间已经成为泡影，面前却是暴风骤雨般的打击，由一名官员成为流放者。此时此刻，苏轼仍然以诗舒怀，借此抒发他对敌人的憎恨，对故人故事的怀念和被贬谪后安闲孤苦生活的心情。正如王适兄弟所言：“公其如天何”。

元丰四年（1081）五月，一直在筠州贬所陪伴苏辙学习的贤婿王适，由居所赴徐州参加秋举，路过黄州看望苏轼。苏轼与侄婿同游武昌西山后，作《武昌酌菩萨泉送王子立》，诗云：

送行无酒亦无钱，劝尔一杯菩萨泉。
何处低头不见我，四方同此水中天。

苏轼对于侄婿和学生王适的科考寄予很大的希望，他对王适的学问和德性也深信不疑，从他《答李方叔十七首》的第三简中可见一斑。当时，李膺和王适是同时在徐州参加年度科考的。此简之前，苏轼曾致书李膺，“须望鼎甲之捷也”。苏轼的这一书信主要是向李膺介绍王适、王通兄弟。简文如下：“侄婿王适子立，近过此，往彭城取解，或场屋相见。其人可与讲论，词学德性，皆过人也。其弟名通，字子敏，亦不甚相远。承问及儿子，属令干事，未及奉书，王文甫以与简，令持前所留奉纳矣。”

元丰五年（1082）春末，王适徐州解试不利，自徐州返筠州，路过黄州再次看望苏轼，苏轼于新建雪堂清夜赏月，作《〈归来引〉送王子立归筠州》，诗云：

归去来兮，世不汝求胡不归？
淘北望之横流兮，渺西顾之尘霏。
纷野马之决骤兮，幸余首之未鞭。
出彭城而南骛兮，眷丘陇而增欷。

乱清淮而俯鉴兮，惊昔容之是非。
念东坡之遗老兮，轻千里而款余扉。
共雪堂之清夜兮，揽明月之迁余晖。
曾鸡黍之未熟兮，叹空室之伊威。
我挽袖而莫留兮，仆夫在门歌《式微》。
归去来兮，路渺渺其何极。
将税驾于何许兮？北江之南，南江之北。
于此有人兮，俨峨峨其丰硕。
孰居约而尔肥兮？非糠核其何食。
久抱一而不试兮，愈温温而自克。
吾居世之荒浪兮，视昏昏而听默默。
非之子莫振吾过兮，久不见恐自贼。
吾欲往而道无由兮，子何畏而不即。
将以彼为玉人兮，以子为之璞也。

元丰六年（1083）十二月十九日，苏轼生日。
王适自筠州寄诗来贺，苏轼作《生日，王郎以诗见庆，次其韵，并寄茶二十片》，诗云：

《折杨》新曲万人趋，独和先生《子葛子》。
但信椟藏终自售，岂知碗脱本无模。
竭从冰叟来游宦，肯伴癯仙亦号儒。
棠棣并为天下士，芙蓉曾到海边郛。
不嫌雾谷霾松柏，终恐虹梁荷栋梓。
高论无穷如锯屑，小诗有味似连珠。
感君生日遥称寿，祝我余年老不枯。
未办报君青玉案，建溪新饼截云腴。

元祐四年（1089），苏轼以龙图阁学士除知杭州，七月达任上。十月二十五日，王适卒，苏轼闻之悲痛不已，作《哭王子立次儿子迨韵三首》，诗云：

彭城初识子，照眼白而长。
异梦成先兆，清言得未尝。
岂惟知礼意，遂欲补诗亡。
咄咄真相逼，诸生敢雁行？一一其一
非无伯鸾志，独有子云悲。
恨子非天合，犹能使我思。
儿曹莫凄恸，老眼欲枯萎。
会哭皆豪杰，谁为感旧诗。一一其二
龙困尝鱼服，羊儇或虎蒙。
忽忽成鬼錄，愤愤到天公。
偶落藩墙上，同游羿彀中。
回看十年事，黄叶卷秋风。一一其三

苏轼从十多年前认识王适开始回忆，赞扬其诗文秀丽，礼学尽然，咄咄逼人。叙说王适不年

而亡，且无子嗣，可悲可叹。回忆十多年前与王适的交往事，历历在目，如同秋风中的黄叶，一逝而过，只能深切地留在记忆中。

在该诗的自注中透露出王适戏剧性的姻缘，他的美梦使得其成为苏氏的贤婿。苏轼注曰：“余为密州，子立未尝相识，忽告同舍生曰：‘吾梦为密州婿，何也？’已而果以子由之子妻之。”冯应榴引王符《潜夫论》曰：“君子之异梦，非妄而已也，必有事故焉。”王适的美梦是在徐州做的，此时苏轼则在密州任上，因此，他们并不相识而王适却在梦境中成了他的女婿，的确是怪异之事。其实，这只不过是王适借此表达对苏门的追崇而已。

苏轼还有一首《次韵王郎子立风雨有感》诗，黄庭坚有次韵诗，诗云：

百年一俯仰，寒暑相主客。
稍增裘褐气，已觉团扇厄。
不烦计荣辱，此丧彼有获。
我琴终不败，无攫亦无释。
后生不自牧，呻吟空挟策。
揠苗不待长，卖菜苦求益。
此郎独静退，门外无行迹。
但恐陶渊明，每为饥所迫。
凄风弄衣结，小雪穿门席。
愿君付一笑，造物亦戏剧。
朝来赋云梦，笔落风雨疾。
为君裁春衫，高会开桂籍。

在苏轼的文集中有《记黄州对月诗》一篇，此文在《东坡志林》则曰《忆王子立》，作于元祐四年。当年，王适卒，苏轼悲痛万分，又一次表达了对王适深切怀念和哀悼。录文如下：

仆在徐州，王子立、子敏皆馆于官舍，而蜀人张师厚来过。二王方少年，吹洞箫，饮酒杏花下。明年，余谪居黄州，对月独饮，尝有诗云：“去年花落在徐州，对月酣歌美清夜。今年黄州见花发，小院闭门风露下。”盖忆与二王饮时也。张师厚久已死，今年子立复为古人，哀哉！

苏轼文集中还录有《王子立墓志铭》一篇，文曰：

（下转 20 页）

流动的生命经验与空间对话

——从苏轼“历杭”作品看其南方意识的形成

(台湾) 张蜀蕙

内容提要: 作者评述了苏轼历杭的事由、营造、游思和南方意识, 以及白居易杭州经验对苏轼的影响。

关键词: 历杭 生命经验 空间对话 南方意识

一 前言

研究苏轼移置、移动的过程, 须重视苏轼“在途中”的所思所感与他对地方认同的场域情感变化。①而苏轼这种在地情感的萌发, 历来研究者也都注意到历经人生苦难, 苏轼得以超越, 是深受白居易的影响, 如吴开《优古堂诗话》所载, “东坡作《定风波序》云, ‘王定国歌儿柔奴, 姓字文氏。定国南迁归, 予问柔, 广南风土应是不好? 柔对曰, 此心安处便是吾乡, 因用其语缀词云, 试问岭南应不好? 却道, 此心安处是吾乡。’予尝以此语本出于白乐天, 东坡偶忘之耶! 乐天《吾土》诗云, 身心安处是吾土, 岂限长安与洛阳! 又《出城留别》诗云: ‘我生本无乡, 心安是归处。’又重题云, ‘心泰身宁是归处, 故乡可独在长安。’”②而尚永亮在《元和五大诗人与贬谪文学考论》中更指出白居易这种安心思想对于前人与同时代的人是一种超越, 对宋人也是最好的现身说法, 是“完全打破了贬谪诗人与荒远环境间的森然界限”, “将本是限制自我的环境一变为审美的对象, 和优游的场所。”③可见白居易似乎提供了贬谪文人观看南方的一种新的视野, 苏轼书写南方也是

在白居易的典型中学习抉择, 开展其书写南方的策略。

本研究即针对这些文本以逆志的方式, 推究苏轼书写乐天居杭州赏心乐事与空间场景, 在文字之间所流露出来对于白居易生命情调的认同。由以上的讨论勾勒出杭州在白居易与苏轼心中的南方印象与定位, 以及在“杭州”此空间的陶养与视野下, 苏轼是如何阅读到白居易自得于山林与朝市之间的“中隐”思想, 呼应白居易这种安排人生、面对出处之间的态度, 以及调和内心仕与隐冲突的方式。并借由苏轼在杭州的营建, 探讨苏轼如何从陌生人观看异地的角度, 进而涉入当地生活, 参与当地事务、活动, 与在地人相处的方式, 形成一种“在地的”思考与情感, 并形成他与当地的生活记忆。进而比对苏轼后来的黄州、惠州、儋州时期作品, 考察杭州生活的经验, 是如何影响他后来对于异地、异文化接触时的一种心态上的调整方式, 确定了杭州生活经验在苏轼阅读南方的意义。

二 苏轼历杭的经历与书写

(一) 赴杭事由

苏轼曾两度历杭, 一为宋神宗熙宁四年十二月, 一为元祐四年四月出京, 七月到任。第一次来杭缘于被新法派排挤, 是苏轼仕途上的第一次挫折, 弟子由出仕陈州, 他接着通判杭州, 他诉

说这次的挫败“犹如醉且坠，幸未伤辄醒。”（《颖州初别子由二首其二》），他叹息仕宦十年理想的陨落“万事早知皆有命，十年浪走宁非痴。”（《失解西归》），在往南的途中有着“南行千里何事成”（《次韵柳子玉过陈绝粮两首其二》），“今我身世两悠悠，去无所逐来无恋。”（《泗州僧伽塔》）到南方，竟有着浮云蔽日之叹“地隔中原劳北望，潮连沧海欲东游。”（《龟山》），苏轼《初到杭州寄子由》诉说他对新法施行时“眼看时事力难任”，与他屡受诬“衰病摧颓自畏人”忧谗畏讥的心情。苏轼是怀着这样的心情来到杭州。苏轼第二次到杭州，在元祐四年四月，元祐洛蜀党争不断，自请外放，他曾谓“以三年翰墨之林，屡遭飞语，再岁江湖之上，许免烦言。”（《谢兼侍读表》）他第二次到杭州，常有不如归去之叹“忧去生亦还，纵浪大化中，正为化所缠”（《问渊明》）第二次到杭州只居两年而去。

（二）苏轼在杭州的经营

熙宁四年，苏轼以太常博士、直史馆通判杭州，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到杭州任。在杭州任内，东坡与白居易都遭遇到相同的问题，就是夏秋之际少雨，然时或阴雨连绵，经常会妨害农时，在《祈雨祝文》中云：“杭州之为郡，负山带江，水泽不留。逾旬不雨，农有忧色。挽舟浚河，公私告病。吏既无术，莫知所救。不敢坐视，惟神之求。”逾旬不雨，就有妨害农时的情形，这和杭州特有的地形，留不住水，有很大的关系。《祈晴祝文》云：“大雪连日，凝阴伤春。闵惟艰食之民，重此常寒之虐。役兵墮指，行旅催辀。”《祈晴吴山庙祝文》云：“秋谷未登，既食其陈。……阴雨害之，檣人罔功。”都反映了一些苏轼在杭州所面临的处境。又《开湖祭祷吴山水仙五龙三庙祝文》：“杭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目。湖生菱葑，如目之有翳。翳久不治，目亦将废。河渠有胶舟之苦，鳞介失解网之惠。六池化为眢井，而千顷无复丰岁矣。是用因赈恤之余资，兴开凿之利势。百日奏功，所患者淫雨；千夫在野，所忧者疾病。”《谢吴山水神五龙三庙祝文》：“西湖堙塞，积岁之患。……大堤云横，老葑席卷，历时未几，功已过半。”可知西湖堙塞是由来已久的问题，除了妨害农作，也影响航运和水中生物之生活。因此花

了百日之期，去解决西湖淤积的问题。

熙宁六年，苏轼协助知州陈述古修复钱塘六井，作《钱塘六井记》。记中云：“潮水避钱塘而东击西陵，所从来远矣。沮洳斥卤，化为桑麻之区，而久乃为城邑聚落，凡今州之平陆，皆江之故地。其水苦恶，惟负山凿井，乃得甘泉，而所及不广。”这是说明杭州为靠海之地区，其水源常为海水所侵，成苦恶之水，不能饮用，所以必须负山凿井，以求淡水饮用。于是提到唐代的李泌作六井，引西湖之水作为民生用水，后来的白居易，又“治湖浚井，刻石湖上，至于今赖之。”所谓“六井”指的是西湖的相国井、西井、金牛池、方井、白龟池和小方井。到了熙宁五年，陈述古问人民最困扰的问题，答曰：“六井不治，民不给于水，南井沟庳而井高，水行地中，率常不应。”所以将六井的水疏通导引，使当地赖以维生的饮水可以不致匮乏。熙宁六年春天大旱，江淮及浙右的井水都竭，而钱塘的民众尚可以“饮牛马，给沐浴”。这是东坡第一次在杭州的经营。

在元祐四年七月，东坡第二次赴杭，次年春，东坡遭遇了更险恶的情形，当时饥疫并作，东坡减价粜常平米以赈灾，施放稀粥，作药汁，遣官率医分坊治病，捐黄金五十两，助建病坊。又疏浚西湖，整治钱塘六井。由于这个原因，东坡在二度历杭的经验是为公务所羁绊，相当忙碌，少了初次赴杭时游孤山、灵隐，上天竺的那种闲暇。

然而杭州的开发与城市化也正在唐末两代，侯乃慧《唐末时期的公园文化》一书指出杭州西湖经过宋代经营，至南宋时，西湖成为东南第一胜景。④苏轼名诗：“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二，《苏轼诗集》卷九），以西子比喻，西湖之名遂定，西湖在宋真宗天禧年间已为放生池，禁止渔钓⑤，故苏轼有云：“放生鱼鳖逐人来，无主荷花到处开，水枕能令山俯仰，风船解与月徘徊。”（《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句其二》，《苏轼诗集》卷七）成为可观可游之处。

（三）苏轼的游与思

苏轼常常在西湖山光水媚之间，感受到无数可穿透可营造的空间，如，“溪山处处皆可庐，最爱灵隐飞来孤。”（《游灵隐寺得来诗复用前韵》）

杭州真正变成一个文化空间是在白居易与苏轼手中完成，他们用诗、用营建，构筑人与空间的深密情感，而这些创造与营造，正是与山水的相处所开启的。苏轼《怀西湖寄晁美叔同年》曾述：“西湖天下景，游者无愚贤。浅深随所得，谁能识其全。嗟我本狂直，早为世所捐。独专山水乐，付与宁非天。三百六十寺，幽寻遂穷年。所至得其妙，心知口难传。至今清夜梦，耳目余芳鲜。君持使者节，风采烁云烟。清流与碧巘，安肯为君妍。胡不屏骑从，暂借僧榻眠。读我壁间诗，清凉洗烦煎。策杖无道路，直造意所便。应逢古渔父，苇间自延缘。问道若有得，买鱼勿论钱。”（《苏轼诗集》卷十三），这首诗揭示了杭州空间给予苏轼的特殊感受，并显现出苏轼与白居易在杭州开启了一种情感，是生命与空间的对话。这种空间是可以穿透的，既有时间层层叠叠，亦有人与人之流动往来。且在公共众人可以参与之外，又是他个人可以感觉拥有可以改变的，这对于白居易或苏轼来说是相当奇妙，白居易好营居，苏轼亦然，他们一生有许多的经营，然而在他们人生中的所有营居之中，实在没有一个空间是如此庞大、穿透、变化、有趣。

苏轼认为西湖四时皆有可观，其《和蔡准郎中见邀游西湖三首其一》云：“夏潦涨湖深更幽，西风落木芙蓉秋。飞雪暗天云拂地，新蒲出水柳映洲。湖上四时看不足，惟有人生飘若浮。”在流动不止的人生中，西湖提供了一种歇息的空间，西湖之于杭州，在繁华之中提供山林之乐，苏轼领略西湖予以文人在仕途之中实现隐居的想望。如其《和蔡准郎中见邀游西湖三首其二》云：“城市不识江湖幽，如与蟪蛄语春秋。试令江湖处城市，却似麋鹿游汀洲。高人无心无不可，得坎且止乘流浮。公卿故旧留不得，遇所得意终年留。”这种空间的难得，恰可保持在仕途之中清醒的观看。苏轼在政治场中的失落，在西湖的诗作，往往提醒政治上的得失心是无谓。他在游览西湖周边的历史地景，吴越王所建净土寺，有“荣华坐销歇，阅世如邮传”的感叹（《自净土寺步至功臣寺》）。苏轼在杭州，发觉他个人的天性实难以入仕宦拘束：“我本麋鹿性，谅非伏辕姿。”（《次韵孔文仲推官见赠》），“始悟山野姿，异趣难自强。”（《湖上夜归》）对于政治上的得失，他常是欲言又止：“众人事纷扰，志士独悄悄。……三杯忘万

虑，醒后还皎皎。”（《正月九日，有美堂饮，醉归，径睡，五鼓方醒，不复能眠，起阅文书，得鲜于子骏所寄，作古意一首答之》），此时期他在仕途疲倦，杭州是他在风暴中安止之处，在（《新城道中二首其二》）云：“身世悠悠我此行，溪边委辔听溪声。散材畏见搜林斧，疲马思闻卷旆钲。细雨足时茶户喜，乱山深处长官清。人间岐路知多少，试向桑田问耦耕。”生命在风暴之中仍有另种风景值得观看。

（四）苏轼的南方印象

杭州时期是苏轼仕宦以来第一次挫败，他由杭州、西湖的温暖中寻找到力量。如其《和蔡准郎中见邀游西湖三首其三》云：“船头斫鲜细缕缕，船尾炊玉香浮浮。临风饱食得甘寝，肯使细故胸中留。”而他也在杭州生活看见生命的另种价值，如《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其三》：“乌菱白芡不论钱，乱系青菰裹绿盘。忍忆尝新会灵观，滞留江海得加餐。”创吟咏处江湖仍有另种滋味，这种以南方美食作为生命变成闲人将是另种获得。

苏轼日后对杭州常有思念，如《杭州故人信至齐安》云：“昨夜风月清，梦到西湖上。朝来闻好语，扣户得吴饷。轻圆白晒荔，脆酽红螺酱。更将西庵茶，劝我洗江瘴。故人情义重，说我必西向。一年两仆夫，千里问无恙。相期结书社，未怕供诗帐。还将梦魂去，一夜到江涨。”虽然西湖所历的诗引致诗案之祸，杭州生活却是苏轼生命中美好的年代，西湖的湖光山色、饮食、吟诗闲乐生活却是一种无忧的美好。这种美好在沾染世尘中，陷入政治漩涡中却是一种悠远单纯的思想，难以再得，只能“寄谢西湖旧风月，故应时许梦中游。”（《次韵杭人裴维甫》）但即使是如杭州舒服安适的生活不再，苏轼依然持着在杭州所发现挫败下的人生，依然十分真实而值得存在的。

三 白居易杭州经验对苏轼的影响

诗话记载苏轼是如何仰慕白居易为人，并进而以乐天诗为号，此一思考理路开展，如《见闻搜玉》所载：“苏公居黄州，称东坡居士，盖慕白

公乐天而云也。”白公有《东坡种花》诗“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又《步东坡》诗，“朝上东坡步，……爱此新成树。”又《别东坡种花树》“何处殷勤重回首，东坡桃李种新成”，皆刺忠州时作也。苏公雅慕白公，如《赠李道士》云“他时要指集贤人，知是香山老居士”，《赠程杰》云“我似乐天君记取，华颠赏遍洛阳春”，《送程懿叔》“我甚似乐天，但无素与蛮”，《久侍迩英》“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浅道根深”。这在许多诗话曾经出现的文字，说明谪居黄州时期的苏轼阅读到贬谪到忠州乐天诗以东坡为号的同时，其中有许多文字却足以说明“杭州”才是苏轼阅读到白居易心灵所在，在时间点上是远早于贬居黄州。

据苏轼《予去杭州十六年而复来，留二年而去，平生自觉出处老少，粗似乐天，虽才名相远，而安分寡求，亦庶几焉。三月六日，来别南北山诸道人，而下天竺惠净师以丑石赠行，作三绝句》诗云：“出处依稀似乐天，敢将衰朽较前贤。”苏轼两度杭州去来，在临去杭州，的确发现生命竟有如此的巧合，与白居易去处来杭州的过程竟是如此的相似。他云：“在郡依前六百日，山中不记几回来。”亦是追摹白居易《留题灵隐》所云：“在郡六百日，入山十二回。”说明两人在杭州的游历。而“还将天竺一峰去，欲把云根到处裁。”亦是取自白居易《去杭》诗云“三年为刺史，饮水复食蘖，惟向天竺山，取得两片石；此值抵千金，无乃伤清白。”也慕乐天收下天竺惠净师所赠天竺石，觉来杭历杭经历相同，记忆杭州的方式，亦是透过石湖天竺石作为与这地方的联系，这样的雅意竟也是如此相同。⑥

而由苏轼两度历杭诗与白居易书写杭州的作品，可见苏轼几乎是追摹乐天在杭州的行迹与乐趣，如此深刻迷恋乐天者。而对于白居易守杭州始，西湖受到人们重视与赏爱，而苏轼最爱游历之所也是西湖，对西湖此城市山林在其《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其五》领略到白居易所称的“中隐”的况味：“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认为可以安住，这种在现实之中得享仕与隐之乐，正是白居易所谓：“大隐隐朝市，小隐隐山林。樊丘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以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中隐》）在空间上的取择，也是一

种生命的态度。而就他们流动的生命经验与空间对话，在苏轼与白居易人生的阅历之中，他们生命的每一次转变，就是不同空间的转换。虽然苏轼生命中最重要流动的生命经验莫过于贬谪的黄州、惠州、儋州时期，那的确是苏轼虽免于一死，却近乎是放逐，放置于异文化的场域之中⑦。也正是苏轼论及他个人生命经验，皆是以他晚年流动的空间，作为他生平的表征：“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然而苏轼那种视生命历程为其流动的旅程，并以个人空间场域作为他个人生命存在的标帜与意义的看法：“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苏轼诗集》卷四十三），是如何由迭荡、流转的人生与变迁不已的空间里，由不定着、不安适的环境转换而来？

根据王志弘《性别化流动的政治与诗学》则对于流动的空间经验，认为所谓的“流动”则有以下的指称：“移动 movement、移动能力 mobility、旅行 travel、移置 dislocation、迁移 migration、游牧 nomadismo 来描述一种不固着于特殊社会位置，而得以漂流移动的状态与能力。有时采取的是较为偏向负面的字眼，如驱逐 exile、移徙 displacement、流离 diaspora、离家或无家可归 homeless 等等，而指涉了一种强制处于流动状态，被迫脱离原有的位置，一种强迫性的跨越边界。”王志弘更提出与流动隐喻相应的定着的观念，则包含了家、家国、家邦、社区和地方，并以图表显示：⑧

基本特质	隐喻	积极出路
差异 / 分类，位置、情境、边缘、界线、边界、边境→跨越边境		
流动，旅行、放逐、游牧、移置、移动、流离→连结网路		
定着，家、家邦、社区、地方、地域性→去畛域化 / 再畛域化		

借由以上这个图表以回顾苏轼在，对于他的人生有着两极化的感受与定义，“飘荡”与“旅程”在其作品中一再交错出现，有着从这端移动到那端的变化。因此当“飘荡”、“旅程”之感交杂错综时，那必然是与定着、安稳、属于的场域相比较而有的感受。这种定着的空间，即是他的作品中常以为飘荡而相对的另两个空间座标点：四川眉山、杭州，前者为其故乡，然而出现的比例并不多于杭州，杭州出现的次数相当高，苏轼一生两次居杭，即使离开杭州之后，不论是与杭州友人诗文往来，或是移居他处，每当诗人空间移动时，

适与不适时即是以杭州相比较，如移居密州初期的不适与杭州相较的冷清，移居黄州、惠州安顿时竟有如居杭州之感，或是南方的炎热让他有种似杭州之感。②无论是在苏轼的诗句，或是他提到杭州的点点滴滴，以及他提到杭州是他的故乡，可见杭州已内化成为苏轼内心的一种座标意义，就是“此心安处是吾乡”，即使后来他生命中有更多不自主的流动经验，他这种在地的场域情感不断的出现，终其一生，可说是萌发自他历杭时期。

杭州何以内化成为苏轼内心中原乡的空间地标？在苏轼之前与之后的流动生命之中成为一个安稳的所在？何以杭州对苏轼而言不是另一个黄州、惠州、儋州？正如同对白居易而言不是他生命中的忠州、庐山、洛阳？一如同成为元结之浯溪、柳宗元之愚溪所营是个人闲居萧散，或是放逐被贬，所自营完成的一个小天地，是他们流动生命中的寄寓之天地一隅而已？

“杭州”这个空间因素的影响是不能不注意，杭州与一般文人所贬居“五溪不毛之乡”僻静幽苦之处是非常不同，杭州有南北交通转接之大运河、江淮钱塘，苏杭吴越，自古即是好居处。杭州其便利、繁华、舒适，的确可以消散生命流动的移居之苦。“杭州”这个空间所承载的意义的确是相当轻盈的，以白居易《五月十五日夜月》所载：“岁熟人心乐，朝游复夜游。春风来海上，明月在江头。灯火家家市，笙歌处处楼。无妨思帝里，不合厌杭州。”杭州的確是没有历史与个人承载的轻盈空间。然而轻盈亦意味不定着、不容易有归属感，然而白居易在杭州、与苏轼在杭州虽然没有个人私密的空间经营。“杭州”这个空间不属于诗人的私密之所，以留待读者与知音怀抱着寻访之情以开启，而存在于诗人刹那之眼所营造的个人世界，如柳宗元之愚溪，范成大所记只是一个小小的水流而已。③亦是留待了千古以下知音以相待。杭州反而像是文人与现实世界联系对话之所，不需孤芳自赏，不需以寂寞相招，在此公共空间所感染的是与民偕乐的意趣。

这一点由苏轼与白居易在杭州经营的空间记忆，是与地方连结，与地方产生联系的空间经验。苏轼早年在凤翔的经验，苏轼的确有着与当地人们共有的情感与事件经验，以为空间地标命名，留存为个人与地有共有的记忆。如其《喜雨亭记》其以凤翔久旱逢雨，以喜雨为所治官舍命名为“喜

雨亭”，在记中有一段动人的话语，说明久旱不雨当地土民不能安居，“吾与二三子，虽欲优游以乐于此亭，其可得耶？今天遗斯民，始旱而赐之以雨，使吾与二三子，得相与优游而乐于亭者，皆雨之赐也，其又可忘耶？”故亭以雨名，以“志喜也”、“以示不忘也”。苏轼这种萌发于早岁的意念到了杭州有了更多的施为。以致后来到了徐州历逢水患，而盖黄楼以志不忘与当地居民共同抗洪的事件，也是如此。

苏轼的确也欲透过这种公共空间凝定集体记忆，留下个人存在的印记，如徐州黄楼，苏轼有许多的作品常认为黄楼会让他人在日后相寻到一个充满了志意的苏轼与文本记忆。如黄楼将是与历史豪杰所留下的历史地景同等深刻，游黄楼必想到“使君安在哉！”（《又送郑户曹》）“但有旧欢新怨。异时对，黄楼夜景，为余浩叹。”（《永遇乐》）。苏轼由早岁仕关中到之后到彭城在当地的经营，以文字记录，并有相招文化友人以文字作为公共空间经营留下记忆，使地景除了原来的历史记忆、地方记忆，而更增加了这些地景的文化意义，使地景充满了人文的意义，这种种意念的萌发，殆始于杭州。如苏轼《法惠寺横翠阁》诗：“朝见吴山横，暮见吴山纵。吴山故多态，转折为君容。幽人起朱阁，空洞更无物。惟有千步冈，东西作帘额。春来故国归无期，人言秋悲春更悲。已泛平湖思濯锦，更看横翠忆峨眉。雕栏能得几时好，不独凭栏人易老。百年兴废更堪哀，悬知草莽化池台。游人寻我旧游处，但觅吴山横处来。”以文字大量在地景中创造出一种历史记忆之外，文人游赏的文化记忆，将地方公共空间，也与诗人的生命产生了联系。而杭州真正变成一个文化空间可谓在白居易与苏轼手中完成，他们用诗、用营建，构筑人与空间的深密情感，他们的描述是巨细靡遗，他们亦是这些空间实体的创造者、改变者。他们所经营的是有别于他们之于忠州、庐山、洛阳与在黄州、惠州、儋州所筑的个人空间，这一点白居易与苏轼是有所自觉而完成的。

四 结语：苏轼“历杭”作品 所显现的南方

（一）温暖的南方印象

苏轼在杭州的书写，呈现出一种新的描述南方的观看，不是充满了荒远、森然瘴疠之气，这在白居易历杭作品中即是有着温暖的江南意象：“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或充盈着节庆、饮食、闲适的山水之乐：“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营造出一种有别于放臣逐子到南方，所畏惧害怕的南方景象，代之而起的是温暖明亮的愉悦、物候、丰饶、可观、可游、可以歇息、生养、安居之所。正如法国哲学家巴舍拉（Bachelard, G）《空间诗学》认为：“当我们与空间取得亲密与私密感，无论是真实的、想像的，来自个体将这样的感受命名与诠释，人为赋予了该空间的意义。”文人经验到真实的南方空间，他们看到、听到，经验到的世界，他们在杭州的生活，也形成他们阅读南方、感受南方的重要基础。

（二）生命重整的安置之所

白居易在南方的经历除了忠州、江州之贬，曾两次到杭州、苏州任官的经验，因此白居易书写南方，往往偏重在“杭州”的生命经验，可谓写出唐代文人阅读南方的另一种流动生命的经验。相较于柳宗元是以南方山水为慰藉，白居易则以南方山水深化了流动生命里面对空间的一种自我消解之道，而其《忆江南》写出北人温暖的南方经验与眷恋之情，其以《醉赠刘二十八使君》诗赠刘禹锡，刘禹锡答诗《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一问一答之中阐述南方的空间经验的生命意义：“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可见南方经验对于他们生命的淬炼与意义。这种经验亦见于苏轼到杭州的作品，他在熙宁六年《除夜野宿常州城外》其二云：“南来三见岁云徂，直恐终身走道途。老去怕看新历日，退归拟学旧桃符。烟花已作青春意，霜雪偏寻病客须。但把穷愁搏长健，不辞最后饮屠苏。”（《苏轼诗集》卷十一），可知在杭州时期，苏轼那种“飘荡”、“旅程”之感交杂错综时，那股“但把穷愁搏长健，不辞最后饮屠苏”的定着与安稳，已经萌发了。

在唐宋文人阅读南方的文本之中，柳宗元的

南方是偏于蛮荒，在穷愁潦落之中写出个人的空间。而白居易历杭时期，阅读到南方不同的侧面，南方是可营居、可分享、可依存。到了苏轼更能阅读到其中的意义，可以说，如果没有杭州，也许白居易、苏轼，这两个文人永远不会发现在他们身上有一种生命力，可以如此丰富、平静与温暖，杭州的美景、丰饶、和宜的气候变成他们生命中永恒“家”的原型。杭州亦是苏轼与白居易相遇所在，“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

（《六月二十日望湖楼醉书五绝句其二》，《苏轼诗集》卷七）苏轼才发现真正的乐天生命态度，在出处之间的，“中隐”为何，可以说杭州在两人流动不居的生命里，两次居杭的相同经历，让他们在相同的空间，有了真正的对话，他们也与自我进行一次深刻的对话，这种对于观看南方的方式，深沉蕴化到他们日后的生命，终其一生，不为贬谪的流动生命所苦，他们发现观看他们生命意义的另种方式。

论文注释：

①吴惠娟《试论苏轼二度守杭的心态变化》，《北方论丛》，1992年6月；邱俊鹏《苏轼贬儋州时期的精神支柱与自我排遣》和黄启方《从东坡书牍认识东坡——以黄州、惠州、儋州时期书牍为主》，东坡逝世九百年纪念学术研讨会论文，2000年11月17-18日。

②转引自四川大学中文系唐宋文学研究室编《苏轼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94年版。

③尚永亮《元和五大诗人与贬谪文学考论》中《元和五大诗人的执着意识和超越意识》，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第256-260页。

④侯迺慧《唐宋时期的公园文化》，东大图书1907年版，第50页。

⑤王水照《苏轼选集》，万卷楼1997年版，第50页注引《读史方舆提要》，与《宋史·沈建传》，皆载宋真宗、仁宗二朝，西湖禁捕渔事。

⑥《见闻搜玉》，转引自陈友琴编《白居易集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郭绍虞辑《宋诗话辑佚》，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5页。

⑦相关的研究相当多，期刊论文与学位论文甚多，可参考衣若芬，《台港苏轼研究论著目录》，收入《赤壁漫游与西园雅集——苏轼研究论文集》，线装书局2001年版。

⑧王志弘《性别化流动的政治与诗学》中《行动的主题建构论》，田园城市文化 2000 年版，第 154—155 页。

⑨如苏轼诗《予前后守、倅余杭，凡五年。夏秋之间，蒸热不可过。独中和堂东南频，下瞰海门，洞视万里，三伏常萧然也。绍圣元年六月，舟行赴岭外，热甚。忽忆此处，而作是诗》。

⑩见高文、屈光《柳宗元选集》钴母潭注引《骖鸾录》，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16 页。

参考文献：

四川大学中文系唐宋文史资料室《苏轼资料汇编》，中华书局 1994 年版。

周勋初《唐人轶事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年版。

侯乃慧《诗情与幽境：唐代文人的园林生活》，东大图书 1991 年版。

张海鸥《宋代文化与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王存撰，王文楚、魏嵩山点校《元丰九域志》，中华书局 1984 年版。

乐史《宋本太平寰宇记》，中华书局 2000 年版。

伊原弘著，赵金贵译《唐宋年间城市变化与地名变化之关系》，《地名知识》1992 年 5 月。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五八五册，商务印书馆

梁诗正《西湖志纂》，《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册五八六，商务印书馆。

阙维民编著《杭州城池暨西湖历史图书》，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吴惠娟《试论苏轼二度守杭的心态变化》，《北方论丛》，1992 年 6 月。

饶学刚《苏东坡在黄州》，京华出版社 1999 年版。

王水照《苏轼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Yi-Fu\Tuan 著，潘桂成译《经验透视中的空间与地方》，国立编译馆 1998 年版。

（台湾东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助理教授）

（上接 13 页）

子立讳适，赵州临城人也。始予为徐州，子立为州学生，知其贤而有文，喜怒不见，得丧若一，曰：“是有类子由者。”故以其子妻之。与其弟通子敏，皆从余于吴兴。学道日进，东南之士称之。余得罪于吴兴，亲戚故人皆惊散，独两王子不去，送余出郊，曰：“生死祸福，天也，公其如天何。”返取余家，致之南都。而子立又从子由谪于高安、绩溪，同其有无，赋诗弦歌，讲道著书于席门茅屋之下者五年，未尝有愠色。余与子由有六男子，皆以童子从子立游，学文有师法，人人自重，不敢嬉容，子立实使然。元祐四年冬，自京师将适济南，未至，卒于奉高之传舍，盖十月二十五日也。享年三十五。

曾祖讳璘，赠中书令，妣田氏，楚国夫人。祖鬷，工部侍郎知枢密院，赠太尉，谥忠穆，妣宋氏，仁寿郡夫人。考讳正路，比部郎中，知濮州，赠光禄大夫，妣李氏，寿安县君。一女初晬，有遗腹子裔。文集十五卷，其学长于礼服，子由谓其文“朱弦疏越，一唱而三叹”者也。七年十一月五日，其兄蘧子开葬于临城龙门乡两口村先莹之侧。铭曰：

知性以为存，不寿非其怨也。知义以为荣，不贵非其美也。而未能忘于文，则犹有意于传也。呜呼，百世之后，其姓名与我皆隐显也。

文中可见，苏轼与王适的感情非常深厚，王适既是苏轼的学生、侄婿，还是他的诗友。由此看来，苏氏家族与王氏家族的关系非同一般，从苏轼、苏辙与王适、王蘧、王遹兄弟的友好交往可见一斑。

（河北省文物局）

苏东坡主政杭州面面观

——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典范

乔建功

内容提要：苏轼的民本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一脉相通的。苏轼主政杭州期间，先遇旱灾、后遭水患。他把向朝廷申请得来的救灾钱粮，用以工代赈的方法，疏通运河，修浚六井，整治西湖，使杭州的生态环境步入良性循环轨道。一石数鸟，不愧是科学发展观的典范。

关键词：苏轼 救灾 水利 民本 生态环境 科学发展观 典范

随着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深入开展，我逐渐明白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发展的目的和归宿。科学发展观是执政为民、为民执政治国理念的高度概括，是民本思想的科学表述，也是我党执政理念的一次飞跃。

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以来，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治国方略，对农村全面免除农业税，广大农民群众不但不缴沿袭几千年的皇粮国税，还能领到好几种数量可观的补贴。这是世世代代农民连想都不敢想的天大好事。同时还实施了中小学义务教育、农村合作医疗、贫困群体低保、五保供养、饮水工程等种种惠民举措。凡此种种无不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光辉。我发现苏东坡毕生追求的“民为邦本”的政治主张，与今天我们学习的科学发展观的理念有着惊人的相似。

苏东坡从政四十年，无论是身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甚至被贬谪到天涯海角，时时心系朝廷国家，处处关注黎民苍生。苏东坡在朝八年，为纠正新法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减少给老百姓带来的灾难，冒着极大的风险，曾两上皇帝书，痛陈新法实施过程中的弊病。为坚持“民为邦本”的思想，先是和权倾一时的王安石抵牾，后与炙手可热的司马温公相左，终为现实政治所不容，只得长期流落在外为地方官员。

在苏东坡的政治生涯中，他有十六年曾为官十个州，十二年遭贬辗转四地。几乎每州每地都留下了他体恤民瘼的政绩、亲民爱民的佳话、利国利民的胜迹。功在百代，流芳千秋。其中影响深远、意义重大，最为历代人们所称道，最能体现科学发展观理念的，首推他主政杭州期间的所作所为。

苏东坡由于厌倦朝廷上的党争倾轧，在他的一再请求下，于元祐四年（1089年）三月接旨以龙图阁学士充浙西路兵马钤辖知杭州军州事。时年54岁，正是政治上的成熟期。十八年前，熙宁年间他曾以通判的身份在杭待过三年。杭州的风土人情，他都了然在胸。杭州本是物华天宝，人间天堂。再说此次是以最高军政长官的身份出任旧地，所以他是愉快赴任的。

但是当年七月到任就面临两大难题。时值炼金流火的七月，余杭大地数月无雨，田野干旱，禾苗枯萎，眼见得晚稻无望。糟糕的是去冬今春，淫雨霏霏，积水成灾，早稻难插，六月水退后补

种的晚稻，现在又遇干旱。两次稻作，均遭损害，所以稻米价格扶摇直上。不难预见今冬明春必有饥馑盗贼之忧。

民以食为天。他首先把目前的预期收成和来年的粮食缺口调查清楚，然后于十一月间向朝廷上《乞赈济浙西七州状》，翔实汇报灾情，请求朝廷减收本路上供米一半，禁止公家在本路各州收购稻米，防止粮价暴涨。奏章发出后，他知道各级官僚有报喜不报忧的陋习，更何况这里并没有到灾荒临头，饿殍载道的地步，仅是未雨绸缪之举。他恐怕引起当局的重视，又分头给太师文彦博，宰相吕大防以及门下仆射诸公写信呼吁，敦请他们关注支持。

经过多方申请，终获朝旨，准予保留上供米三分之一，以平价出粜。期间他又用朝廷赐给他用作修缮官舍的一百道度牒先用作救灾。第二年正月，粮食供应果然青黄不接。可贵的是苏东坡并没有简单地用这些钱粮为救灾而救灾，而是用其以工赈灾，疏运河，修六井，浚西湖，兴修水利，不但从根本上治理了水旱灾害，而且把不断上涨的粮价也压了下去。生产、救灾、改变生态环境，三者相互协调、全面发展，一石三鸟，谁能说这不是可持续发展的典范和杰作。

度牒，是出家人的身份证明。宋朝，度牒由中央政府专卖。一个人要出家当和尚，须先买好度牒，才由寺院剃度。政府出卖度牒，是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度牒的价格，因时因地不等。神宗时的官价，每道一百三十贯，但有些地方能卖到六百五十贯。若按米价折合，一纸官价度牒抵白米一百石以上。宋代法律规定，和尚道士可以免除兵役、劳役及其他苛捐杂税，寺院的田产可以免交租赋。所以部分地主就买张度牒，用来逃避租税负担。

苏轼就是拿朝廷赐给他用作修缮官舍的一百道度牒，先照市价卖给苏、湖、常、秀各州的富户换进白米，然后再以低价卖与缺米的县份。这样一进一出，政府势必会吃一定的亏。但在疏解米荒，平抑粮价，稳定大局方面却起了极大的作用。而出粜所得的价款，即使短少一点，仍然可以挑紧要之处修缮官舍。这样一百道度牒和三分之一的上供米，就派上了两种用场，使有效的资源得到了充分的发挥。用苏轼的话说这叫“先济饿殍之民，后完久坏屋宇”。用现代的话说是“一

生产，二办公”，或者“救灾压倒一切”。

水旱灾害之后，必有大疫。果其不然，杭州大旱后，翌年（1090）三月，气候转暖，城内瘟疫大作。苏轼对此采取两项措施，一是设置病坊，二是广施药粥。他拨出结余的经费两千贯，自捐私款黄金五十两，在城中众安桥设置病坊一所，取名“安乐”，遴选僧人主持施医，所需经费从每年的田赋中提取。三年内医愈千人之多。恐怕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面向普通老百姓的公立医院吧！

在设置病坊的同时，苏东坡一面派人广搭粥棚，向穷人舍粥，一面施舍自费配制的“圣散子”药剂。这种药剂全是中下品的药料，成本低廉，每服只要一钱，可是防治瘟疫的药效十分神奇。每天早上用大锅煎煮，不问老少贫富，各服一大碗，就能使疫气不入其门。即使平常无病，空腹一服，也能饮食倍增，百病不生。真是“济世之具，卫家之宝”。在这场瘟疫中，杭州百姓“得此药全活者，不可胜算”。

所谓“圣散子”秘方，是苏轼从眉山异人巢谷处得来的。巢谷视此方如珍宝，不传其子。苏轼与巢谷相交甚厚，苏轼苦求之，方得此方。二人曾指江为盟，永不传人。后在苏轼贬谪黄州期间，时遇瘟疫大发。尽管当时苏轼经济条件十分拮据，但他还是自费配置此药，广为施舍，救活无数生命，并把此方无偿传给当地名医庞安时，并嘱安时著书时要注明是眉山巢谷献方。东坡先生如此博大胸怀，高风亮节，难怪后人对其“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二

救灾仅是治理杭州之标，兴修水利，才是拯救水旱灾害的根本，也是疏通货运，平抑物价的唯一办法。这是需要苏轼解决的又一难题。苏轼到任伊始，就注意到由于干旱，杭州的主要交通命脉——运河干浅，航运阻塞，致使谷米薪刍全面涨价。杭州通南贯北有茅山、盐桥两河。这两条河是沟通大运河和钱塘江的要道，把内河航运和海运联成一片。但在涨潮时，海水挟带泥沙倒灌，极易造成河道淤塞，三两年就得疏浚一次，届时劳民伤财，为害市容，百姓怨声载道。苏轼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接受监杭州商税苏坚的建议，因盐桥河穿市而过，而茅山河绕经东郊，所以让茅山河专受钱塘江之水，并在上游建一水闸，涨潮关闭，潮落开启。即使淤塞，在东郊疏通也不影响市民正常生活。而让盐桥河专受西湖淡水，并让其河床低于茅山河床数尺，在城北两河交会时，流经数里已经澄清的江水，会自动注入盐桥河。有这两大水源的保证，运河再无缺水之忧了。此工程元祐四年十月开工，不到半年，即告成。两河各长十余里，受水深度均在八尺以上，客货船运，畅通无阻。杭州父老众口称赞说，“自三十年以来，开河未有若此深快者也”。在疏浚盐桥河时，河道穿越市区，凡曲折处均设置石柜储水，以供市民汲用洗濯，并可为救火消防之备。百姓生活大大便利，无不拍手称赞。凡此种种，无不彰显以人为本的思想光辉。

杭州临海，水质咸苦。唐朝李泌始造六井，引西湖淡水，供百姓饮用。宋仁宗嘉祐年间，知州沈遘，又开一井，人称“沈公井”。但年久失修，相继损坏，市民饮水成了一大难题。十八年前，苏轼作杭州通判时，曾协助太守陈襄修复六井。并应陈襄之请，撰《钱塘六井记》，石刻于相国井之亭上。

十八年后，六井又告淤塞，时又大旱，军民皆苦无水。苏轼想起前事，就遍寻过去主持修井的几个和尚。结果只有子圭一僧在世。询问方知，上次用竹筒作导管，容易腐烂。这次就改用瓦筒作导管，并置于石槽中，两边再以砖石固护，力求坚固，方保永久。费时不过两月，即完工。西湖淡水几乎遍于全城，家家都有可饮之水了。

六井既修，运河已通，但其水源西湖又排上了日程。杭州西湖三面环山，一角通江，方圆三十里之大。唐朝白居易曾在江口造一石函泄水，可灌溉两岸农田千顷之多。西湖实际是杭州的一大储水池，夏秋之交，群山所受的雨水，流注西湖，周围农田灌溉，市民饮水，皆取于此。西湖淤塞了，山水无所容蓄，雨大则涝。无雨则旱，不但六井无水可供，已疏通的运河也仍得取之江水，一切都将前功尽弃。

杭州西湖在吴越王时代，特派撩湖兵士千人，日夜开浚。自入宋以来，西湖被定为皇家放生地，疏忽了浚湖工作，稍遇干旱，水草丛生，横长蔓出，形成一块块葑田，使湖面越来越小。苏轼说，

十八年前他作通判时，湖上的葑草占十分之二三，现在湖面堙灭将近一半。杭州父老纷纷请愿说，如再不开挖西湖，二十年后将没有西湖了。

钱塘县尉许敦仁也建议，“西湖可开”。他说，打算开挖西湖由来已久，只是历届太守没有能力办好。苏轼和各方面商量决定，既是为民兴利的事，再大的困难，也要办到，遂于元祐五年四月二十三日，上《乞开杭州西湖状》。此状详述了开挖西湖的五个理由，请再赐度牒五十道，配合免交的上供米，采取以工代赈的方法，即可清除湖面的二十五万丈葑草，复旧唐之貌。当时即调兵士，派民工，开挖湖泥。

自开工之日起，苏轼每间日必至湖上，督查工程进展，奔走于砾石泥淖之中。有时忘记回家吃饭，便拿起民工的碗筷，盛碗米饭就吃。有时累了，就到湖边祥符寺琴僧惟贤的房间，脱衣解帽，躺下便睡。我们的东坡先生，当时应该是省部级干部了吧，但能如此和老百姓同呼吸共命运，水乳交融，打成一片，试想还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今天读来仍不由使人肃然起敬，联系现实也不由使人反思无穷。密切联系群众，是苏东坡世代受人敬仰的重要原因，也是每个公务员应该具备的优秀品质，需要我们常学常新，发扬光大。

西湖开挖就面临着一个棘手难题。二十五万丈之多的葑草淤泥开挖出来，往哪里堆放呢？西湖中自东向西原有一条长堤，唐称白沙堤，宋称孤山路。环湖一周达三十里之遥，南北往来，必须绕湖步行，十分不便。苏轼决定，废物利用，把铲挖出来的葑草淤泥在湖中增筑一条通南贯北的长堤，取之于湖，用之于湖，没有比这更经济的了。如此一来，行人便利，葑草淤泥也派上了用场，同时节省劳力，缩短工期，大大加快了工程进度。一举数得，岂不美哉！前后历时仅四个月，湖面葑草铲除，南北长堤竣工。堤西为里湖，堤东为外湖。为了沟通里、外湖以及沿岸各码头之间的船运，长堤上跨筑六座拱桥，宛如六道美丽的彩虹。同时堤上还造九个凉亭，以供游人歇脚小憩。长堤两旁遍植芙蓉杨柳，利用树根的生长盘曲，巩固堤岸。每当春和日丽，这里鸟语花香，游人如织，极富诗情画意，诚如人间天堂。后人称之为“苏公堤”或“苏堤”即始于此。“苏堤春晓”至今还是杭州十大美景之一。

开湖大功告成，举城上下，皆大欢喜。但是

日后葑草一旦再长，如之奈何？钱塘县尉许敦仁又建议，将葑地作田，不如变为菱荡。因为他看到吴人种菱，每年春天一定要将水中的荇藻杂草除净，然后下种。如将开葑以后的湖面辟为菱荡，租给农户种菱，则葑草就无从生长了。苏轼立即接受这个建议，便划定界限，设立小石塔为标记，种菱不许侵入界外湖面，并派专人管理此事。每年向农户收取的种菱租金，专用于维护西湖事项。据说，“三潭印月”即是当时留下的遗迹。苏东坡成就了杭州西湖，杭州西湖也给苏东坡极富传奇的一生，涂上绚丽的一笔。可谓功在百代，彪炳千秋。

三

好像老天故意要考验我们的苏太守。旱灾防疫工作刚过，元祐五年（1090）六月，浙西数郡忽又大雨成灾，太湖泛滥，淹没良田无数，其灾情甚于去年的干旱。太湖区域是两浙的主要产米区，太湖一闹灾荒，两浙的粮食全失去了调剂，来年的饥荒显而易见。苏轼忧心如焚，从七月到年底先后签发七道《相度准备赈济状》。由于救灾及时，仓廪有备，米价没有暴涨，百姓免于流殍。元祐六年（1091）二月朝廷旨下，召东坡回京任吏部尚书。当时正在和有关人员紧锣密鼓地商讨、勘察、计划在钱塘江上游的石门，开一运河，以避浮山之险。三月离杭，还特意绕道苏州、湖州一带水灾严重地区，亲自考察水灾情况，制定治水措施。苏东坡终身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为百姓利益奔走呼号。据不完全统计，在他从政的四十年中，为减轻农民负担，先后上奏状250道之多。如果东坡先生在天有灵，当他知道现在农民已全面免除皇粮国税，还享受一系列惠农政策时，肯定喜极而泣，感慨万千。毛泽东曾经说过“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苏东坡就是一辈子处处做好事，不做坏事的人。因为他心里时刻想着人民，所以人民永远怀念他、敬仰他。《宋史·苏轼本传》说，“轼二十年间再莅杭，有德于民，家有画像，饮食必祝。又作生祠以报。”

苏轼在杭，兴修水利工程三项，都是博采众议而成，认为自己不过是“画行”而已。在上报

朝廷的奏疏中，他都一一标明计划创意者是谁，监工督役者是谁，不论官职如何卑微都不抹杀他们的功绩。长官不抢功，所以才能使人人乐于为其效命，这是作为一个领导干部的起码条件，然而具有这种气度的人，似乎不多

苏轼入主杭州，前后不足不到二年，先遇旱灾，后遭水患。他通过积极申请，把朝廷补助的钱粮，在搞好救灾防疫的同时，采取以工代赈的方法，全力开发西湖，使湖葑空去，南北堤通，在堤上架桥设亭，遍植花草，把其打造成世界级的旅游胜地。他又鼓励农户在湖面种菱，使葑草再无生长之机。农户增加了收入，官府向农户收取的租金，再用于维修西湖。利国利民，各得其所。通过整治，西湖涝能蓄水，旱能灌溉，保证运河航行，畅通无阻，民生饮水，惠及全城，从而杭州的生态环境迅速步入一个良性的循环轨道。这是坚持以人为本思想的典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杰作。简言之，是苏东坡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典范。

上述只不过是采撷苏轼主政杭州政绩之一二，生平事迹九牛之一毛。纵观其传奇的一生，苏东坡不但是雄视百代的文学泰斗，更是亲民爱民的清官、好官，是一个始终坚持并身体力行“以人为本”思想的典型政治家。苏东坡为此吃尽苦头，曾被陷害坐牢，贬谪流放，几乎置于死地。但是他始终坚贞不渝，笑傲人生。看来“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在封建专制社会里，是可说，而不可做的，只不过是一个政治口号而已。只有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才能将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升华到科学发展观的高度，并得到认真、切实地贯彻执行。历史沧桑，人轮回转，笔者不由遐想，假若坡翁在世，必将是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优秀代表。可惜其生不逢时。故此，我们更应该珍惜当下和谐的政治环境。

（河南省郏县财政局）

苏颂、苏轼造福杭州人民之考述

邹彦群

内容提要：以苏益、苏洵编写的《苏氏族谱》考证，苏颂、苏轼不仅同祖，而且是叔侄关系；他们先后任杭州知州。在任职杭州期间，他们都关心民瘼，用科学技术造福杭州市民。苏颂在杭州首创自来水，研究和阐述钱塘江潮水洪大的原因。苏轼在杭州兴修水利，疏浚运河；铲除葑草，修筑苏堤；创办医院，编撰《良方》。许多科技遗迹，至今犹存，对当今市政建设亦很有启迪。

关键词：苏颂 苏轼 科技政绩

苏颂是一位誉满全球的科学家，他一人独得七项世界第一。他于北宋元祐三年（1088）研制的水运仪象台，使中外科技史工作者为之叹服。苏轼是一位誉满天下的文学巨星，他的诗文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早在宋代就传到了国外，是一位享誉海外的诗人；他不仅是北宋诗坛的泰斗，而且在科技上也多所贡献，他与沈括编撰的流传至今的《苏沈良方》，他在杭州首创公立医院，都是用科学造福人民的业绩。

美丽的杭州吸引着众多的中外游人，被誉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可人们并不知道对杭州的市政建设，苏颂、苏轼曾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两位先贤都曾用科技造福于杭州人民。他们叔侄二人管理杭州的政绩，是我们不应该忘记的。

一 苏颂任职杭州的科技政绩

（一）苏颂任杭州知州的主要政绩。苏颂是一位终生从政的廉吏，从庆历二年（1042）中进

士，任安徽宿州观察推官，到元祐八年（1093）任宰相。其间他任过江宁、汴京等地方长官，任过吏部尚书、刑部尚书等中央大吏，任过主持水运仪象台研制、《本草图经》编撰的科技官员，也任过两次出使辽国的外交官员。他任职杭州是受命于危难之时，在短短两年里创造了人们交口称赞的政绩。

《宋史·苏颂传》只说：“吴越饥，选知杭州”。未记任职时间。北宋苏颂好友曾肇所写《赠司空苏公墓志铭》也只记：“会吴越饥，择守，上曰：‘苏颂仁厚，必能拊安吴人。’乃命知杭州。”^①也未记任职时间。北宋苏颂同时代的官员邹浩所写《故观文殿大学士苏公行状》记载了任职时间：“九年，以吴越荐饥，选知杭州。”^②可知苏颂任杭州知府应为神宗熙宁九年（1076）。我们在《苏魏公文集》中，查到了苏颂的《杭州谢上表》，最后的署名日期是四月四日。可知苏颂到达杭州的任职时间是熙宁九年四月四日。

明末清初来集之的《樵书》收录了苏颂母亲的杭州府衙廊柱题词，可为苏颂任职杭州时间的旁证。其词说：“吾少从父至此邦，次与夫偕来，今同吾儿，凡三到，尽阅江山之胜。”来集之注说：“宋晋江魏国夫人陈氏，龙图从易女，内翰苏绅妻，丞相苏颂之母，三公皆出为杭州守。”^③

来集之的注解告诉我们魏国夫人陈氏是龙图阁直学士陈从易的女儿，翰林学士苏绅的妻子，宰相苏颂的母亲。一个女人的父亲、丈夫、儿子先后都任杭州知州，这是笔者在中国古代史中所见的独一无二的史料。

苏颂被选为杭州地方长官，是受命于灾难严重之时。熙宁八年（1075）春夏之交，苏杭一带

出现了大旱和大疫。救灾如救火，民情十分危急。曾巩记载说：“熙宁八年夏，吴越大旱，明年春，大疫。是时旱疫被吴越，民饥馑疾病，死者殆半，灾未有巨于此也。”^④

苏颂到达杭州给皇帝的谢表说：“昨奉敕差知杭州军州事充两浙西路兵马钤辖，已于四月初四日到任……会江吴之缺守，方淮海之痔饥。晨食宵衣，上轸帝心之虑；雄藩都府，遽叩使节之荣。奉临遣之叮咛，重忧思之惕厉……臣敢不悉心竭力，求瘼恤灾，以荒政之所宜，为职事之先急。”^⑤

苏颂到了杭州，亲自发放救济粮米，“补败救荒，恩意户至。”将政府的恤民之情送到每家每户，没有辜负神宗的厚望。苏颂在杭州救荒的同时，还平反冤狱。有一次，他出巡时，竟有百余人拦路喊冤。他们说：“我们因转运司责逋市易缗钱，夜囚昼系，虽死无以偿。”苏颂曰：“吾释汝，使汝营生，奉衣食之余，悉以偿官，期以岁月而足，可乎？”^⑥这些人被释放之后，怀着感激之情，营业还钱，都没有辜负苏颂的恩意。既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又使一批不该囚系的人获得了自由。

苏颂在杭州任内所做的第三件值得称道的事，是镇压叛将对中央政府的反叛。《宋史·苏颂传》记载了这件事：“颂宴客有美堂，或告将兵欲乱，颂密使捕渠领十辈，荷校付狱中，迨夕会散，坐客不知也。”这种临危不乱，从容处置的风度，实在令人敬重，史称美谈。

苏颂的长孙苏象先在《魏公谈训》中，记载苏颂任职杭州时说：“祖父既至，平易不扰，唯民所利，悉因之，所以赈济拊恤之备至，民遂安堵。至今言及苏公，即以手加额。其后奏对神宗，语及杭事，上曰：‘钱塘之政，民至今歌咏。’”^⑦

（二）用科技造福于杭州人民。据《宋史·河渠志六》记载：熙宁七年任中书检正的沈括上书请求兴修两浙水利。他受诏相度两浙水利，修筑和疏浚了浙西、浙东堤防河道，修补了海塘。熙宁十年春，苏杭的旱灾、大疫已过，流民归乡，生产复苏，稻麦丰收。秋收后，苏颂组织民众修补海塘，防止大潮浸吞庄稼和碱潮泛滥盐化良田。

深秋的钱塘观潮是杭州府的一大盛事。苏颂一面告诫官吏事先做好民众的安全工作，防止发生拥挤落水等事故。一面亲自踏察海塘，观测海

潮，研究潮汐发生的原因。在与民众共同观看钱塘大潮之后，他写了《观潮三首》和《续观潮》等诗。其中有“海门双峙隔沧溟，潮汐翻波势若倾。万叠银山横一线，千挝鼍鼓震重城。来无源委逢秋盛，信有盈亏应月生。古今循环曾不涸，谈天闳辩岂能名？”^⑧他在诗中阐述了潮汐的成因，明确指出潮汐的规律是秋天的潮水最大，潮汐发生的原因是“盈亏应月生。”这与现代的科学解释，潮汐因月球引力而生是一致的。这也是他在杭州任职期间留给我们的一项科技贡献。

与苏颂同时代的科学家沈括是中外敬慕的，但他只是批判了卢肇日落激水成潮的谬说，阐述潮汐成因时，并没有达到苏颂这样接近真理的程度。沈括早苏颂两年来浙江兴修水利，他也仔细观测海潮，研究潮汐的成因。他在《补笔谈》中说：“予常考其行节，每至月正临子午则潮生，候之万无差。此以海上候之，得潮生之时。去海远，即须据地理增添时刻。”^⑨沈括只是记载了潮生的准确时刻，并没有探明潮汐发生的原因。世界瞩目的科学家伽利略，十七世纪时，还反对月球影响潮汐的理论。相比之下，苏颂是何等超群出众。

综上可知，苏颂不仅是一位政治家、科学家，而且是一位好市长，一位才华横溢的大诗人。他用科学造福于杭州人民的政绩，他吟咏潮汐成因和规律的诗篇，也是中国古代科技史上值得骄傲的篇章。

苏颂在杭州任内的最重要的科技政绩是首创自来水。该政绩收于《苏魏公文集》卷3的《石缝泉诗》，诗中记载了在杭州首创自来水的经过。

杭州市郊有座凤凰山，山上有个石缝泉，其水清澈甘甜。苏颂以前的知州也曾想引入城中，但都没有成功：“前此数欲疏引入州治，久不克就。予至则命工人，寻旧迹，相地架竹，旬月而水悬厅事。又析一支以给中堂，一支以给西阁，其下流，则洒出外庑，往来取汲，人以为利。”苏颂用诗记载了亲自勘察和施工的经过：“我昨寻胜游，偶见为心恻。料工度山原，举步过门戟。”“剪裁竹千竿，接联笕万尺。派别起中阿，架空逾下稷。不及浃旬间，已到堂皇侧。吐溜始涓涓，循除俄虢虢。”

首先使用自来水的是官衙：“公堂及燕寝，股引各疏派。”其次是官绅之家也用了自来水：“何

期南涧流，近在使君宅。日用助烹爨，岁储供醴醕。”苏颂也没有忘记广大民众，使百姓也使用了自来水：“一支出横廊，通衢见勿幂。众器竞爽斗，万口得盥涤。无愧抱瓮人，幸宽携壶役。”苏颂对杭州的水利设施与后辈们寄以殷切的希望，他希望以水利造福民众：“兹泉虽未大，其用已为益。犹有膏润资，更期洒导力。来哲倘不遗，庶几成远绩。”

苏颂、苏轼都曾注意到治理污染，美化城市，造福人民。苏颂把凤凰山的泉溪水引入城中除供饮用外，已用水改造和美化环境。他在《石缝泉》诗中说：“环流随启处，玉音闻几席？尘土汨以消，形容清可睹。谁知簿领中，有此山林适。若非仕江乡，何由见奇迹。智者必乐水，君子以观德。良嘉善上功，所至为利泽。”

二 苏轼两次任职杭州的科技政绩

（一）苏轼两次任职杭州科技政绩简述。苏轼于熙宁四年（1071）七月第一次任杭州通判，离开汴京赴任。十一月二十八日抵达杭州。通判是杭州的副长官，分管司法和狱案。

苏轼第二次任职杭州是元祐四年（1089）三月，以龙图直学士出知杭州，兼任浙西路兵马钤辖。他离汴京上任之前，哲宗的母亲高太后和哲宗皇帝亲赐官袍、金腰带、镀金银鞍、银辔、骏马、银盒龙茶，这是按前宰相的恩宠为他送行，七月三日抵达杭州。这次他在杭州任职两年，元祐六年二月，调汴京升任翰林学士承旨。

苏轼任杭州通判期间，由于和神宗皇帝、王安石的大政方针相左，又是分管“推囚决狱”的副职，不能全力施展其政治才干。只能在权力允许的范围内做些有利于百姓的事。这一点正如其弟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所说：“是时，四方行青苗、免役、市易，浙西兼行水利、盐法。公于其间，常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少安。”⑩

王安石变法期间，盐法尤其严峻。苏轼到达杭州，狱中已人满为患，一年中就有一万七千人违犯盐法被关押。苏轼因忙于审问囚犯，连除夕夜都不能回家。他非常同情那些违犯盐法的人，判决盐犯时他常常流泪。他认为每个人都有求生存、谋利益的权利。私盐买卖者双方愿买愿卖，

又是百姓生活必需，不该处以重刑。他在《题都厅壁》诗中说：“不须论贤愚，均是为食谋，谁能暂纵遣，闵默愧前修。”惭愧的是他无权像李世民那样遣放这些犯人，愧对前贤。

熙宁五年春天，洪水泛滥。他到浙北去救灾，看到阴雨连绵，庄稼被淹的情景，他栉风沐雨，日夜奔波。在《吴中田妇叹》中记下了他的感受：“眼枯泪尽雨不尽，忍见黄穗卧青泥，茅苦一月陇上宿，天晴获稻随车归。汗流肩頹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粞。”十月深秋，他又赴汤村，监督开挖运盐河，看到农民庄稼已熟，不能收获，被强征去挖掘运盐的河道。他也愤愤不平，心急如焚，诗中充满了悯农之情：“盐事星火急，谁能恤农耕？”“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

熙宁六年春，知州陈襄命苏轼解决市民的饮水问题。北宋的杭州，已是人口稠密的大都市，从唐代以来市民的用水就是一个难题。唐代李泌任杭州刺史时，开凿了六口水井，解决了市民的用水困难。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六井已有淤塞之滞。宋代熙宁年间，六井几乎全部淤塞。陈襄决心修浚，将施工的任务交给苏轼。苏轼接受任务之后，深入民众，调查研究，采用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方法，用竹筒做输水管道，将西湖水引入六井和城中，解决了民众的用水问题。第二年浙江大旱，各地都饮水不足，而杭州城中还有水饮牛、沐浴。城中百姓对苏轼输水浚井的政绩感恩戴德，焚香祷告。

元祐四年（1089）四月，出京，七月抵杭，时隔十五年，他再次到达杭州，出任行政长官。他到达杭州时，就看到了运河干浅，河中的载重船要用人或牛拉牵，有时几天出不了城。粮谷难运，米价上涨，严重地影响了市民的生活。

苏轼到达杭州的第一大科技政绩是疏浚江河，以水利工程造福杭州人民。杭城有两条运河，联接大运河与钱塘江，沟通着河运与海运。运河淤塞的原因是因为前任知州王钦若，不懂潮汐的科学规律，为了行船方便，拆掉了拦截海潮的堤坝，潮水拥沙塞河。负责清除河沙污泥的官员，又以某处要堆沙，某处要过水为由，残害百姓，使杭州民众苦不堪言。苏轼七月抵杭，十月开工，次年四月完成。他将茅山、盐桥两河各长十余里的河道全部挖到水深八尺，使大小船只畅通无阻。为了防止潮汐淤沙，严格检测了潮汐涨落的规律，

在茅山河（今东河）和盐桥河（今中河）南面的交汇处建一个新闸门，潮水来时关闸，让挟泥沙的潮水流经茅山河十几里后，再入盐桥河，泥沙沉积在这十几里荒僻而不行船的河段，清淤时也比较方便，不影响正常运输。

另外，开沟引西湖水从涌金门入盐桥河，补关闸时河水之不足。解决了淤塞和运输的大难题。苏轼在杭州的水利工程建设，也是宋代科技史上值得称道的业绩。

苏轼任通判时，曾与陈襄整治六井。十五年后，输水的竹管多已毁坏，六井之水多已供应不继。市民要七至八钱买一斛水。东坡又亲自踏察走访，找到了十五年前参与领导浚井、今唯一健在的子圭和尚。年已古稀的子圭建议用瓦管代替竹管，将瓦管置于石槽内，石槽上加石盖保护，并新增两井，以便供应全城。由于杭州连年受灾，浚河修湖工程不断，为了节省政府的财政支出，减少百姓的劳役负担，他大胆地调用了一千名士兵参加了输水工程。事成之后，东坡将功劳记在子圭的名下。元祐五年（1090）十二月，他向朝廷上书，请求表彰子圭浚井的事迹。朝廷准奏，表扬子圭的善举，并赐法号“惠迁”。取《周易》：“井居其所而迁”之意。六井中最大的相国井，其遗迹至今尚在，它位于杭州市解放路井亭桥边天香楼菜馆前。

苏轼任职杭州的第二大科技政绩是治理西湖。熙宁八年（1075），杭州闹灾，饿死 50 多万人。东坡到任这年，又春涝夏旱，他立即全力救灾。首先，上书朝廷请求缓交部分贡米，赐给僧尼免交赋税的度牒 100 道（每牒可卖 170 贯钱），筹备钱粮救灾。东坡又将救灾与治湖结合起来，采用以工代赈的方法。他上书哲宗皇帝和高太后说明西湖的五大功用：它是朝廷特设的放生池；杭城饮水依靠西湖；城郊良田赖湖水灌溉；运粮河道用湖水供给；杭城造酒仰仗湖水，酒税是朝廷的财源。朝廷增批 100 道度牒，苏轼用这一万七千贯钱雇工治湖，灾民则争抢出工，挣钱度荒。

当时西湖长一种葑草，盖住了半个湖面，大量污泥也需清挖。大量葑草和污泥的堆放是一个问题，东坡想了一个巧妙的办法：西湖南北两岸通行不便，将葑草污泥拦湖堆一道南北长堤，居民和游客多了一条游湖之路。新筑的大堤长 880 丈，宽 5 丈，两旁植柳种花，既可美化，又能固

堤。长堤上修六座拱桥：映波桥、锁澜桥、望山桥、压堤桥、东浦桥、跨虹桥，桥间建九个游亭，供游人休息。全部工程只用了四个多月，苏轼每日与民工一起忙在堤上，饿了就与两浙兵马都监刘景文同民工一起吃饭。

东坡后来任职颍州，回忆修堤一事，给好友赵令畤写诗说：“我在钱塘拓湖绿，大堤士女争昌丰。六桥横截天汉上，北山始与南屏通。忽惊二十五万丈，老葑席卷苍云空……”^①

为了铲除新的葑草，苏轼决定将葑草的湖区，租给农民种菱。每次种菱必须铲草，既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又及时铲除了葑草，所收租金用于浚湖，可为一举三得。为了划分种菱的湖面，在分界处建造三座小石塔，后来形成了“三潭印月”的景观。

林希继任杭州知州，将此堤命名为苏公堤。苏堤为西湖增添新的秀色，南宋画院以“苏堤春晓”为题，描绘了苏堤的美景，列西湖十景之首。至今为中外游人所钟爱。

（二）创办杭州第一所公立医院。救民于灾疫是苏轼创办公立医院的动因。元祐五年（1090）七月十五日，他在《乞赈灾浙西七州状》中说：“熙宁中，饥疫人死大半，至今城市寂寥。”他又在《奏浙西灾伤第一状》中说：“熙宁之灾伤……饥馑既成、继之以疾疫，本路死者五十余万人。城郭萧条，田野丘墟。”^②他在《乞赐度牒籴斛斗准备赈济淮浙流民状》中说：“臣伏望圣慈，愍念淮浙累岁灾伤……若饥毙道路，臭秽薰蒸，饥民同被灾疫之苦。”^③

苏轼多次任地方长官，救灾的经验告诉他：饥馑和疾疫总是并行的。救民于饥饿的同时，必须防疫治病。所以，他在杭州创立了第一所公立医院。

苏轼治湖后的五六月间，连降暴雨，太湖泛滥，大片庄稼被淹，杭州城内，居民家中水深一尺多。苏轼从七月十五日开始，一连给哲宗皇帝和高太后写了六次请求救灾奏书。要求减少贡米一半，并折价为绢银上缴（杭州米价腾升）；请示购进 20 万石米赈灾，钱粮应及时到达。熙宁八年赈灾不及时，死人 50 万；去年赈灾及时，一人没死，而且节省了费用。请求赈灾与防疫相结合，准备好中草药，用于疫区的施粥之中。杭州城当时有 50 万人口，^④却没有一所公立医疗机构。苏

轼边救灾边施药，他派官吏和医生在赈灾的粥锅里放入中草药，为灾民治病强身。遇到危重的病人，他还亲自开方治病。为了救治民众，他后来积累了很多药方，这就是传留至今的《苏沈良方》。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的治病问题，苏轼决定创办一所医疗机构。他率先捐出黄金五十两，从政府的款项中抽出两千贯钱，又向乐施者募捐一些钱，在杭州当时的繁华街区——众安桥，建立一所医疗机构——“安乐坊”。这是杭州城最早的公立医院。

“安乐坊”医院创立于元祐五年（1090）。从苏轼筹集到的资金，我们可以推知医院的规模。嘉祐八年（1063），宋仁宗在汴京增设南北福田院（慈善医院），每年仅给经费五千贯，两院就有病房一百间，收治三百人。^⑩而苏轼办的医院自捐五十两黄金，公费拨两千贯钱，还有乐施者的捐助。其病房不应少于南北福田院。绍定四年（1231），吴渊在苏州创办了杭州同级的医院——“广惠坊”，资金也没有苏轼筹集的多，还“为屋七十间，定额二百人”。从苏轼的医院“三年医愈千人”来看，其规模也不应小于南北福田院和“广惠坊”。

苏轼的医院管理制度是很严格的。主持者是深谙医道的僧人，对主持者规定了医院应治愈的人数“三年满所医之数，赐紫衣及祠部牒一道”，以示奖励。对病人规定了“宜以病人轻重而异室处之，以防渐染。”^⑪这种因病情而“异室处之”的管理措施，对防止交叉感染，巩固疗效是有力的保证。对医生规定“医者给手历，以书治痊失，岁终考其数为殿最。”^⑫医生按规定记载“手历”（病历），年终按治疗得失，给以奖惩。苏轼调离杭州之后，仍在关注他所创办的医院，继续捐钱给医院，以便其扩大与发展。

苏轼在《与毅父宣德书》中说：“蒙遣人致金五两，银一百五十两为赆仪。自黄迁汝，亦蒙公厚饷。当时邻于寒殍，尚且辞避；今忝近臣，尚有余沥，未即枯竭，岂可冒受。又恐数逆盛意，非朋友之义。辍已移杭州，作公意舍之病坊。此盖某在杭日所置，今已成伦理，岁收租米千斛，所活不赀。故用助买田，以养天民之穷者，此公家家法。故推而行之，以资公之福寿，某亦与有荣焉。想必不讶，至于感佩之意，与收之囊中，了无异也。”^⑬

从信中可知：第一，毅父宣德派人送来黄金五两，白银一百五十两以为馈赠之礼。苏轼从黄州迁汝州时，宣德就有丰厚的馈赠。当时苏轼邻于饥寒，尚且辞而未收；现在已愧列近臣，俸禄有余，岂可冒然收受。又怕多次违背朋友的盛意，不符朋友之义，就移送杭州，馈赠给医院。

第二，医院经营得很好，每年可收米千斛，救活许多人。所收钱米，用以买田，来养活更多的穷人，这是按皇帝的爱民之意来办的。后来医院除救治病人，还收养贫病老人、孤儿、乞丐，也是按苏轼的意愿进一步发展的。

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二十日苏轼病逝，病院仍在收治病人。这时医院已迁到西湖边，改名“安济坊”。苏辙为其兄所写的墓志铭中也记载了这所医院：“公又多作饁粥药剂，遣吏挟医，分坊治病，活者甚众。公曰：‘杭，水陆之会，因疫病死，比他处常多’……乃裒羡缗得二千，复发私帑，得黄金五十两，以作病坊，稍蓄钱粮以待之，至今不废。”^⑭从元祐五年到建中靖国元年，医院已创立十一年，仍在收治病人。

崇宁三年（1104），安济坊医院再次搬迁，移至艮山门外。《南宋临安府志》记载：“崇宁三年，降指挥，置居养院、安济坊，以示朝廷惠养元元之意。”^⑮这时医院的性质稍有变化，除收治病人外，兼养年老贫病、孤苦无依之人。

绍兴十三年，由于收养贫病无依的老人与孤儿，医院的所属权，由临安府转给了户部，以便调拨常平仓的钱粮。《南宋临安府志》记载：“至绍兴十三年，奉圣旨，令户部措置。”“行下临安府，将城内外老饥贫乏，不能自存，及乞丐之人，依件养济。遇有疾病，给药医治。每岁自十一月一起，支常平钱米，至来年二月终。每名日支米一升，钱一十文，小儿半之。二十五年以后，又降指挥，更展半月，唯临安府奉行最为详备，赖以全活者甚众。”^⑯

绍兴十三年以后的二十五年，是南宋乾道二年（1166）。这时，医院创办已七十六年，仍在收治病人，“赖以全活者甚众。”医院已兼有了救济院的性质。

苏轼任职杭州的政绩，《宋史·苏轼传》说：“轼二十年间再蒞杭，有德于民，家有画像，饮食必祝。又作生祠以报。”后人盖棺定论的评述，苏轼是当之无愧的。（下转 36 页）

何能一举登极峰

——苏轼黄州诗词创作奇迹小识

涂普生 张龙飞

内容提要：遭受重创的苏轼来到贬谪之地——黄州，逐步寻找到安身、安心和安神之所，奠定了思想、情感的基础；黄州的自然地理、人文氛围与他当时的心境契合、碰撞，让他重新反思自己、观照自然和审视社会，从而创作出传世之作“一词两赋”。

关键词：心灵之家 灵感之源 人生之镜

北宋神宗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二月一日，我国著名诗文大家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因“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到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四月一日离开黄州赴汝州，在黄州谪居了四年零四个月(其中有2个闰月)，共写作诗词文赋札740篇(其中诗词286首)。他在黄州创作的二赋一词(即《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大江东去》)，成为千古奇伟之赋和千古绝唱之词，使其成为中国文坛的一座高峰。《赤壁赋》、《后赤壁赋》双双被收录入《古文观止》。《大江东去》词被誉为豪放词之先宗。以二赋一词为标志，苏轼在黄州隆然形成了他的诗词文学创作巅峰，并且因此登上了北宋文坛乃至自此以后的中国文坛之巅峰，使其成为中国文坛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以至成为“一提到苏东坡，中国总是会心地一笑”人物(林语堂《苏东坡传·序》)。苏轼在京城、在地方州府做过多年的官，也在除黄州以外的地方谪居过，写了大量的诗词歌赋文，为何只在黄州登上文坛极顶呢？区区黄州又何以能够成就苏轼这么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呢？

- 30 -

一 黄州是心灵之家

“乌台诗案”终审结果，苏轼终被免于一死，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苏轼获释，并接到贬谪的通知。当时，惊魂未定的他，写了《十二月二十九日，蒙恩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二首》，其中写了这么两句诗：“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宋神宗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正月二日，苏轼把家眷放在河南，同大儿子苏迈一道，怀着“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的孤寂无奈而随缘自适的心情，动身到黄州。苏轼出河南，进黄州地界的麻城，就有当时的隐士陈慥(字季常)带着两匹高头大马，途中相接，然后迎到麻城的歧亭，小住了几天。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二月一日到黄州。一到黄州他就写了一首名为《初到黄州》的诗：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
长江绕廓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
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
元丰三年二月至五月间，苏轼居住在黄州定惠院，写了一首词《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苏轼的这首词写出来后，有过一些传说。其中有这么一个传说：苏轼被押出湖州，临上船时，有一个姑娘塞给他一包金饰。这个姑娘是碧浪湖边的丝娘，名叫沈娟。苏轼贬到黄州后，还专门打发儿子苏迈到湖州寻找沈娟。沈娟听了苏迈的讲述后，珠泪涟涟，小声地断断续续地说：“今生……福……报无缘矣！”说罢，剪下一绺头发托苏迈带给苏轼，然后溘然长逝。有人说，苏轼的词是为沈娟写的。其实呀，苏轼是托物寄情，状写他当时的孤高、凄清、寂寞而无奈的心情。苏轼一下子由朝廷重臣变为戴罪之人，由“春风得意”变为“愁懑郁怀”，并且差点儿被砍了头。这对他本人来说，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苏轼当时的心境可以这样来概括：死里逃生，惊魂未定；一落千丈，郁闷难忍；身处下州，孤寂凄冷；满腹愁惑，凭谁而问。此时，他思想上矛盾、惶惑、痛苦以及空虚消沉的情绪，是可以想象的。对于首次死里逃生、首度外贬谪居的苏轼而言，这时最最需要的是心灵之家，尽快调整心理。他到黄州后，急切寻求的是安身之所、安心之所、安神之所。尽快做到身安、心安、神安。

应该说，当时黄州为被贬到黄州的苏轼提供了苏轼急切寻求的安身之所。苏轼刚到黄州住在定惠院，后来住在临皋亭。他的住所在长江边上。他看到长江，看到长江之水，想到了四川老家。他在心里想，长江半是峨眉雪水，饮食沐浴皆取之，何必归乡哉……再者，黄州对他来说，有个很好的印象：有鱼、有竹子。黄州也有苏轼消愁散闷的好出处：长江、赤壁。尤其是苏轼生活困难时，“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为余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苏轼高兴得很，并为自己取号为东坡居士。应该说，苏轼在黄州有了一个比较满意的安身之所了。至于苏轼急切寻求的安心之所，苏轼也在黄州寻求到了。黄州城所濒临的长江，是一部底蕴深邃的书。苏轼常到长江边，放眼神游，想到了万里长江上所上演的历史活剧，想到了一些历史人物及其结局，并由此想到了自己的人生，思想上逐步产生了一些意念：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一世之雄而今安在哉？！并由此得出一些答案：“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

而又何羡乎；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同时，黄州有安国寺。安国寺主持继莲大师常请苏轼到寺里谈佛论禅。后来，苏轼几天就去一次，“焚香默坐”、“物我相忘，身心皆空”，并且每月到寺里去洗一次“佛浴”，他觉得不仅洗掉了“身垢”，也洗掉了心上的“荣辱”……这就使得苏轼在黄州寻求到了安心之所。身安下来了，心安下来了，神安之就相随了。他常“幅巾芒履，与田父野老相从溪谷间”，结交了很多的渔人、樵夫、农夫，甚至牧童。苏轼常同牧童一道到黄州东南的黄泥坂放牛，而且常常是晨去晚归，有时倒在草地上唱歌、睡觉，直到日落西山，放牛伢喊醒他，才一道回去。此时的苏轼，可谓“上有保护伞，下有好人际，农时耕东坡，心里少余悸。”他再也不害怕官场倾轧，再也不害怕被人陷害了。可以过着平民，但比平民稍强的日子。于是，他精神上实现了一种解脱，可以做到神安了。苏轼在黄州寻求到了他急切寻求的安身之所、安心之所、安神之所，初步完成了他们的心态、心境调整，并且在这一调整过程中，悟出了很多道理，对人世间的人和事了解得更为深刻，为其在黄州一举登临文坛极峰，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和心理基础。

二 黄州有灵感之源

古时取火需要燧石，写作灵感也需要文学元素这个特殊的“燧石”来激发。

苏轼在黄州之所以能写出佳作，是因为有激发苏轼灵感的特有的文学元素这个特殊“燧石”。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有激发苏轼创作灵感的特有的能与苏轼思想情感契合共鸣的文学元素。这些特有的、能与苏轼思想情感契合共鸣的文学元素，举其要者，即：黄州特有的自然景观，如长江、赤壁、西山等；黄州特有的历史事件，如发生在汉末的赤壁大战；黄州特有的历史人物，如活跃在赤壁大战之中的孙权、刘备、曹操、周瑜、诸葛亮等；黄州特有的文化环境，如黄州曾有杜牧、王禹偁等遗韵，有崇文重教之风尚，有深厚活跃的民间文学等。文学是人学。但在某一个层面上讲，文学是“想”学，是想象之学。想者，相心合一也，即物相、事相、人相与心灵碰撞的思维

活动。想者，有联想、遐想、幻想、奇想之别。但任何之想，都需要触发。黄州所特有的自然景观、特有的历史事件、特有的历史人物、特有的文化环境，与苏轼当时特有的心态及需求相碰撞，便产生了契合和共鸣，产生了灵感，产生了创作激情。这对于苏轼来讲，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就拿黄州的赤壁、长江这些特有的景观来说吧，我们便可见一斑了。在黄州城西北面的黄州赤壁，一说是黄州龙王山的鼻子，属丹霞地貌（即红色摩崖），整座山矶三面环水，一面依山，土石皆为赤色，故名赤鼻。又因赤鼻与赤壁谐音，故名赤壁。一说是“屹立江滨，截然如壁而有赤色”，故称“赤壁”（《大明一统志》）。明代诗人李东阳形容说：“矶头赤壁当天倚，下有山根插江底”（《赤壁图》）至于赤壁之下，波流浸灌，与海相若。黄州赤壁在唐宋时期，就是游览的景点。不仅如此，黄州赤壁蜚声人间，还是因为有了三国时期的“赤壁之战”。这场战争，是我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典范。极有意思的是，苏轼的《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皆是苏轼于宋神宗元丰三年至元丰五年间，游览黄州赤壁之后，由黄州赤壁而生发灵感，并触发创作冲动而创作的。苏轼由黄州赤壁而联想到人间的种种传说，由种种传说而联想到赤壁大战，由赤壁大战而联想到活跃于赤壁大战中的曹操、周瑜、诸葛亮、孙权、刘备等一连串风云人物的沉浮俯仰；由风云人物的沉浮俯仰而联想到自身遭际、自身境况；由自身遭际、自身境况而联想到人间之道、人间之态、人间之理、人间之哲……写作灵感于是被激发，并产生创作之冲动。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横竖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数，不差毫末，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写出千古名篇名作，这是在情理之中的事。可能有人要问，黄州有激发苏轼写作灵感之燧石，有激发苏轼写作灵感之文学元素，这个是客观的。但为什么只会激发苏轼的灵感，而且激发得如此之奇妙呢？其实，理解这个问题并不难。因为苏轼劫后余生，黄州是他的第一个贬谪之所。黄州对苏轼而言，具有别的地方所不可能有的三大激发点和契合点：（一）排遣内心积郁；（二）寻求心灵解脱；（三）寻求新的寄托，乃至“愁向长江觅诗文”。这三大激发点和契合点，对于苏轼人生来说，具有首次、

首需、首求的特点，所以也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唯一性。这样，苏轼在黄州写出传世佳作，是不难理解的。

三 黄州是人生之镜

黄州谪居时期是苏轼的第一个人生反思时期。在这个反思时期，他在革新派与守旧派之间进行了分析与抉择，同时进一步靠近了革新主张，产生了改革、创新的冲动，出现了苏轼人生中的第一个“拐点”。应该肯定，苏轼年青时就有济时之心。（“早岁便怀齐物志，微官敢有济时心”）。他主张对国家“慢慢调养”，做到“事已立而迹不见，功已成而人不知。”只是具有较强的温和色彩罢了。当王安石雷厉风行地推行变法时，他从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政治主张出发，反对这种激进的求治太切的变革，他在《上神宗皇帝书》和《再上神宗皇帝书》中，提出了不同于王安石变法的观点和主张，提出“必畏天，必从众，必法祖宗”和“结人心，厚风俗，存纲纪”的纲领，对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宋神宗皇帝提出了全面责难。然后，请求出京城到地方任职。然后，变法派与守旧派的斗争变成封建宗派的倾轧和报复，并因此发生“乌台诗案”，几至丧命，终被贬谪黄州。所以，苏轼到黄州，是他从政治深渊中刚爬起来后，从生死线上刚转回来后，到达的人生第一站，也是他进入的第一个人生反思时期。抚平创伤，痛定思痛，痛定思因，痛定思前景，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他到黄州后，反思的时间多了，触发反思的时机也多了。尤其是他彻底放下了官架子，到社会底层广泛接触民众，了解民生、民思、民愿、民需，对自己是大有触动的。触动的结果，深化了反思；反思的结果，越发产生了改革、创新的欲望，越发完善和提升了自己的改革主张。所以，当司马光辅朝，全面否定新法时，苏轼又反对尽废新法，要求对新法“较量利害，参用所长”，并坚决反对司马光废除《免役法》而恢复《差役法》，骂司马光是“司马牛”（《铁围从谈》），还上疏哲宗皇帝。不难看出，苏轼谪居黄州对自己人生反思的结果，使自己思想进一步靠近了改革和创新。

（下转 36 页）

人生道路的转折

——谈苏轼对黄州团练副使角色的适应

郭杏芳 刘红星

内容提要：苏轼被贬黄州形同流放，虽有官职实则罪臣，为适应新环境和新角色，他有苦闷、彷徨和怨愤，但他所受的传统教育和思想基础，使他接受现实、适应现实，并做到躬耕自给、文学自适，亲近山水、广交朋友，在文学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思想和精神上成为后世历代文人学士的楷模。

关键词：苏轼 贬居黄州 角色适应

一 从主政一方的行政长官到阶下囚的心理适应

北宋元丰二年(1079)，苏轼因言官构陷的“乌台诗案”而被捕入狱，几至丧命。幸而有兄弟舍命相救，太后力保，加之神宗皇帝爱惜人才不忍杀害，他终得保全性命而被贬黄州。在他有些死里逃生的庆幸而又心有余悸之时，不得不于元丰三年(1080)新春佳节之际，起程赴贬所接受那“不得签书公事”的团练副使的任职；当他因罪臣之身而不得入住黄州官府，只得寓居城北破寺定惠院时，实际上他又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他已不是独挡一面的地方行政长官，虽有个挂名的官职，实则是“着本州安置”的罪臣。他将如何适应这新的角色，如何给自己的人生重新定位呢？

尽管此时的苏轼已在官场历练了近二十年，历任密州、徐州、湖州等地方的行政长官，也认识到了官场的险恶、朝廷内部的勾心斗角。因而多次请求外任，以使自己远离是非中心。在密州时，他对生活和人生已有了相当深刻感悟，力求使自己超然物外。他的《超然台记》集中表现了这种思想。但是苏轼还是未曾料到自己不被朝廷中的一些当权者所容，至其横遭陷害。这打击实在太大，他的政治理想几乎完全破灭。他在这“僻陋之邦”的黄州会被监管到什么时候呢？确

实难料。况且，经过这次从肉体到精神的摧残，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的政治抱负、人生观、价值观都要重新认识、重新定位。

朝廷的决定容易做出，个人的角色转换尤其是内心的转变却难以短期兑现。面对新的人生考验，他既不能像陶潜那样挂冠而去，又不能改变朝廷的决定，那么，就只有接受现实、适应变化。其实，这时最难安置的还是自己的思想和心灵，身份只是外在的因素，内心安定了才可以四海为家，宠辱不惊。

为适应新的角色，面对新的处境，苏轼经历了复杂而痛苦的心灵煎熬，有些畏人畏事，忧谗畏讥。在给一些同僚和朋友的书信中，往往流露出他的愁苦和余悸心情，“轼自得罪以来，不敢复与人事”，最初可能有相当一段时间“不敢作诗与文字”，他还感叹“虽骨肉至亲，未肯有一字往来，有书与之亦不答”，他说“笔墨荒废，实以多难畏人”。任何人要适应一个相对落后地方的生活都有一个过程，何况此时的苏轼只能客居破陋的禅智寺，而他又是知识丰富、情感丰富的诗人，更是被贬之人，自然更容易引起情感的波澜。当他

“宿黄州禅智寺，寺僧皆不在，夜半雨作”时，就记起了少年时在一村院墙壁上题诗中的两句：

“夜凉疑有雨，院静似无僧。”“故作一绝”：“佛灯渐暗饥鼠出，山雨忽来修竹鸣。知是何人旧诗句，已应知我此时情。”苏轼贬谪黄州后的心境是何等凄惶，一般人恐怕难以深入领会，在壁上题此诗的人大约能理解吧；同时，此时此地此情此景，苏轼也理解了那个题诗人的情意及诗中的意境。但他作的诗意境更清绝，可以想见他当时的心境又是何等的凄凉。生活的清苦和精神的寂寞，他还会想办法克服，但对陷他于绝境中的人他却没办法对付，即使被贬黄州远离朝廷，他仍有一种后怕和退避，所以“幽人无事不出门”(《定惠

院寓居月夜偶出》，而要“杜门思愆，深悟积年之非”（《黄州谢表》）。这实际上也是他在调整自己的精神和心态，确立一种让自己能接受的不同于以往的处世态度和人生态度。

事实上，苏轼也不是那么容易被打倒、被困难吓倒的人，他的文学素养和思想修养都使他具有应对变故、适应变化的精神支柱和力量。他的济世思想和政治理想还在心中，正如他《与李公择书》中所说：“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在《与滕达道书》中说：“虽废弃，未忘为国家虑也。”我们想，除有为国为民的忠诚和道义，他还保有读书人的气节，如他所言：“我虽穷苦不如人，要亦自是民之一。形容虽是丧家狗，未肯弭耳争投骨。”

（《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有这些精神内核作支撑，使得他在最悲苦的时候仍保有开朗乐观的生活态度。他《初到黄州》时自嘲：“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这其中既有窘迫愤懑，也流露了随缘放旷的心态，为其后适应新环境和新角色奠定了深厚的情感基础。同时，他还学道礼佛，“厚自养炼”，以“焚香默坐”来达到“物我相忘，身心皆空”的境界。

终于，他摆脱了忧谗畏讥、迷茫彷徨的思想状态，达到了自我调适、自我解脱的新境界。这个自我解脱也并非彻底的真正的解脱，只是求得对自己的心灵有一个交待而矣，还有更深刻地感悟到人生需要的是什么，能得到的又是什么罢了。

可贵的是，不论多么艰难，苏轼都没有颓废、放弃，并且力所能及地对社会对他人伸出援手，对朝廷对皇帝也始终怀着忠诚之心；更为可贵的是他始终没有放弃写作，且在黄州诗文有很大的突破，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曾说“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矣。”（何薳《春渚记闻》）这是他在困苦时表达思想、宣泄感情的最好方式，也同时为后世留下了最宝贵的精神财富。真是诗穷而后工。

二 精神上的自我调适

政治上的巨大挫折，对于一个“奋厉有当世志”的人来说打击不可谓不大，生活上的贫困、身体上的疾病也都可能使人尊严丧失，信心全无。苏轼在他人生第一次遭此巨大打击后，开始对自己过去的言行进行反思。刚出狱时他作诗给弟弟子由说：“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责授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复用前韵二首，其二》）苏轼刚入狱时以为自己必死，

曾托狱卒给子由带了诀别诗，现在出狱了，他又用前韵作诗给子由，以表悔愧之意，似要“改过自新”。若果如此，他的生活一定不会快乐，他的思想和感情也会极度痛苦，他的人生更会失去附丽。那么，现在他的选择要么是在精神上找到另外的寄托，要么是从此沉沦下去，但所受的教育和天性使他不能沉沦，至少不能完全如此。

事实上，初到黄州时苏轼并未放弃过去的政治信念，至少内心没有完全放弃。儒家的入世思想还是他的精神内核，一有适当的机会或朝廷有召唤，他便会全力以赴；但他被陷害被抛弃，现实处境使他不得不借助佛老思想来平复自己的情绪，安放自己的灵魂。即便如此，他的苦闷和调适仍要借助写作来宣泄和抒发，虽为文字所累但仍离不开文字，否则那是要了他的精神生命，成为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也正是凭借他大量的作品，我们今天才得以了解他的心绪和思想、人格和品行。他的苦闷、孤独、迷茫、彷徨以及心有不平和不甘，我们都可以从他的文学作品中品读到。

他谪居黄州初期的一首词，很能看出他的幽怨、不平和不甘。这就是他寓居定惠院时所作的《卜算子》：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词中的意象都是有缺陷不圆满的：不圆的“缺月”、无叶的“疏桐”、落单的“孤鸿”，作为“幽人”独往来的背景显得异常凄凉、孤苦；下片的不甘和怨恨正是情感的自然流露。但抒情主人公并不是一个怨妇或庸俗之人，所以才“拣尽寒枝不肯栖”，而宁肯忍受“寂寞沙洲冷”的清旷和高寒。这正是他初到黄州时的心情写照，一个遭过大难后被贬到远离都城的僻陋之邦，而且剥夺了权力、失去了自由的人，所有的那种对命运的感叹、对前途的失望、对有恨无人省的无奈，以及不肯同流合污、低头屈服的坚持，都通过这首词委婉曲折地表达出来。

今天我们品读此词仍会触动心灵深处隐情而产生共鸣，仍然感受得到“孤鸿”寂寞凄惶而又高傲自许的孤苦与清高。这完全是作者内心的真实流露而不是为创作而创作；这是心里煎熬和心灵挣扎的外现，景物只是情感的意象外衣。

苏轼横遭陷害打击，亲朋无能为力，有的甚至远避；政敌则希望他从此消沉甚或消失。精神层面上无人能拯救得了他，即使弟弟子由也只能想法救其身，给予他亲情的温暖，道义的支持。灵魂的救赎只有靠自己，此时的苏轼大概也有骆宾王《在狱咏蝉》：“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

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的感慨和杜甫的“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的感叹，但他比骆宾王更洒脱，比杜甫更超然，即使“有恨无人省”，也仍然“拣尽寒枝不肯栖”。他想保有知识分子的一点尊严，保有他人格的独立。

正是作者诗词文中所表露的点滴坚守之情，使得他精神不垮，始终保有生活的勇气，并想法调整心情，战胜困难，从容应对苦难，在苦难中发现生活的乐趣和人生的意义。

三 物质和身心上的自我解救

苏轼以罪臣的身份来到黄州贬所，不能住官府，破寺能蔽身也行，但生活无保障，眼看要饿肚子，他不得不担忧。尤其家眷来了以后，都要指望他过活，这可如何是好。此时，他与好友和学生的书信中都提到过生活困难的情形。元丰三年五月在给参知政事章子厚的信中说到他抵黄后的生活：“现寓僧舍，布衣蔬食，随僧一餐，差为简便。”一旦家眷到来更不知如何应对，而“廪禄将绝”，所以“恐年载间，遂有饥寒之忧”（《与章子厚参政书二首》）。元丰三年十一月和元丰四年七月，苏轼在给学生秦太虚和难友王定国的信中，分别描述了自己的生活窘境及如何痛自节俭生活用度：“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大块，挂屋梁上，平日用画叉挑起一块，即藏去叉”（《答秦太虚书》），“所云出入，盖往村寺沐浴及寻溪傍谷钓鱼采药，聊以自娱耳。”此时的心情是“饥寒并日，臣亦自厌其余生”。这种困境他如何能破解呢？所幸天无绝人之路，此时一位对他不离不弃的朋友马正卿到黄州府请得到城东数十亩故营地。于是，苏轼在黄州贬所开始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食其力的躬耕生活。他自取了一个新的名号“东坡居士”，从此，黄州有了新的文化元素——东坡文化，它是将黄州东坡赤壁传向全国、传到海外的一个影响巨大的文化符号。

我们现在说起来很田园很文化的田园生活，当时却是付出了血汗的艰苦劳作。他自己给章子厚的信中就描绘过，“黄州僻陋多雨，气象昏昏”，而旧营地荒芜、贫脊，为了养家糊口，他不得不与家人一道“刮毛龟背上”，捡去瓦砾石块，挖掘薄薄的一层泥土，然后在上面种麦栽茶，自食其力。“东坡居士”这个名号，是苏轼放下读书人士大夫的身架辛苦耕作后得出的。

劳动的结果改变了苏轼的生活状况和思想状态，他建造了茅屋“雪堂”，生活空间扩大了，精神境界也改变了，渐渐变得更豁达洒脱、无欲无畏。经过了几年无望的贬居生活的磨炼，他找到了新的精神支撑，对人生价值有了新的认识。身

心上有了一些轻松和快慰，敢于说“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他自己悟出一条人生真谛：不论是自然还是社会，都“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唯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此造物者之无尽藏也”。（《前赤壁赋》）这可以看作是苏轼赞美江山如画，陶醉其间，忘我地融入大自然之中。同时，这也是身心的一种修炼和自救，是健康正直的人生态度。

明白了取舍得失，心绪变得平和宁静，思想和精神不为外物所役，那又有什么想不开、放不下的呢？东坡初入黄州时曾说：“便为齐安民，何必归故丘。”正如“此心安处是吾乡”，现在即便成为现实，我想他大概也很容易接受了。

其实，他的心情一直是矛盾复杂的，时时处处在用哲人的眼光在观察世界、打量生活，并往往在困苦窘迫之中发现生活之美好，一踏上黄州这“僻陋”之地，就发现了“长江绕廓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的美妙；他懂得在自然中放浪身心是对精神最好的救赎，在答好友李端叔的信中表达了他那种忘记身份得失的生活状况，他说：“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

（《答李端叔书》）这是一种恬淡自适、返朴归真的生活，也是一种思想放松忘却身心痛苦的生活。

可是，疾病与贫穷总是如影随行，因为环境僻陋，条件有限，自然容易遭受疾病的侵袭。苏轼躬耕东坡解决了温饱问题，但多种疾病先后缠住了他很长一段时间，幸而他的坚强意志和无有不可以接受的心态，使他熬过了劫难。臂疾使他结识了一位蕲水名医庞安常。他慕名至麻桥找庞安常医臂疾，并同游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西流，于是有感而作《浣溪沙》词：“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白居易有“谁道使君不解歌，听唱黄鸡与白日：黄鸡催晓丑时鸣，白日催年酉时没”之诗，苏轼反其意而用之。）可见他此时的心态已调理得很好，为劝慰庞安常而借自然山水景物表达了自己所悟出的人生哲理，且积极向上。

四 结语

苏轼在黄州角色的适应过程，我们认为有以下几点：一是从传统优秀的思想文化中寻找精神支柱，炼就应对劫难的能力，并爱惜身体和生命，学会养生。二是靠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养活自己和家人。三是亲近自然，无私而博大的自然能为人

治愈心灵的创伤。四是广交同情理解自己的朋友，友情也可以疗伤。五是听从心灵的召唤，有感必发，形诸文字，创作应是有才华文人最好的情感宣泄方式，作品又是他人了解自己的依据。六是始终保有对生活的干预和对社会关注的热情，尽管被剥夺了权力，但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是剥夺不了的。

苏轼在黄州的角色适应过程便是他人生观的改变过程。他从悲凄彷徨，到镇定自若，进而发出“门前流水倘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的豪迈歌声，并突破自己的陈规创作出大量著名诗文，如前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名篇，便是他人生观、世界观重新确立的过程。能如此遭难而不失志气，历困窘而成就斐然，大概就是宋元明清以来士大夫所推崇他的主要原因吧！

参考文献：

饶学刚《苏东坡在黄州》，京华出版社 1999 年版。

朱靖华、饶学刚、王文龙、饶晓明《苏轼词新释辑评》，中国书店 2007 年版。

石声淮、唐玲玲《东坡乐府编年笺注》，华正书局 1988 年版。

梅大圣《苏轼黄州诗文评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陈迩冬《苏东坡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0 年版。

颜中其《苏东坡轶事汇编》，岳麓书社 1984 年版。

苏轼研究学会《东坡词论丛》，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郭杏芳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学报副主编、副教授，刘红星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基础课部副教授）

（上接 29 页）参考文献：

①《苏魏公文集·附录》，中华书局 1988 年版，曾肇《赠司空苏公墓志铭》。

②邹浩《道乡集》卷三九，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四库全书 1986 年版。

③来之集《樵书·三到堂条》，康熙二十一年刻本。

④曾巩《元丰类稿》（四部丛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出版，《越州赵公救灾难记》。

⑤、⑥苏颂《苏魏公文集》卷三八、卷十，中华书局 1988 年版。

⑦脱脱《宋史·苏颂传》，卷三四〇，中华书局 1988 年版。

⑧苏象先《魏公谈训》卷五，中华书局 1988 年版。

⑨沈括著、胡道静校证本《梦溪笔谈·补笔谈》，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

⑩、⑪苏辙《栾城后集》（四部丛刊本）卷二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年版。

⑫苏轼《东坡全集》（四库全书荟要本 86 册），吉从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⑬、⑭ 逸凡点校《唐宋八大家全集·苏轼》（第 9 册），新世纪出版社 1997 年版。

⑮白寿彝《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⑯李攸《宋朝事实》（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 1986 年版。

⑰雅尔哈善《乾隆苏州府志》卷三，乾隆十三年（1748）刻本。

⑱周辉《清波别志》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

⑲、⑳、㉑《南宋临安府志》，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苏轼《与毅父宣德书》、《济养院》、《济养院》。

（北京第二外语学院教授）

（上接 32 页）

正因为苏轼在黄州出现了其人生的第一个“拐点”，对改革、创新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认识，因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改革、创新意识浸润到文学创作之中。在黄州，苏轼作赋，对汉赋进行了历史性的改革，将政论、游记、散文、诗歌、人物、情节，与赋融为一体。前赋写秋，前乐、中悲、后纵，情感跌宕，字字如珠似玑，寓理寓哲；后赋写冬，理趣、野趣、幻趣，妙趣横生，句句如云似雾，引人入胜。苏轼填词，起兴“大江东去”，气势盖世。全词突兀、放达、铿锵，一泻千里，无羁无绊，波澜壮阔，开一代词风之先河，成为千古绝唱。改革、创新是苏轼在黄州创作的传世佳作的灵魂，是苏轼得以在黄州登上文坛极峰的最耀眼的看点。也是苏轼在黄州之所以能创作传世佳作，登上文坛极峰的最主要原因。

苏轼在黄州一举登上文坛极顶，这件文坛盛事的本身，底蕴极其深厚。对诗词等文学创作，对人生，对处世处事，极富有挑战性和启迪性，是很值得体鉴玩味的。

（涂普生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原党委书记、黄冈市东坡文化研究会会长，张龙飞 黄冈市东坡赤壁风景区管理处党委书记、主任）

是巧合还是天意

——浅谈苏东坡家族与二十七、二十八的难解之缘

王琳祥

内容提要：条分缕析、详细评介了苏东坡家族与“二十七”的难解之缘，简略评介了“二十八”是苏东坡的灾难日，并列举说明了苏东坡家族的年龄与“八”的密切关系。

关键词：二十七 二十八 八 巧合 天意

综观苏东坡的家族，与二十七、二十八这两个数字有难解之缘，然而数百年来，这个奇异的现象常被史学家忽视，本文旨在发端，以供学界方家探讨。

一、父亲苏洵于二十七岁时发愤读书

众所周知，苏东坡的父亲苏洵年少即喜欢游荡，不好读书，但在二十七岁的那一年，幡然猛醒，发愤苦读，终成一代大儒。少儿启蒙读物《三字经》中“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即指此事。

《宋史》卷四四三《苏洵传》记载说：

苏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年二十七，始发愤为学，岁余举进士，又举茂才异等，皆不中。悉焚常所为文，闭户益读书，遂通六经、百家之说，下笔顷刻数千言。

欧阳修在《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并序》中说：

有蜀君子曰苏君，讳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也。……年已壮犹不知书，……年二十七，始大发愤，谢其素所往来少年，闭户读书为文辞。

二、父亲苏洵成家之年，二伯父苏涣二十七岁

苏东坡的母亲姓程，于大中祥符三年（1010）出生，十八岁时嫁给苏东坡的父亲苏洵，时在天圣五年（1027），苏洵当年十九岁，苏东坡的二伯父苏涣当年刚好二十七岁。苏涣出生于宋真宗咸平四年，即公元1001年。

三、苏东坡出生时，母亲程夫人二十七岁

苏东坡出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的十二月十九日，母亲当年二十七岁。

司马光在《程夫人墓志铭》中说：

夫人姓程氏，眉山人，大理寺丞文应之女。生十八年归苏氏。程氏富而苏氏极贫。……府君年二十七犹不学，一旦慨然谓夫人曰：“吾自视，今犹可学。然家待我而生，学且废生，奈何？”夫人曰：“我欲言之久矣，恶使子为因我而学者！子若有志，以生累我可也。”即罄出服玩鬻之以治生，不数年遂为富家。府君由是得专志于学，卒成大儒。……

夫人以嘉祐二年四月癸丑终于乡里，其年十一月庚子葬某地，年四十八。

嘉祐二年即公元 1057 年，逆数四十八，程夫人出生的时间应是大中祥符三年，即公元 1010 年。

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卷一记述说：

公姓苏氏，讳轼，字子瞻，一字和仲，世家眉山，其先盖赵郡栾城人也。宋仁宗景祐三年丙子十二月十九日乙卯时生。

景祐三年即公元 1036 年，苏东坡的母亲当年二十七岁。

四、苏东坡的结发之妻王弗离开人世时年仅二十七岁

苏东坡的父亲苏洵二十七岁开始发愤读书，苏东坡出生时母亲二十七岁，二者之间，似乎只是巧合，然而他的结发之妻王弗在二十七岁时又不幸病亡……

王弗出生于宝元二年（1039）的七月三十日，她比苏东坡年轻三岁。至和元年（1054），十六岁的王弗嫁给苏东坡，苏东坡当年十九岁。

王弗病逝于治平二年（1065）的五月二十八日，苏东坡当年三十岁，儿子苏迈年仅六岁。

在《亡妻王氏墓志铭》中，苏东坡说：“君讳弗，眉之青神人，乡贡进士（王）方之女，生十有六年，而归于轼。”

在王弗病逝一百天的忌日（九月九日），苏东坡亲书《大方广圆经多罗了义经》，并跋其后说：

亡室王氏，年二十七。七月三十日生，乙巳五月二十八日卒，至九月初九日百日斋设，轼为自写此经，以赠净因大觉禅师，庶用追荐。赵郡苏轼书。

五、苏东坡的继室王闰之昵称二十七娘

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七月，苏东坡与弟子由父丧服除。苏东坡续娶王弗的堂妹王闰之为

妻。王闰之系青神人王介的幼女，字季章，当年二十一岁。王闰之因为排行，在家中有二十七娘的昵称。王闰之出生于庆历八年（1048），病逝于元祐八年（1093），享年四十六岁。苏东坡在《祭亡妻同安郡君文》中说：

维元祐八年，岁次癸酉，八月丙午朔，初二日丁未，具位苏轼，谨以家馔酒果，致奠于亡妻同安郡君王氏二十七娘之灵。呜呼，昔通义君，没不待年。嗣为兄弟，莫如君贤……

六、侍妾王朝云与苏东坡相差二十七岁

苏东坡的侍妾王朝云与苏东坡的年龄相差恰好二十七岁。绍圣三年七月，王朝云在惠州不幸病逝，年过花甲的苏东坡在《朝云墓志铭》中悲痛地记述说：

东坡先生侍妾曰朝云，字子霞，姓王氏，钱塘人。敏而好义。事先生二十有三年，忠敬若一。绍圣三年七月壬辰，卒于惠州，年三十四。

绍圣三年，即公元 1096 年，当年，王朝云三十四岁，苏东坡六十一岁，两个人的年龄相差恰好二十七岁。

七、王朝云进入苏家，王闰之刚好二十七岁

王朝云于熙宁七年（1074）进入苏家，出生于庆历八年（1048）的王闰之，当年刚好二十七岁。

王朝云十二岁进入苏家，将王闰之与王朝云当年的岁数合计起来又正好等于苏东坡当年的岁数三十九。

八、苏东坡的弟弟苏辙小号九三郎

苏东坡的弟弟苏辙与苏东坡的结发之妻王弗出生的年份相同，也是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苏辙字子由，一字同叔，又称卯君，其乳名为九三郎。

陆游在《老学庵笔记》卷一记载说：

东坡先生与黄门公南迁，相遇于梧藤间。道旁有鬻汤饼者，共买食之，粗恶不可食，黄门置箸而叹，东坡已尽之矣。徐谓黄门曰：‘九三郎，尔尚欲咀嚼耶？’大笑而起。

黄门、九三郎皆指苏辙。九三相乘，得数为二十七，这其中似乎也存在着某种联系。王弗病逝之年，苏辙也是二十七岁。

九、苏东坡步入仕途，第一个生日就是二十七岁

苏东坡自己与二十七的关系也很密切。步入仕途，他在凤翔签判任上度过的第一个生日就是二十七岁。

苏东坡与弟苏辙于嘉祐六年（1061）八月应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问，苏东坡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的官职。这一年，他的年龄是二十六岁。

苏东坡于当年十一月出京，十二月十四日抵达凤翔。十二月十九日是苏东坡二十七岁的生日，也就是说苏东坡在凤翔签判任上度过的第一个生日就是二十七岁。

古人计算年龄，出生之年即为一岁。按照六十花甲的顺序，苏东坡出生的景祐三年岁在丙子，而嘉祐六年岁在辛丑，生日一过，意味着苏东坡已经步入二十七岁。

十、苏东坡接触佛经涉猎佛书的时间，始于二十七岁

苏东坡步入仕途之前，热衷于道家之事，对佛家之事不甚经意。由于凤翔府监军王彭的影响，他在二十七岁时开始接触佛法，涉猎佛经。

苏东坡在《王大年哀词》中记述说：“嘉祐末，予从事岐下，而太原王君讳彭，字大年，监府诸军。居相邻，日相从也。……尤喜予文，每为出一篇，辄拊掌欢然终日。予始未知佛法，君为言大略，皆推见至隐以自证耳，使人不疑。予之喜

佛书，盖自君发之。”

王大年名彭，笃信佛法，是个虔诚的佛家信徒。苏东坡为凤翔签判时，王大年为凤翔府监军。

十一、苏东坡二十七岁时，二伯父苏涣无疾而终

苏东坡二十七岁的那一年，他的二伯父苏涣在提点利州刑狱任上无疾而终。

苏东坡的弟弟苏辙在《伯父墓表》中记述说：“嘉祐七年八月乙亥，无疾暴卒。吏民哭者皆失声，闻人闻之，罢市，相率为佛事市中以报。享年六十有二。”

嘉祐七年即公元1062年，当年，苏东坡二十七岁。

十二、苏东坡长子苏迈二十七岁时，其伯父苏不疑病逝

苏东坡的堂兄苏不疑，字子明，系伯父苏涣之中子，官承议郎，病卒于元丰八年（1085）。

苏东坡于元丰八年与杨元素写信说：“适得乡音，堂兄承议名不疑丧亡。”

苏东坡的长子苏迈出生于嘉祐四年（1059），二伯父苏不疑病逝于元丰八年，苏迈的年龄刚好二十七岁。

十三、苏东坡中子苏迨二十七岁时，王朝云在惠州染疫身亡

绍圣三年（1096）七月五日，王朝云在惠州染时疫病亡，年仅三十四岁。当年苏东坡的次子苏迨刚好二十七岁。苏迨出生于熙宁三年（1070）。

十四、苏东坡的孙子苏符二十七岁时，苏辙病逝于颍昌

苏东坡的弟弟苏辙病逝于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十月三日，享年七十四岁。苏辙病逝之年，苏东坡的孙子、苏迈的次子苏符刚好二十七岁。

苏符出生于哲宗元祐元年（1086），字仲虎，因幼年时代即能作诗，苏东坡称其为“作诗孙”。

苏符于二十七岁时因苏辙去世，以遗恩授假将仕郎走上仕途，又于绍兴五年赐同进士出身，除尚书司勋员外郎，官至权礼部尚书兼侍读。苏符晚年自号白鹤翁，回蜀隐居养老不出。

苏符卒于宋高宗绍兴二十六年（1156）七月，享年七十，诏赠左中奉大夫，累封眉山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绍兴三十一年（1161）十二月己酉，葬于眉山县修文乡顺化里。

苏符是苏东坡的子孙中官职较高者，也是苏氏家族自苏洵之后归葬眉山的第一人。

四川眉山苏氏家族与二十七这个数字的不解之缘，至苏符归葬眉山，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在苏东坡的家族中，除了二十七这个数字与他们的关系密切之外，二十八这个数字与苏东坡也有难解之缘，甚至可以说是他的灾难之日——

以上说过，苏东坡的结发之妻王弗病逝于治平二年（1065）的五月二十八日，这一天对于苏东坡来说，无异地裂山崩……

元丰二年（1079）的七月二十八日，苏东坡在湖州因“乌台诗案”遭到逮捕，这一天应是他一生中最为屈辱的一天……

当年的十二月二十八日，苏东坡获释出狱，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令御史台差人转押前去。这一天对于苏东坡来说无疑是死里逃生……

元丰七年（1084）的七月二十八日，苏东坡的幼子苏遁（干儿）夭折于他流寓江淮的途中，干儿的母亲王朝云哭得死去活来，这一天最让苏东坡刻骨铭心……

三次不堪回首的痛苦事件，虽然都发生在二十八日，但对于四十九岁的苏东坡来说，也许他会感觉这仅仅只是一种巧合。此时的苏东坡绝不会想到自己将在十七年后的这一日子，也就是建中靖国元年（1101）的七月二十八日，在常州撒

手人寰……

五月二十八日和七月二十八日，对于苏东坡来说无异于生死之关。

除二十七、二十八之外，苏东坡家族的年龄与“八”这个数字的关系也很密切。

苏东坡的父亲苏洵与苏东坡的伯父苏涣相差八岁。

苏东坡出生时，父亲苏洵二十八岁。

苏东坡的母亲程夫人十八岁嫁给苏洵，病逝于四月八日，享年四十八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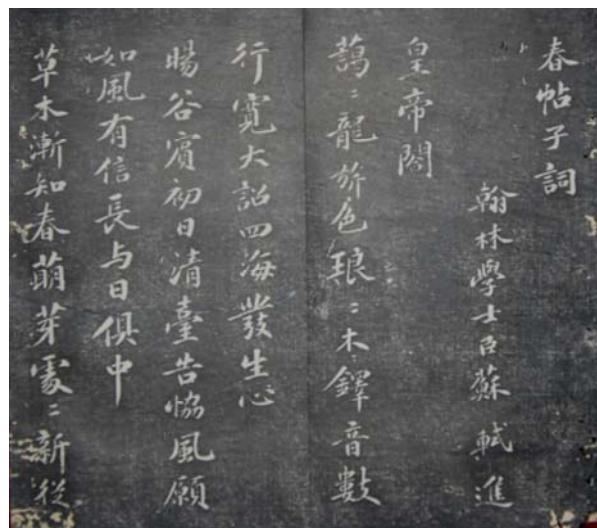
苏东坡的父亲苏洵病逝时五十八岁，弟弟苏辙当年二十八岁。

苏东坡的继室王闰之病逝之年，苏东坡五十八岁。

苏东坡家族与二十七和二十八这两个数字的关系密切得如此异常，是巧合还是天意，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此文旨在抛砖引玉，谨供大家参考。

（湖北省黄冈市东坡赤壁风景区管理处副研究员馆员）



（苏轼《春帖子词》局部）

三苏父子的出生地

——眉山市纱縠行

何家治

编者按：本刊第15期、第18期和本期分别刊载了王琳祥《三苏故居初探》、赖正和《也探三苏故居》和何家治《三苏父子的出生地》。我们认为纱縠行是三苏故居确凿无疑，不否认有乡下的或者城里的其它故居存在的可能，但暂时没有发现三苏诗文的确凿证据，其它文献（特别是北宋以后的）的记载，很可能有出入，至于三苏父子出生地，也不能肯定。

内容提要：三苏父子的出生地，近千年，学界从未有任何异议，均公认南宋施宿《东坡先生年谱》、傅藻《东坡纪年录》记载：“（东坡）景祐三年丙子，十二月十九日卯时，生于眉山县纱縠行私第”之说。而民国十二年版《眉山县志》载，“三苏父子皆生于拨股祠”之说，为清光绪七年刘鸿典首说，此为孤证，不足为凭。

关键词：施宿《东坡年谱》 刘鸿典记 倏居 眉山三大家。

一 苏轼出生于眉山县城纱縠行私第

查三苏祠博物馆现存资料，王水照《苏轼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84年版）附录载宋施宿《东坡先生年谱》：“（东坡）景祐三年丙子（仁宗在位之十五年），先生以是年十二月十九日卯时，生眉山县纱縠行私第。”施宿，字武子，嘉泰间以朝散大夫提举淮东常平仓。嘉定二年新知吉州，旋罢任；六年，病故。此谱始编于南宋嘉定

六年，原载宋版《施顾注苏诗》，篇首有陆游作序。陆游在淳熙年间曾数次亲到眉山拜谒三苏，并写下《眉州披风榭拜谒东坡遗像》等诗。陆游为之作序，肯定了施宿的研究成果。由于该书稀少且流传不广，康熙时邵长蘅谓，“施氏谱无考”（曾枣庄《苏轼研究史》），因此，《施顾注苏诗》及施谱（以下简称施宿《东坡先生年谱》为施谱）清代许多学者也未曾拜读。

四川大学中文系唐宋文学研究室编纂《苏轼资料汇编》（全五册，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五册刊载了三部南宋编东坡年谱：施宿《东坡先生年谱》、王宗稷《东坡先生年谱》、傅藻《东坡纪年录》。傅谱（傅藻《东坡纪年录》以下简称傅谱）载：“（东坡）景祐三年丙子，十二月十九日卯时，公生于眉山县纱縠行私第。”该《纪年录》略作于南宋中叶以前。以上施谱和傅谱均对东坡出生地作了同一的表述，都认为东坡出生于眉山县纱縠行私第。以上两例，是东坡出生地的有力证据之一。

王水照《宋人所撰三苏年谱汇刊》（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89年版），影印汇集出版了宋人五种东坡或三苏的年谱。曾枣庄等编著《苏轼研究史》中说：

此书不仅影印出版了广泛流传的王宗稷《东坡先生年谱》最早版本明成化四年程宗刻《苏文忠公全集》本和傅藻的《东坡纪年录》的最早版本宋黄善夫家塾刻《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本；而且还搜集影印出版了国内早已失传的何纶《眉阳三苏先生年谱》

的日本明古屋蓬左文库藏旧钞本；原为富冈铁齐旧藏，1963年日本已故著名学者田淳之助于京都旧书肆购得，并于1965年影印于与小川环树影印合编《苏诗佚注》的宋施宿编《东坡先生年谱》；日本天理图书馆藏明《永乐大典》本中孙汝听《苏颖滨年表》（孙氏所著《三苏年表》仅存一种）。

把宋人编三苏年谱作为研究三苏生平的权威材料，宋以来至今的苏学研究者均奉为圭臬。

《中国苏轼研究》（第四辑，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主办，学苑出版社出版2008年版）刊载了中华书局编审刘尚荣的研究文章：《宋刊施顾注东坡诗影印弁言》，该文分为四部分：书名辨正、注家考略、价值评估、残帙概述。全面评价了该书的重要性。刘先生认为：“全书编年与诗注，正文与年谱，偶见疏漏，然则瑕不掩瑜。综合考之，本书版本绝佳，编年优胜，正文（含东坡自注）精准，注文多新意，年谱有特色。是治苏学者不可不读的孤本秘籍。”还说，“孔凡礼新编《苏轼年谱》的重要参考书之一是施宿《东坡先生年谱》”。

因此，从南宋至今八百多年间，研究三苏生平的学者普遍认为，苏轼出生于眉山县纱縠行私第是确凿无误的。

二 民国十二年《眉山县志》首载清光绪七年《刘鸿典记》

为了便于苏学界了解《刘记》（以下简称）的全貌，在此有必要照录全文：

《刘鸿典记》：眉城纱縠行有三苏祠，旧相传为三苏故宅。而州西七十里有拨股祠，亦相传为三苏故宅。说者谓：三苏父子皆生于拨股祠，既乃迁于纱縠行，理合然也。年湮代远，土人窜塑东岳神于祠中，而三苏父子之像反居旁殿，讹以传讹，而拨股祠之名几为东岳庙所掩矣。吾师李西沤先生侨寓眉州，游山至三苏场，周览拨股祠基址，而慨然叹曰：形如飞凤，秀气特钟，此真三苏故宅也。东岳神之塑胡为乎来哉！且夫名流寄迹之区，山川借以生，虽雪泥鸿爪，异世犹侈为美谈。况乎墩姓为公，墨池无恙，而顾忍使其通于他族之处，混于非鬼之祀耶！

查元、明以来，此地即有三苏祠。而今

所谓场者，嘉庆二十年始兴，因三苏祠故得名。至拨股之说，或云拨一股族人，或云拨一股祀产，姑存待考。先生遂与场中绅士蒋世芳等谋，拟另建一庙以祀东岳，而以拨股祠祀三苏。金以为可，而以筹资为难。先生曰，无难也。于是倡捐二百金，募化数百金。其有不足者，皆蒋世芳等募化以足之。厥功告成，而先生始离眉州，至成都主讲锦江书院。典屡求先生作记，先生应而未果，一似不欲居其功者然。然三苏之拨股祠，淆于东岳庙，非先生之力，拨股祠不显。而典从先生游最久，又深知先生之为拨股祠煞费苦心，苟不表而出之，后之人虽知有拨股祠，而先生重修拨股祠之功，久且湮没而无闻矣。

计先生寓眉州八九年，曾主讲眉山书院二年，而修金尽用之拨股祠。三苏父子有灵，能不叹先生之外无知己乎。先生尝有咏东坡生日诗云：“我生后生六百年，公生让我二日先。……不恨古人不我见，神之来号相固旋。命宫磨蝎亦何有，文章事业两不朽。平生一事差胜公，公三蕉叶我三斗。”先生之神交东坡如此。

典飘零异乡，今日偶归，固亲诣三苏场，谒拨股祠。父老为予言，先生移庙修祠之颠末，甚详。董其役者，武生蒋世芳、龙溪文生马遇兰、芳林，均已物故。而年近九十之者民杨凤鹤，九皋犹存，即昔日馆先生之主人也。问先生募诸人簿，皆遗失。而独记州刺史犹青圃捐金一百焉，事在咸丰八年。今则光绪七年，而先生已返道山十九年矣。爰为之补记，以勒诸贞珉云。

《刘记》：“眉城纱縠行有三苏祠，旧相传为三苏故宅。而州西七十里有拨股祠，亦相传为三苏故宅。说者谓：三苏父子皆生于拨股祠，既乃迁于纱縠行，理合然也。”以上这段话说眉山有两处三苏故宅，一在城内纱縠行故宅，宋施谱和傅谱也有确凿的文字记载。而州西拨股祠也说是三苏故宅，还说是三苏父子的出生地，其依据在哪里呢？《刘记》全文从开篇到结束，共用了十三次拨股祠，只用了两次三苏祠。拨股祠，当地人谓之拨股庙，没有任何人说是三苏祠。《刘记》中说：“至拨股之说，或云拨一股族人，或云拨一股祀产，姑存待考。”此正是拨股祠的真实含义。照此一说，就应该寻找这一股族人是从什么时候、

什么地方迁徙而来。拨股祠元代是否存在,《刘记》没有给出详实可靠的答案。眉山纱縠行三苏祠始建于元代,近年来通过考证,方才有了定论:一是通过《四川通志》上的记载。二是2001年通过韩国学者洪瑀钦的论文记载:元代延祐三年,高丽诗人李齐贤到峨眉山祭天,路过眉山,拜谒了三苏堂,留下了诗句,才证明了元代建三苏祠是事实。《刘记》没有任何佐证说明元代就有了拨股祠,更遑论宋代会有三苏祠?记中说:“查元、明以来,此地即有三苏祠。”奇怪的是,乡人始终只称拨股庙?而不称三苏祠?尽管这一说法没有任何依据和佐证,姑且认定其为事实,但由此也只能说明,这一股族人是元代从某处迁徙而来,聚族而居,修建了拨股庙,为彰显家族身份,故塑三苏父子塑像于庙中供奉。可以这么认定,拨股祠与三苏故宅和出生地没有任何干系。

《刘记》作于清光绪七年,他的老师李西沤事在咸丰八年。三苏场名始兴于嘉庆二十年,所以在眉山现存最早的《眉州属志》(清嘉庆四年出版)中未有记载。仅在民国十二年出版的《眉山县志》中第一次出现。此一孤例、孤证,不足为凭。

三 关于三苏出生地争论源起

1987年,眉山县举办纪念苏轼诞辰950周年活动,同时召开了全国苏轼学术研讨会。眉山学者叶权先生交了一篇论文,题目是《苏轼的家庭与出生地址初探》,后刊载于四川师范大学学报丛刊第十三集即《三苏散论》中。这篇论文是解放后学界召开研讨会第一次以探讨三苏出生地为命题的论文。该文的主要论点无非是拨股祠一说和“僦居”一说。作者且是眉山本土人。此文刊出,没有引起苏学界专家们的注意,也未产生什么影响。学术论文,只是一家之言,供大家讨论无可厚非。十年后,即1997年,眉山学者、东坡诗社社长彭泽良编著了一本内刊书,书名叫《孕奇蓄秀一眉山》,这本书的第三编有一条醒目的标题《三苏生长地——三苏乡拨股祠》,首次将三苏出生地武断地定性在拨股祠。2002年9月,眉山东坡诗社社刊《远景》诗刊第10期刊载了孙开中先生的论文《纵论苏东坡的成才环境》,继续支持叶

权、彭泽良二先生的论点。苏轼研究学会主办的《苏轼研究》(2008年第4期),发表了湖北黄冈市东坡赤壁管理处王琳祥先生的论文《“三苏”故居初探》。这篇论文所谓有力的论据有二:1.僦居纱縠行,2.拨股祠。与眉山以上诸君一样,没有提供任何新的佐证。只是又将以上诸君的观点重新进行了一次初探而矣!除此而外,王先生也和以上诸君一样,将苏轼的诗文进行推论、附会、臆测。2009年3月武汉长江出版社出版眉山人刘川眉先生著《眉山苏洵》一书。开篇“世系家风”:“苏家住在县城以西的凤凰山,离城约七十里。这凤凰山不高,……确实形如一只灵秀的凤凰。对面,还有一座松林茂密的山,叫三峰山。两山东西对峙,形成双凤齐飞的态势。”这则文字显然是《刘记》拨股祠一文的翻版。不知为什么,宋人编的苏谱今人一概视而不见!却听信清代一位书院主讲的随口一句话,并把它作为三苏父子出生地的依据,岂不怪哉?我个人认为,推论应建立在确凿的历史事实基础上为好。

四 关于僦居纱縠行之说

苏轼《记先夫人不发宿藏》:“先夫人僦居于纱縠行,一日,二婢子熨帛,足陷于地……会吾迁居,之间遂僦此宅。”三苏父子的文集中关于苏家“僦居”的文字记载,仅此一条。僦居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切不可以此就断然认为:三苏父子就一定出生于拨股祠。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苏轼的祖父苏序是一位不大的地主,家中衣食无忧,还能接济穷人。难道拥有土地的地主就一定住在乡下?地主就不是农民?这句话不符合客观事实。相反,我却认为,有土地的地主既可能住乡下,也可能住在城里。解放初期,眉山城里居住的地主不在少数,其田地均在乡下,只不过每年定时下乡管理和收租罢了!另外,是否只有乡下人才会进城租赁房屋居住或经商?居住在城里的地主就一定不会租赁房屋居住或经商?显而易见,这些论调均不能成立。

王先生在《初探》一文中“解读骑驴入城”时,一方面引证苏轼《苏廷评行状》:

李顺反,攻围眉州。公年二十有二,日操兵乘城。会皇考病没,而贼围愈急,居人

相视涕泣，无复生意，而公独治丧执礼，尽哀如平日。太夫人忧甚，公强施施解之曰：“朝廷终不弃蜀，贼行破矣。”

苏轼关于祖父苏序 22 岁时守城，抵抗李顺的农民军，并为病逝在城中家里的父亲苏杲举办丧事的事在淳化五年（994），承认苏家居住在眉山城中。另外又引证苏轼的学生李方叔《师友谈记》：

祖父嗜酒，甘与村父箕踞高歌大饮……一日，方大醉中，（伯父）封告至，并外纓、公服、笏、交椅、水罐子、衣版等物。太傅时露顶，戴一小冠子，如指许大。醉中取告，箕踞读之毕，并诸物置一布囊中。取告时，有余牛肉，多亦置一布囊中，令村童荷而归，跨驴入城。城中人闻受告，或就郊外观之。遇诸涂，见荷担二囊，莫不大笑。……惟有识之士奇之。

苏序在城郊饮酒接受儿子苏涣的封告，“令村童荷而归”，这个归字说明是回城中的家，遂“骑驴入城”。这段事实王先生也承认苏家居住在城中。但是王先生却在其结论中偷换概念，反问：苏家既然世居城内，苏轼的母亲程夫人用得着“僦居于眉之纱縠行”？并武断地认定：“表明在这之前绝不是住在眉州城内。”大家知道，苏轼祖父苏序家房屋敝陋不葺，儿子有苏澹、苏涣、苏洵，三房人均已成家立业，苏澹的儿子苏位仅小苏洵五岁。家中兄弟，侄儿男女众多，房屋拥挤不堪在所难免。待到程夫人主持家业时，由于苏序好施予：“至数破其业，厄于饥寒。然未尝以为悔，而好施益甚。”（李方叔《师友谈记》）为振兴苏家，程夫人卖掉了自己的陪嫁，“即罄出服玩鬻之以治生”（司马光《程夫人墓志铭》），于 26 岁挑起了全家的生活重担。这一年是景祐二年（1035）苏洵二十七岁，并始大发愤。程夫人僦居应在此年。第二年苏轼出生，宝元二年（1039）苏辙生，庆历四年（1044）苏辙六岁，随兄天庆观读书。北宋时，眉山商业不发达，且商业是士大夫不耻的行当。当时眉山的蚕桑业却很兴盛，在城西纱縠行已形成蚕市一条街，纱縠行的蚕市与成都的蚕市一样活跃，“蜀锦”已闻名遐迩。苏轼《和子由蚕市》：“闲时尚以蚕为市，共忘辛苦遂欣欢。去年霜降研秋荻，今年箔积如连山。破瓢为轮土为釜，争买不啻金与纨。忆昔与子皆童丱，年年废书走市观。”程夫人僦居纱縠行，以临街的店面作为商铺，雇“二婢熨帛”，经营与蚕丝有关的生意。

店后面一家人居住其内，兼顾生意和家事。另一方面，又投资购置土地。程夫人精明干练，精打细算，至庆历五年（1045）程夫人主持家事近十年，“（苏家）不数年遂为富家。”（司马光《程夫人墓志铭》）苏家富了之后，程夫人打算维修纱縠行老宅。苏轼《梦南轩》：

元祐八年八月十一日，将朝尚早，假寐，梦归縠行宅，遍历蔬圃中。已而坐于南轩，见庄客数人，方运土塞小池，土中得两芦菔根，客喜食之。予取笔作一篇文，有数句云：“坐于南轩，对修竹数百，野鸟数千。”既觉，惘然思之。南轩，先君名之曰“来风”者也。

原纱縠行破旧狭小的老宅，经程夫人整修、翻新、扩大后，苏家庭院足有五亩之多。縠行宅是什么样的呢？苏轼《南轩梦语》为我们简略地作了描述：中有池塘、菜畦、庄客、笼竹，有疏竹轩、南轩等。苏家新宅院完工之后，程夫人才“会吾迁居”，搬入新居中。此宅正是今日之三苏祠旧址。若按王先生的说法，苏家发家之后，又搬回所谓僻陋的“江上宅”居住，那“縠行宅”又作何解释呢？

五 眉山城里“苏、程、石”三大家，不可能同居拨股祠

苏轼《送表弟程六知楚州》：“炯炯明珠照双壁，当年三老苏、程、石。”这句诗至少说明苏家、程家、石家在眉山城里的知名度和亲密关系以及大家地位。以上三家先后成为仕宦之家，是世姻关系。石昌言，名扬休，后官至知制诰。其弟石扬言娶苏洵姐姐为妻。苏轼长子迈后又娶石昌言之孙女为妻。苏轼《与迈求婚启》：“里閈之游，笃于早岁。”这是苏轼写给石昌言的儿子石幼安的一封求婚启。这句话说明苏、石两家很早就有来往，且两家居住很近。苏洵《送石昌言使北引》：

“昌言举进士时，吾始数岁，未学也。忆与群儿戏先府君侧，昌言从旁取枣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亲戚故甚狎。”据曾枣庄的考证，石昌言十八岁举进士时，苏洵只有四、五岁，“家居相近”，经常来往。这则史实说明，苏家、石家均居住同一地。苏辙《赠表弟程信孺》：“我生犹及见大门，弟兄中外十七人。两家门户甲乡党，正如颍川数

孙、陈。”（曾枣庄校点《栾城集》1482页）苏、程、石三家门第相当，甲冠眉州。由此可见，苏、程、石三家均同居一处，既是世交，也是世姻。因此，进一步说，苏、程、石三大家只能是居住在眉山城，不可能居住在距眉山城七、八十华里的穷乡僻壤的拨股祠！

六 还有几个问题值得探讨

苏涣出生在什么地方？苏涣出生于咸平三年（1001），苏洵出生于大中祥符二年（1009），晚苏涣八年。苏涣二十四岁进士及第时是天圣二年（1024），苏洵当年已十六岁，其父苏序此时在城郊饮酒接受苏涣封告后“跨驴入城。城中人闻受告或就郊外观之……”此足以说明苏序五十一岁仍然居于眉山城中。同样也证明苏涣、苏洵也出生于眉山城内。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假如苏洵出生于拨股祠。苏序就必须在35岁时迁居拨股祠，51岁时再迁入城中接受苏涣的封告。此种与史无据的猜想是最为可笑的。

苏序会从城里迁居至拨股祠？据苏洵《族谱亭记》：“今吾族人犹有服者不过百人……”此记苏洵作于嘉祐元年正月，时苏洵48岁，苏轼21岁，苏辙18岁。服者，指五服，泛指族中血源最亲近的几辈人。苏家全族人在苏洵近50岁时，五服之内尚不足百人。若上溯至苏洵出生的大中祥符二年（1009）那一年，眉山苏家全族人就更少了，仅几十人而矣！苏序是苏洵的独子，在这种情况下，苏家不可能到远离眉山城七、八十华里的穷乡僻壤去定居！

眉山市井人子到拨股祠去就读？苏轼《东坡志林》中《道士张易简》：“吾八岁入小学，以道士张易简为师。童子几百人，师独称吾与陈太初者。太初，眉山市井人子也。”苏轼说得很明白，陈太初为“市井人”，难道苏轼不是市井人？按：苏轼假如出生于拨股祠，八岁时离家七、八十里到城里去就学？苏辙六岁一同上学。这不知作何解释！相反，市井人陈太初到七、八十里开外的山沟乡里去读书，也说不通！再则，清嘉庆二十年始兴的三苏场，北宋时哪里来的“市井”？

至于“江上宅”、“山中人”之说，我以为皆

泛指。眉山城位于岷江边，东门城墙外即是江岸渡口（距三苏祠仅100米左右），全城人都可以说居于“江上宅”。四川四面环山，眉山地处成都平原南端，眉山城东八里有蟆颐山，城西四里有醴泉山，眉山人均可以视为“山中人”。何况拨股祠到处是山，没有江河、所谓“江上宅”，又在哪里呢？

随便提一句，拨股祠的传说作为旅游开发也不失为一种思路。

综上所述：南宋施谱、傅谱言之凿凿，不可不信。清人即谓拨股祠是三苏父子的出生地纯系传言，不可信。苏轼及李方叔的记载详实、清楚、明白。程夫人僦居经商在情理之中。眉山城中苏、程、石三家“笃于早岁”、“家居相近”，同居一地。因此，只有眉山三苏祠故址才是三苏父子出生地——纱縠行私第。

参考书目：

- 王水照《苏轼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年版。
 《苏轼资料汇编》，中华书局 1994 年版。
 《中国苏轼研究》（2008年第4辑），学苑出版社 2008 年版。
 清嘉庆《眉州属志》。
 民国十二年《眉山县志》。
 《三苏散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丛刊第十三集）。
 彭泽良《孕奇蓄秀一眉山》。
 《远景》（第10期），眉山东坡诗社编。
 《苏轼研究》，2008年第4期。
 苏轼《记先夫人不发宿藏》。
 苏轼《苏廷评行状》。
 李方叔《师友谈记》。
 苏轼《和子由蚕市》。
 司马光《程夫人墓志铭》。
 苏轼《南轩梦语》。
 苏轼《异鹊并叙》。
 苏洵《族谱亭记》。
 苏轼《东坡志林》。

（眉山三苏祠博物馆副研究员）

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读史钧《苏东坡这个人》

高纯林

内容提要：《苏东坡这个人》的“无厘头”^①和“毒道”眼光已经引起国内诸多苏学专家的关注、反感、气愤，若以此种行径来调侃、消解、亵渎包括东坡文化在内的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则是国之大不幸矣！本文作者列举大量语句，批驳史先生捏造、歪曲、曲解、虚构事实及断章取义、语言粗俗等弊端。

关键词：史钧 苏东坡这个人 评判 清洗流毒

《苏东坡这个人》（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2009年版）作者并不是文史专家，而是一名年仅39岁的青年，安徽科技学院教自然科学的教师。他“习惯以自然科学思维考察社会现象”。他的笔名是“千古一相”。再看书的封底与封条上的话，我不寒而栗了。概括地说，此书是：非牛非马，不伦不类；记事非真，难算传记；无文无采，并非散文；当作小说，人名却真；要说评论，辱骂最甚；自归其类，作史传论。史钧大言不惭地说：“本书就是专门来揭他（苏轼）老底的。”你想以此意图来写“历史人物传记”还会公正吗？读完此书便知道，史钧从生活理想、人生态度、工作能力、为官政绩、文学艺术等等，对苏轼全面否定，所用之术是胡编与辱骂。

该书从第一章第二句起到书最后一段，作者的辱骂声不断。请看首句：“眉山苏姓源自唐朝一个没有出息的宰相苏味道。这个人其实没有什么味道……”真是从人家祖宗十八代骂起了。书的最后一段是：“以苏轼作为一面旗帜，

千年以来，我们的文化，终究是一种玩文弄字的文化，没有思想深度却一再吹嘘所谓的‘意境’，毫无内涵仍然自夸‘空灵’。知识分子们所追求的，大多是步苏轼之后尘，向往所谓‘超然’或‘隐逸’的人生境界，但又无法摆脱尘世间的种种诱惑，拥花问柳，把酒言欢，自欺欺人，自以为是，一直把中国玩进了死胡同，被人一再屠杀，再三凌辱，如果不是生育能力极强，几乎灭种。呜呼！中国之有苏轼，其幸耶？抑或悲耶？”这样的开篇，这样的结尾，从苏轼的几百年前长辈苏味道，骂到千余年来中国所有知识分子，再骂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华儿女的种族。这不仅是骇人听闻的虚无主义狂吠，更是对伟大的祖国、伟大的民族、伟大的华夏儿女的污蔑。他不顾历史真相，更不看当今中华民族的奋起、复兴与强盛。这就够读者深思，够读者气愤的了！一个对中国历史文化无知却有意歪曲的现代狂人，真是狗胆包天！中国千年历史是谁创造的？中国千年来的命运是谁造成又是谁改变的？略有一点历史唯物主义常识的人都不会说出“博士”史钧以上所写出的结论。知识分子有那么大的能耐？又有那么大的危害？苏轼以后的千年中，中国知识分子中就没有好人、伟人？从封建社会的辛弃疾、陆游、岳飞、文天祥到民主革命的领袖孙中山、秋瑾，再到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等等，哪一个不是知识分子？中华民族没有灭亡是因“生育能力强”吗？中华文化一直被世界有识之士所肯定、所赞赏，这是不争的事实。为什么作为新中国培养的博

士史钧就看不见？

全面、认真、公正地评判此书，需要相当时间，更需要广大苏学爱好者及专家们共同努力。在此我先从总体上对此书提出几点看法，供大家参考。

第一，无中生有，捏造事实。

司马光、王安石、苏轼在中国历史上都作出贡献，都是名人，可算“大宋三杰”。可是史钧只肯定王安石，否定其他两个。这是极不公平的。

王安石出于“富国强兵”的良好愿望，在年轻气盛、希望快速改变国家“积贫积弱”面貌的神宗皇帝支持下，以宰相身份，信心十足地推行自己的一套变法主张。由于求治太切，各方面条件不成熟便全面推行，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漏洞百出，朝廷内外，阻力很大，不久，便不得不停止执行。这本来已经成为历史，记于史册。可是当今一个原来学自然科学的青年史钧，自称“千古一相”，比王安石还能干，跳出来，拍着胸脯说：王安石的变法全是正确的，所以没能推行下去，全是苏轼搞的鬼，苏轼是罪魁祸首，现在我要跟苏轼算账！可是算账是要有理有据的。他没有，便胡编乱造。在中国历史书与中国文学史书中对王安石变法都写得十分清楚，下面引几段作证：“……均输法的实行，在‘便转输，省劳费，去重敛，宽农民’等方面，收到一定的成效。……青苗法的实行，在限制高利贷盘剥等方面，收到成效，朝廷也获得大量利息。农田水利法……全国兴修水利 10793 处，受益民田 36 万多顷，公田 1915 顷，收到了显著成效。此后，尚有募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等等出台。”（《图说天下·中国通史》下卷，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2008 年版，第 256 页）“熙宁七年（1074）四月，光州司法参军郑侠上书宋神宗，要求罢黜王安石。端明殿学士、判西京留守司御史台司马光上书，对王安石执政以来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抨击。他指责王安石独断专行，排斥、打击异己，而用一些奸诈小人。司马光还指出当前政策中有六点失误，尤其是青苗、募役二法危害最大，造成老百姓越来越穷。太皇太后、皇太后及其他官僚也多次对神宗诉说新法不利于民，攻击王安石‘变乱天下’。”（同上）“新法的推行，富商大贾和兼并势力有所抑制，自然会在统治阶级上层招来抵制。旨在稳定赵宋统治的变法，依托庞大的封建

官僚机构迅速展开，必然产生种种流弊乃至带来繁法扰民的后果。……反对浪潮日益激烈。”（《宋代文学史》（上），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88 页）“当时的社会条件注定了王安石的改革理想无法避免失败……”（同上，第 190 页）王安石自己也说：“‘群疑并起，众怒总至’，深感‘虽欲强勉以从事须臾，势所不能。’（《乞解机务札子》）”

（同上，第 190 页）苏轼在王安石变法时，在朝廷中并没有什么地位，也不全面否定新法，与司马光等守旧派是有区别的。史钧说“他对政治没有任何真知灼见，只凭书本知识和个人意气，就全力反对王安石富国强兵的变法事业。”（该书第 3 页）所以他就放开司马光等人，而全力攻击苏东坡，不彻底打倒苏东坡踏上一只脚使之永远不得翻身而不甘心。

第二，添油加醋，歪曲事实。

史钧在他的书开头故弄玄虚，说什么：“那是很久很久以前，宋朝年间，据说……”引出苏轼兄弟写书、评书之事。而后便给苏轼扣上一顶善于“拍马”的臭帽子。他的意图是叫读者一上来就认为他写的对象是个惯于吹牛拍马、品德恶劣的文人。我们知道，凡吹牛拍马者，必有私图，而且被吹拍者必是有权有势有钱者。可是这位自命“千古一相”的史先生根据哪些事实来下结论的呢？请看：1. 乌台诗案之后，苏轼被贬筠州，在失意中研读《老子》，以真正学者的态度钻研儒道释经典，写了约五万字，写成融儒道释于一炉的《老子解》，在当时应该算是有分量的学术著作了。他虚心听取多人意见，反复修改，苏轼也提出过许多意见。书定稿后，苏轼为弟弟的成功而高兴，写了《跋老子解后》加以夸奖与鼓励。这本来是极平常的事。不久苏轼便病逝。史钧将原文拆散，加入自己的想象、发挥、胡评，什么“看了又看，读了又读，品了又品，最后横下心来，写了一篇非常低调的评论”。苏轼文中明明说自己“读之不尽卷，废卷而叹”，是个人感受；史钧却说“让人读之……”，好象苏轼以个人感受，强求读者同意。即使苏轼言过其实，夸大了书的作用，也说不上拍弟弟马屁。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接着，史钧又根据苏轼分别为五个朋友的作品写的文章加以评论，证明苏轼对朋友也是拍马。全部揭示，实在费时费力，就举一例说说吧。请

看《答黄鲁直》，此时苏轼在徐州任上，还不认识黄庭坚。“轼始见足下诗文于孙莘老之坐上，耸然异之，以为非今世之人也。莘老言：‘此人，人知之者尚少，子可为称扬其名’轼笑曰：‘此人如金精美玉，不即人而人即之，将逃名而不可得，何以我称扬为？’然观其文以求其为人，必轻外物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非独今世之君子所不能用，虽如轼之放浪自弃，与世阔疏者，亦莫得而友也。”本来是封建社会文人之间，相互恭维的话，其中“金精美玉”不过是个比喻；史钩却如获至宝，拾来作子弹，射向他的攻击目标苏轼，无聊之极。为了证明苏轼会吹牛，史钩又举苏轼《自评文》为例，得出“难道宋代就没有‘谦虚’这个词么？”假如一个人坦率地介绍自己真实的写作体会，用了形象化的比喻，说明文思涌来，创作冲动无法遏制，便是骄傲，就是不谦虚，谁还敢自我介绍，说自己优点？即使现在的大学毕业生，硕士、博士毕业生，自找工作时也得带上自己的材料，自我介绍——当然要介绍自己优点、长处、爱好等等。请问“生物医学工程博士”、自命“千古一相”的史钩，你谦虚吗？你对别人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为了否定苏轼在杭州的政绩，史钩写了弃婴与灭蝗虫的事。他写道：“纵观历朝历代没有那一朝能根除弃婴和溺婴现象的，宋代的弃婴也相当普遍。而在苏轼那里，对弃婴现象的夸张有其特殊目的，就是借此攻击新法，把弃婴的罪过加到变法派头上，（请问证据何在？）这是一个很容易博取无知者同情的手法。苏轼到处写信写诗说他捡弃婴很辛苦……一个不愿意发展生产只知道卖好心肠的人，不要指望他能从根本上解决什么社会问题。”“而捉蝗虫则是官员最基本的分内工作，捕蝗不力，是要被国家法办的。在苏轼到密州上任前，当地老百姓已经捉蝗虫三万斛了，只可怜那些官员不如苏轼会写诗自吹，所以没有人知道。（请问你怎么知道的？）苏轼到处给朋友说自己在密州捕蝗很费力气，也就是说罢了，他可能下乡视察过几次，照完相就回来了。”（请问宋代中国有相机了？）

第三，有色眼光，曲解事实。

史钩不顾历史真实，以讽刺小说写法写他想象的东西，蛮横粗暴，乱舞棍棒。请看以下叙述：

1.元丰八年（1085）三月五日，神宗去世。两个月之后，苏轼在从扬州去常州的路上，写了一

首七言诗：“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归宜兴留题竹西寺》）这本是一首写路上见到好景象、听到好消息而兴致盎然的小诗，并不复杂。可是史钩带着与李定等反苏派人物的有色眼睛，横蛮地说：“苏轼听到神宗去世的消息有点幸灾乐祸。”而苏轼为自己辩护说：是“见百姓父老十数人，相与道旁语笑”，“事理明白，无人不晓”。而听到神宗驾崩的消息，在三月初六那天。史钩不信，反驳：“这个说法实在是让人怀疑，宋时交通通讯不便，神宗前一天在开封去世，他苏轼没有道理第二天在南京就知道这个消息。相反，他在往常州的路上消息不便，两个月后才听到神宗去世的消息倒是极为正常的现象。”史钩是真不知，还是有意装傻。神宗驾崩是天大的事，消息会以快马奔驰于驿道，报丧，使全国哀悼的，哪能在两个月后才传到江苏？苏轼“在南京（今天的河南商丘）闻先帝遗诏”恰恰是可能的，因为开封与商丘只隔40多里路。

2.史钩说：“苏轼还以画闻名，尤其是画竹，据说水平非常高。这件事已经很难判断了，因为他的画全都失传了。以苏轼的耐性，肯定没有多少时间精心练画，他喜欢画竹，也就是竹子直统统好画。中国画也就这么回事，只要名气大，随手涂抹两笔也有人买账。”首先，史钩无知，武断下结论：苏轼的“画全都失传了”。黄玉峰在他的《说苏轼》（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57 页）说：“苏东坡对绘画也有很高造诣，他留下来的画不多，但可看出他的创新意识。”有人说，他在台湾亲眼见到苏东坡画的竹。现代作家林语堂在他的《苏东坡传》中还写了评中国画的大段文字。“结构越单纯，表现律动美越容易。因此苏东坡才集中表现律动美在几枝竹子上或是几块粗犷的岩石上，而这样表现出来的景物也就成为内容很充分很丰富的图画了。……苏东坡的几枝竹枝竹叶，后面一月当天，依稀可见，创造出两种效果。第一，因为没有其他不相干的景物，故能刺激观赏者的想象；第二，那幅画暗示那几片竹叶，在月夜安然静止也好，在风雨中猛力摇摆也好，在其表现出来的律动美上，是令人百观不厌的。”

（《苏东坡传》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39 页）

3.王安石死后，朝廷叫苏轼写一篇《王安石赠太傅》的制词。这也说明哲宗、高太后、司马光

相信苏轼会客观公正地评述王安石的。写出来后，大家也认为不错，流传了千年。可是，当今生物医学工程博士史钧却说这是一篇坏文章，拿出来大批判。硬说此文“句句表扬，却又处处针砭，是明褒暗贬的优秀范文。”古人云：“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一个人有优点，也会有缺点，有成功也会有失误，不足为奇。死后别人评价也只能看主流方面。对这篇制文，前人也有些评论，不妨引几句看看。王铚《四六话》卷下说：对王荆公夸赞的很多，“然不若子瞻《赠太傅诰》，曰：‘浮云何有，脱屣如遗。’此两句乃能真道出荆公出处处妙处也。世人谓中含讥切，恐大不然。”储欣《东坡先生全集录》卷七：“传神，传神！安石、惠卿一赠一责，俱使有识旁观代其入地。”（曾枣庄、舒大刚主编《三苏全书》第11册，语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139-140页）而史钧却乱批一通。请看：“‘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稀世之异人’，这个‘大事’当然指变法，只是苏轼没有说是大好事还是大坏事；而‘希世之异人’到底是忠正的异人还是邪恶的异人，苏哥哥也不提。这两句，为通篇的阴阳怪气定下了基调。”“苏轼先用‘名高一时，学贯千古；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曲指王安石是一个善辩之人。‘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看，对王安石的文学功力的定位，只是‘藻饰万物’而已。至于‘名高一时’的人，不知苏哥哥把王安石归为哪一类。……”够了，真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跟史钧讨论问题，怎样才能不气破肚皮呢？明明是好话，他非要说那是坏话，不讲理。

第四，胡编乱造，虚构事实。

史博士为了把前几年外国大报纸评出的“千年伟人”之一的苏东坡搞臭，不惜采取卑劣手段，攻击苏东坡。除了以上所写三点，主观臆测，胡编乱造，也是其中之一。《苏东坡这个人》第四章开头就编出一个苏轼兄弟谈变法的故事，约1500字，有环境描写，有人物对话，有作者评论，不过就是没有注出材料的出处，只能当小说读。为了饱饱眼福，不妨引两段出来看看：“天寒地冻，朔风呼啸。黄河边上一行人沿岸而来，马蹄踢打着坚硬的路面清脆作响，伴着车轮碾出的隆隆声几乎压倒了车厢内两人的谈话。哥哥，听说现在京城闹得动静很大的，官家把王安石弄了上来说

想要变法，我看对我们不利。想当初他只是一个知制诰，就敢拿我们兄弟开刀，一旦得势，不得把我们兄弟整死？弟弟，你也不要太把王安石当回事……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苏轼兄弟怕站错了队！”明眼人一看便会奇怪：这是在写历史吗？靠丰富的想象，瞎编故事能当历史读？

再看一段奇文：“正在苏轼四处跑官要官，为功名‘汲汲强奔走’之际，妻子王弗却在五月份一病而逝。王弗十六岁和他结婚，二十七岁去世，只跟着他十一年。让人奇怪的是，正值壮年性欲旺盛的苏轼跟这位结发妻子只生了一个儿子苏迈！而这个儿子还是他二十四岁时生下的。没有理由不怀疑，在没有电视和网络的年代，他的夜生活都干什么去了？该不会是嫖娼去了吧。”我们的史博士真会推理啊！不生孩子，少生孩子，就是去嫖娼了。千古以来，少见的理论。我看是以小人之心，猜测君子之行。

再看他怎样解释被大家公认的好诗《饮湖上初晴后雨》：“现在苏轼没有遗憾了，他终于有一个可人的玩物了。他对朝云非常满意，并为她写了一首著名的《饮湖上初晴后雨》……有了脸色绯红的朝云小姑娘，从此以后，西湖也有了一个相当情色的别名：西子湖。”

大家都知道，苏轼诗中“欲把西湖比西子”是把西湖与美女西施比的；千年来有谁将西湖与朝云比？

如此主观臆测，胡编乱造，在该书中比比皆是。

第五，以偏概全，断章取义。

史钧写文章有好多巧妙手法，以不引全文或完整句子，断章取义，任意发挥为最甚。这里略举一二例。

在该书第8页有这么一段，不妨引出来大家看看：“苏轼对美女有自己的欣赏品味，他老兄流传下来的词作三百多首，大多谈女人。在以所谓豪放之气牛遍天下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也念念不忘‘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因为‘小乔出嫁’，周帅哥才‘雄姿英发’，并直接导致‘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可见女人之于苏轼，其效果之重要，刺激力之强大，都是不能低估的。要让苏轼领兵打仗，在帅帐中肯定也是美女如云的，不然他没力气。”大家看，伟大的“千古一相”史钧先生是如何读别人的作品，如何侮辱别人的！

是真无知，还是别有用心？

苏轼到了黄州之后，写过《答李端叔书》，本来是朋友之间交流思想，谈谈心的私人书信。尽管刚出狱，被贬谪到黄州，惊慌的心境尚未平静，但苏轼真诚、坦率的性格不变，写自己的近况、思想、担忧等等，很自然，不掩饰。其中有一段是写自己参加科举考试，入仕途而得罪人情况的：“轼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既及进士第，贪得不已，又举制策，其实何所有？而其科号为直言极谏，故每纷然诵说古今，考论是非，以应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以为实能之，故譊譊至今，坐此得罪几死，所谓齐虏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轼为欲立异同，则过矣。妄论利害，掩说得失，此正制科人习气。譬之候虫时鸟，自鸣自己，何足为损益。”（《三苏全书》第12册，第372页）“《御选唐宋文醇》卷四十李光地评：人以为牢骚玩世之语，实则自写平生实录也。”（《三苏全书》第12册，第373页）史钧是如何评述此段文字的呢？他说：“先是自批当官以后‘贪得不已’，一心想当大官，‘其实何所有’？肚皮空空，并没有什么真才实学，只是‘纷然诵说古今，考论是非’而已。可是自己却‘苦不自知’，‘以为实能之’，结果废话不已，‘坐此得罪几死’。”对照一下吧，史先生理解正确吗？

第六，污秽下流，语言粗俗。

前边说过，《苏东坡这个人》是以骂人开头，更是以骂人结尾，可见作者人品和语言风格了。再读全文，真有难以卒读之感，其语言污秽不堪，调子低级下流。先看一些骂人语句：“没有出息的宰相苏味道”、“老酒鬼欧阳修”、“儒门走狗们”、“苏轼……当然要大请狐朋狗友”“硬是被迂腐的苏粉们吹捧为关心民生”、“一个名叫陈公弼的老家伙”、“陈公弼有个混混儿子，叫陈季常”、“真他娘的可惜至极”、“该不会是嫖妓去了吧”、“老苏头就这样一命呜呼而去”、“流氓画家王诜是一个典型的无耻淫棍，……骚劲十足……作画吹牛玩女人……这个放浪的畜生。……与小妾搞钻探活动……与苏轼是臭味相投。”再看那些下流话：

“当然，并不能据此推测苏轼和佛印有同性恋嫌疑。”“你不要以为我天天在外面泡妞，我都是在跟同志们谈正事呢。”“苏轼在杭州，不是喝酒就是泡妞，不是泡妞就是划船，不是划船就是调戏和尚，不是调戏和尚就是攻击变法，不是攻击变

法就再去喝酒，此外好像没有其他的事了。”“见了道潜后，苏轼故伎重演，再用妓女调戏和尚”、“只有一点不好搞，那就是‘难以去欲’。打坐的时候小鸟经常站起来东张西望，一旦因此而找人操事灭火，又会严重影响养生效果，真是难为人。”如此等等还有不少，读者不妨忍着心头怒火去看看。

前边我已说过，要将史钧这本奇书细细解剖，彻底了解其内容与写法，找出可取之处，清洗其流毒，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更多的人来做，我期盼着，等待着。

论文注释：

① “无厘头”本是广东方言中的俚语俗语，意指一个人做事、说话都不合常理、不按规律，令人难以理解，其语言和行为没有明确的目的，粗俗随意，莫名其妙。

（江苏省常州市苏东坡研究会）



论苏轼的酒诗创作及其原因

李靓

内容提要：苏轼一生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酒”在他的诗集中频繁出现，其酒诗不仅表现了自身的各种情绪，还蕴含着对人生的深刻思考。探究其酒诗创作的原因，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受到传统诗酒风范的影响；二是由于其自身对酒的需求。

关键词：酒诗创作 传统习俗 曲折仕途
窘迫经济 超脱精神

苏轼一生与酒缘分颇深，他在《次韵王定国得晋卿酒相留夜饮》中提及“使我有名全是酒”，这一说法虽属夸张，却能看出其对酒的喜爱与推崇。苏轼爱酒，“空杯亦常持”（《和陶饮酒二十首》其一），甚至要“移家酒中住”（《和陶神释》），并自谓“岂知入骨爱诗酒”（《次韵送刘景文》）。与李白“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襄阳歌》）不同，苏轼一贯是“我饮不尽器，半酣味尤长”（《湖上夜归》），亦言“把盏欢意足”（《与临安令宗人同年剧饮》）。由此可见，“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品求酒趣。酒作为一种特定文化意象，时而出现于苏轼诗集之中，丰富了诗作的内涵，成为其情感迸发的催化剂。

一 苏轼的酒诗创作

提及酒诗，必然想到陶渊明，他是中国第一个大量创作酒诗的文人。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称陶诗“篇篇有酒”，虽不至此，然酒诗仍多达 56 首，约占现存诗歌总量的一半。① “采菊东

篱下，悠然见南山”，陶诗总给人恬淡、舒适之感，然陶实以饮酒为依托，表达自己摆脱尘俗羁绊的喜悦以及归依田园后的宁静与恬淡。

这同样也是苏诗所呈现的，据统计其 2859 首诗作中②，直接提及“酒”、“饮”或“醉”等字样的多达 659 篇③，约占其诗歌总数的 23%。具体见于下表：

卷数	总数	酒诗	卷数	总数	酒诗
1	40	2	26	48	17
2	38	2	27	39	11
3	48	6	28	45	10
4	46	8	29	41	11
5	48	8	30	63	14
6	56	15	31	44	8
7	45	8	32	62	16
8	68	13	33	61	15
9	61	17	34	67	24
10	52	8	35	50	28
11	74	19	36	65	9
12	42	11	37	49	8
13	48	16	38	39	8
14	65	15	39	82	26
15	64	22	40	61	14
16	61	20	41	60	14
17	53	19	42	36	12
18	84	3	43	48	16
19	49	15	44	35	8
20	57	16	45	48	8
21	86	23	46	65	5
22	41	14	47	67	7
23	44	9	48	175	28
24	60	14	49	47	11
25	51	14	50	52	8

由此可见，苏诗卷卷有酒。其中酒诗创作排前三的分别是第三十五卷、第三十四卷与第二十六卷，分别占所在诗卷总数的 56%、36% 和 35%，而在第一至第五卷，虽然酒诗数量很少，但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可见酒诗创作实则伴随苏轼一生，随着年龄的增长与阅历的加深，酒逐渐成为其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

较之陶诗而言，苏轼酒诗的内涵更为丰富，如同一面多棱镜，从不同角度反应着苏轼的生活状态和精神世界。从中不仅能看到其日常生活，如“半道邀我饮，意与王弘同”（《和陶贫士七首》其六）写受人之邀同饮美酒；“竭来湖上饮美酒，醉后剧谈犹激烈”（《陪欧阳公燕西湖》）体现与友人在湖上酣饮之后的畅谈。诗中还存在着他的各种情绪。

（一）人生的思考

俗话说“酒醉心头定”，酒能麻痹人的神经。在迷醉状态下，人们可以放浪形骸，摆脱礼教的束缚，从而品味自由与放松的乐趣。如李白，饮酒求“醉”，醉后个性更为洒脱与狂傲，杜甫《饮中八仙歌》云：“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然对于文人而言，酒不仅能给予味觉上的享受，更多的是成为其抒发情感的催化剂。生性疏狂豪逸的苏轼饮酒目的即在此，其好友李公择言“陶公醉眠野石中，君醉辄眠舍后亭。人知醉眠尽以酒，不知身醉心长醒”（《醉眠亭》），苏轼亦言“醉中虽可乐，犹是生灭境。云何得此身，不醉亦不醒。”（《和陶饮酒二十首》其十三）可见其惯常借沉醉掩盖清醒的自我，以狂醉的心态分析现实的人生，于半醉半醒之间寻求饮酒的乐趣。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苏轼的意义”中提及，“而（苏轼）是对整个人生、世上的纷纷扰扰究竟有何目的与意义这个根本问题的怀疑、厌倦和企求解脱与舍弃”，④在他看来，苏轼在诗文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以及“退隐”的心绪，比前人更为沉重。

在苏诗中，随处可见其对人生的思考。《和子由渑池怀旧》中有“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人生有如“飞鸿踏雪泥”，鸿雁飞走了，也就不记得有过痕迹。这一比喻把人生与“雪泥鸿爪”

相提并论，人生的短暂与飘泊无定也就昭然于眼前。人生苦短，逝者如斯，同样的思想亦反复出现于其酒诗中，“小舟真一叶，下有暗浪喧。夜棹醉中发，不知枕几偏。天明问前路，已渡千重山。嗟我亦何为，此道常往还。未来宁早计，既往复何言。”（《和陶饮酒二十首》其五）他这一叶人生的“醉舟”随波而去，委时任运，尽管前途未卜，却乐天知命。“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江城白酒三杯醉，野老苍颜一笑温。”（《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人生就如春梦，梦醒了也就跟着忘了，留下朦胧的美意，了无痕迹。既然人生短暂，漂浮无常，苏轼就认为“行乐当及时”（《和陶饮酒二十首》其十九）。在徐州任上，他羡慕云龙山人张天骥优游自得的隐士生活：“从君学种秫，斗酒时自劳。”（《过云龙山人张天骥》）人的生命短暂，如同寄居于世间，所以应当轻松自在，斗酒相伴。又如“湖上四时看不足，惟有人生飘若浮。解颜一笑岂易得，主人有酒君应留。”（《和蔡准郎中邀游西湖三首》）面对西湖旖旎的风光，和着微微的醉意，诗人诗性大发，由湖上风光引出人生漂浮之意，接着表明“主人有酒君应留”，这种欢愉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应该及时享受，莫辜负美好的风光与主人的款待。后苏轼历经贬谪又奉召还京，于殿门外遇见王晋卿，感慨良多，“醉眠草棘间，虫虺莫予毒。……吾生如寄耳，何者为祸福。不如两相忘，昨梦那可逐。”（《和王晋卿》）人生不可预计，当时还“醉眠草棘间”，如今却能还朝。所以人不论地位高低，皆是来人世间走一遭罢了，那些苦难记忆还不如就此忘掉。又如“人生安为乐，吾策殊未良”（《湖上夜归》），“山城酒薄不堪饮，劝君且吸杯中月。洞箫声断月明中，惟忧月落酒杯空。”（《月夜与客饮杏花下》）苏轼体味出人生如梦，世事艰难，人世间处处是荆棘，步步有险恶，亦有不如得酒尽饮，及时行乐之意。

（二）情绪的抒发

苏轼的酒诗如同一个情感的大融缸，里面融合了他的七情六欲，或高兴，或悲伤。其中尤以悲伤情绪最为典型：

1. 送别亲朋之情。“不饮胡马醉兀兀，此心已逐归鞍发。……登高回首坡垅隔，但见乌帽出复没”（《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强欢虽有酒，冷酌不成

席”（《次韵子由除日见寄》）两首均表现送别子由时的伤感，欲把酒言欢，却悲伤地不愿成席，登至高处目送子由，只见乌帽在山川间浮浮沉沉，一种感伤离别之情油然而生。“我昔识子自武功，寒厅夜语樽酒同。酒阑烛尽语不尽，倦仆立寐僵屏风。”（《王颐赴建州钱监求诗及草书》）诗人初与王颐相识，相饮甚欢，如今却是酒兴阑珊，欲言未尽。在《送岑著作》中，这种痛楚亦很明显，“临行怪酒薄，已与别泪俱。后会岂无时，遂恐出处疏。惟应故山梦，随子到吾庐。”送别时酒泪相伴，再见不知是何年，只有在梦中相会。再如《次韵孙莘老见赠，时莘老移庐州，因以别之》，“惟有阳关一杯酒，殷勤重唱赠离居。”不免让人想起王维的“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之悲伤。

2. 怀念故人之忧。苏轼诗中多表现对子由的牵挂之情。“愁肠别后能消酒，白发秋来已上簪”（《九月二十日微雪，怀子由弟二首》，“去年举君苜蓿盘，夜倾闽酒赤如丹。……归来四壁草虫鸣，不如王江常饮酒。”（《八月十日夜看月有怀子由并崔度贤良》）苏轼与子由手足情深，一同赴京应试，中同榜进士，且志趣相谐。在分离的日子里，苏轼以酒浇愁却也无法消除对子由的深刻怀念，不知觉间白发已经爬上发簪，仍记得去年与君一起酣饮的情形，如今面对的却只有“四壁草虫鸣”，情至之言，感人肺腑。“六年逢此月，五年照离别。歌君别时曲，满座为凄咽。……唤酒与妇饮，念我向儿说。……欲和去年曲，复恐心断绝。”（《中秋月寄子由三首》其二）这首诗专为怀念子由所作，追忆与子由分别时的情形，情景交融，凄惋动色。紧接其后，苏轼又云“明月易低人易散，归来呼酒更重看。堂前月色愈清好，咽咽寒蛩鸣露草。卷帘推户寂无人，窗下咿呀惟楚老。”（《中秋见月和子由》），汪师韩《苏诗选评笺释》卷二谓此诗“（写景）无非旁侧铺衬。而一片澄明之境，与夫对景怀人之情，自令人讽诵流连而不能自己。”此外，“忆弟泪如云不散，望乡心与雁南飞。”（《壬寅重九，不预会，独游普门寺僧阁，有怀子由》）诗人因为思念其弟而泪流不止，向往家乡的心无数次地想要随着南归的大雁一同回家。“三年无日不思归，梦里还家旋觉非。腊酒送寒催去国，东风吹雪满征衣。”（《华

阴寄子由》）这首诗开篇便点明无日无夜不在想念着回归故土。在《安国寺寻春》中，诗人又言：“看花叹老忆年少，对酒思家愁老翁”，因看花而叹老，因叹老而忆年少，又因对酒而思家，思想环环递进，逐步显出念家的情绪。此外，“强寄一樽生死别，樽中有泪酒应酸。”（《任师中挽词》）表达了诗人对已故之友的深切怀念，强忍住悲伤祭奠一杯酒，但是酒水和着泪水，连香醇的美酒都变成了酸的。

3. 现实混沌之痛。酒诗中还隐藏着诗人对现实的不满，“朱门有遗啄，千里来燕雀。公家冷如冰，百呼无一诺。平生亲友半迁逝，公虽不怪旁人愕。世事如今腊酒浓，交情自古春云薄。”《和欧阳少师寄赵少师次韵》）讽刺当权者的冷酷与是非不分，“世事如今腊酒浓，交情自古春云薄”两句写尽“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之感。而在《送杭州杜、戚、陈三掾罢官归乡》中，诗人言“正当逐客断肠时，君独歌舞醉连晓。……君言失意能几时，月啖虾蟆行复皎。”诗人把小人比做虾蟆，意味杜子方等人本无罪，之所以遭受罢黜是因为朝廷为小人所蒙蔽，其讽刺朝廷之意昭然若示。不仅如此，苏轼还在诗中表现了自己处于现实中的无奈，如《初到黄州》谓：“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苏轼自笑平生好论是非，因言得罪而成逐客，但他并未自暴自弃，而是以坦然之心态，把贬谪之悲一扫而光，只是自愧于国事无补。再如《和陶饮酒二十首》其十二“人间本儿戏，颠倒略似兹。惟有醉时真，空洞了无疑。”人间之颠倒，如《和陶饮酒》其三所言“道丧”，处道丧之世，一切善恶黑白都颠倒了，人性也丧失殆尽，所以只有在酒醉的时候才能摆脱世俗的困扰。

二 酒诗创作的原因

苏轼对酒如此偏爱，以至他的诗集中“酒”频繁出现且寓意丰富。探其原因，最主要为以下两点：

（一）传统诗酒风范的影响

诗酒风流在我国源远流长。早在《诗经》中就把酒的传承作为生活的重要侧面加以描述，据

统计,《诗经》言及酒者共 55 篇^⑤,其中“酒”字出现 63 处之多^⑥,但此时内容仅限酒与饮酒本身,诸如对酿酒的原料与方法、酒的品饮标准以及饮酒场景等方面的描写,诗歌在此仅作为“酒”的一种表现方式而出现。至两汉魏晋时期,酒开始与文学结合,成为文人墨客抒发情感的重要媒介:汉代曹操“对酒当歌”(《短歌行》),晋代文人集团“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以善饮、豪饮而闻名于世,曾有“刘伶醉酒,千日不醒”的传说。然至陶渊明才真正把酒与诗相融,酒在陶诗中已不再为单纯意象,传统的诗酒风范至此初具模型。也可以说自陶以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酒,不再仅仅是饮料,而是物质与精神的结合体,一种文化理念的象征物。

如果说魏晋时期诗酒开始相融,那么至唐代诗酒传统正式定型。酒作为一种特殊意象融入诗中,赋予诗歌不同一般的魅力。此时诗人纷纷与酒结缘,如王绩自称“醉吟先生”,李白人称“酒仙”、“酒圣”,白居易自称“醉尹”等。纵观唐诗,与酒有着密切联系的诗作不胜枚举,如王绩的《过酒家》,李白的《将进酒》、《月下独酌》,杜甫的《醉时歌》、《饮中八仙歌》,王维的《渭城曲》,孟浩然的《过故人庄》,王翰的《凉州词》,白居易的《问刘十九》、《劝酒》,皮日休的《酒中十咏》等。据统计,五万多首唐诗中,直接咏及酒的诗作就有六千多首。^⑦与前代相比,唐代的诗酒风范带有一种放浪不羁的浪漫色彩,如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将进酒》)中透露的豪迈自信,杜甫“酒酣击剑蛟龙吼”(《从行赠严二别驾》)所显示的愤世狂放,白居易“各以诗成癖,俱因酒成仙”(《醉后重赠晦叔》)中表达的诗酒放达,戴叔伦“且向白云求一醉”(《对酒示申学士》)中体现的浪漫飘逸,无不昭显唐人追求自由、展示个性的解放精神。

在此如此深厚的文化底蕴之上,苏轼自然传承了诗酒风流这一审美范式。如在《月夜与客饮杏花下》中,“花间置酒清香发,争挽长条落香雪。山城酒薄不堪饮,劝君且吸杯中月”,此诗有沿袭李白《月下独酌》之“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之举;再如李白的《把酒问月》与苏轼的《水调歌头》中明月的意境也有颇多神似之处。同样在对于酒诗情绪的发挥上,苏轼也受到前代诗人一定的影响。如白居易有“驱愁知酒力,破睡见茶功”(《赠东邻王十三》),杜甫有“宽心应

是酒,遣兴莫过诗”(《可惜》),表达了诗人借酒消愁,以醉避世的观念,苏轼本质上是承袭了这一思想的,其诗《次韵乐著作送酒》中言:“万斛羁愁都似雪,一壶春酒若为汤”,就像沸水使雪顷刻融化一样,万斛羁愁也只因为一壶春酒而荡然无存。除此之外,在唐诗中较常见的还有借酒表达对友人的思念,如杜甫的《春日忆李白》“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饯别时伤感情绪的表达,如陈子昂在《春夜别友人》中写“银烛吐青烟,金樽对绮筵”,等等。这些在苏轼的诗中均有体现,前文已详细论述。然“宋人饮酒的量和饮酒的豪情与前代大不相同。虽也有豪饮之士,但基本上属于个体行为,而整个社会风气则倾向于饮而不醉,醉而不沉的‘微醉’状态。”^⑧所以苏轼在对于酒的态度上有别于前代诗人,也因此苏轼的酒诗在继承的同时,又具有自身独特的魅力。

(二) 苏轼本身对于酒的需求

除了诗酒传统对苏轼的影响外,其自身对于酒的需求也是出现大量酒诗创作的重要原因。

1. 仕途上的曲折。苏轼毕生颠簸坎坷,终其一生,两次在朝,多次外任,三次被贬,中间历经激烈的党争运动。现实的挫折使苏轼转向虚幻世界寻求精神慰藉,酒于是承担起这一使命,成为其抒发感情的必需媒介。他在《醉睡者》中言“有道难行不如醉,有口难言不如睡”,才华不能施展,抱负不得实现,口不敢言政事,满怀愁绪,精神空虚,于是只能向醉中的虚幻世界寻求平静。酒是苏轼沟通现实与理想的重要桥梁,他曾把酒比成“扫愁帚”(《洞庭春色》),在其诗《孔毅父以诗戒饮酒……》中道“醉时万虑一扫空”,可见苏轼对酒以消愁的这种功德是赞赏有嘉的,其在《和陶饮酒二十首》(其四)中亦言“幸此未化间,有酒君莫违。”这种情感在《薄薄酒二首》(其一)中表达得更为明显,“生前富贵,死后文章,百年瞬息万世忙,夷齐盗跖俱亡羊。不如眼前一醉是非忧乐两都忘。”从此处,我们可以看出,仕途失意的诗人是需要酒来疗伤慰藉的。

2. 经济上的无奈。苏轼在经济上的窘迫突出表现其被贬期间。如在黄州时,由于没有俸禄,苏轼经济上的困窘甚难克服。初寄居定惠院僧舍,后迁居临皋亭,为了维持生活托朋友向官府请来薄田亲自耕种。如贬居惠州一年后,“衣食渐窘”,

“典衣作重九，徂岁惨将寒。无衣粟我肤，无酒饗我颜。贫居真可叹，二事长相关。”“我家六儿子，流落三四州。辛苦见不识，今与农圃俦。……”（《和陶贫士七首》）绍圣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酒尽，取米欲酿，米亦竭。……”（《和陶岁暮作和张常侍》）这种情况到了海南就变得更加窘迫了，“吾谪海南，尽卖酒器，以供衣食”（《和陶连雨独饮二首》），更为悲惨的是绍圣五年，苏轼被逐出原居住的官舍，不得不在城南南污地之侧桄榔林下，买地筑室，过着“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的六“无”生活。生活上常年的艰辛使得苏轼很想超脱现实，却又无法摆脱现实给他的精神纠缠与困窘，这时诗人选择用酒来打发苦闷的时光，“天气乍凉人寂寞，光阴须得酒消磨”（《浣溪沙》）。酒成为诗人忘却现实、消磨时光的必需媒介。

3. 精神上的超脱。苏轼性格本旷达，王水照先生《苏轼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一文⑨，结合宋代历史环境和苏轼的人生经历与思想变化，把苏轼复杂的文化性格描述成一个由“狂、旷、谐、适”组成的完整性格系统。由于这种旷达性格所致，苏轼对于现实中的苦难并非是麻木不仁、逆来顺受，而是以坚忍的心态来面对。在他的思想中，儒家固穷的坚毅精神、老庄轻视有限时空和物质环境的超然态度与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的观念始终散发着光彩。如在黄州时，他常与挚友徜徉山水之中，悠闲自得，体味出“吾事不既济矣乎”的积极结论；之后至惠州，诗人也没有自怨自艾，而是判定“此邦宜著”；即使老年被贬海南，苏轼仍保持超然的态度，其《与侄孙元老》云：“然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知之免忧”。人在暮年感受不免增多，对于生活的困难更加容易伤感，而苏轼却一反常态，对于命运的不济，仍然“不改其度”，表现出一种极为坦然不屈的人格魅力。⑩这种超然物外的性格本身与酒的特质颇为相似。众所周知，酒的主要成分是乙醇，乙醇能麻痹人的神经，使人处于极度兴奋与自由的状态，从而忘却现实中的烦恼，寻找自在心灵的归宿。也可以说，酒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苏轼精神上的需求，他的酒兴并不是普通人的求口腹之快感，而是一种文人的雅兴，酒能激发诗人无限的遐想，使其在醉乡中俯仰古今、

享受人生，从而获得精神上的快感。诗人在酒醉后经常以“狂”来自喻，如《次韵子由岐下诗》之《石榴》云“色作群腰染，名随酒盏狂”，《谢苏自之惠酒》：“贪狂嗜怪无足取，世俗喜异矜其贤。”由“旷”到“狂”，正是酒充当了沟通的桥梁，使诗人的情绪得到进一步的宣泄，性格得到进一步的伸展。

所以说，酒已成为苏轼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酒亦能激发他的才情，在酒醉的世界里，苏轼能忘却一切，自由地抒发各种情感，“道丧士失已，出语辄不情。……身如受风竹，掩冉众叶惊。俯仰各有态，得酒诗自成。”（《和陶饮酒二十首》其三）诗人道出了现实世界的虚伪，表达了自己放任清真的态度，自言酒中作诗，真情自吐，谈笑出之，如青竹受风，枝叶俯仰，姿态各成，纯乎自然一样。也因此，酒成为了苏轼诗集中频繁出现的文化意象。

论文注释：

①于东新《陶渊明〈饮酒〉与苏轼〈和饮酒〉之比较》，《古典今读》2007年11月，第41-44页。

②、③据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一至增补卷统计，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④李泽厚《美的历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3页。

⑤周蒙、冯宇《从〈诗经〉看商周酒文化现象及精神》，《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5期。

⑥扬之水《〈诗〉中之酒》，《中国典籍与文化》1998年第4期。

⑦葛景春《诗酒风流——试论酒与酒文化精神对唐诗的影响》，《河北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⑧骆自强主编《传统文化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38页。

⑨《文学遗产》1989年第5期。

⑩《关于苏轼在贬谪期间的心态分析》，其详参见张惠民、张进合著的《士气文心：苏轼文化人格与文艺思想》之第六章“贬逐投荒中的精神升华”，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沈祖棻著《东坡与词乐》解读

刘成志

内容提要：本文引述沈祖棻著《东坡与词乐》的论断，以东坡诗文和相关史料、今人论述和性观事例，论证了苏词不合律是误会，乃东坡“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是变格，非不懂声律。

关键词：东坡与词乐 正格 变格

当代著名词人和词学家沈祖棻先生的文章《东坡与词乐》，谈及东坡词是否协律，尤其涉及到东坡懂不懂音乐的问题，令人耳目一新。本文拟从乐理学和传播学的角度试图对此进行解读。

沈文从多方面作出了明确的论断：“说苏词往往不和音律协调，即使仅从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材料看来，也可以证明，这竟是一种误会。”她认为：“如果苏词在当时就不能通过音乐获得广泛的传播，苏、辛词派的出现和流行，将是不可想象的。”

沈文把历来批评苏词不合律说，叫做“误会”，形容得准确、生动。“在词与词乐盛行的时代，一个有较高文化修养的人，如果不通此道，那倒真是有些奇怪。”苏轼的侍妾朝云，会唱词，家中曾有侍婢善弹琵琶曲《道调·梁州》。通音律的词人同时又是一个歌唱家，有助于创作。周邦彦“好音乐，能自度曲”，姜夔、张炎都以精于词律名，有专门著作，却没有他们善于唱曲的文献。东坡《书〈彭城观月诗〉》云：“余十八年前，中秋与子由观月彭城，作此诗，以《阳关》歌之。今复此夜，独歌此曲，聊复书之。”“乃作长短句，以《江城子》歌之。”此外，还作歌《临江仙》与慢调《哨遍》等，都是有关苏轼能唱曲的记载。

东坡与音乐有关的言辞甚多。《水调歌头·遗赠善琵琶者》有序云：“建安章质夫家善琵琶者，乞为歌词，余久不作，特取退之词，稍加隐括，

使就声律，以遗之云。”《水龙吟·云海茫茫》引言：“元丰七年冬余过临淮，而湛然先生梁公在焉……善吹铁笛，嘹然有穿云裂石之声，乃作《水龙吟》一首，记（司马）子微、太白之事，倚其声而歌之。”由此也可得出东坡解音善乐，他的词大多合谱，能够演唱、流传。

词的本名叫“曲子词”。“曲子”是她的燕乐曲调，“词”则是与这些曲调相谐和的唱词。盛、中唐时代，就有了“倚声填词”，即文人们按照当时流行的曲谱填词，张志和的《渔歌子》和者甚多，“数十年后即传到日本，为嵯峨天皇及其臣下所酷爱而至于仿作”（唐圭璋、钟振振《词义精华概说》）。

历史有惊人的重复，按谱填词在近现代可找到许多例子，艺术大师李叔同的著名歌曲《离别》：“长亭外，古道边”，就是依据美国一首名歌填词，词曲结合天衣无缝，以致许多人认为是李叔同自己作曲；《新四军军歌曲》与二战时原中国赴缅远征军唱的歌同为一首曲谱；著名作曲家时乐濛创作的《歌唱二郎山》，是根据他的《竹岗山联唱》原曲填词，“二郎山”流行全国，原曲却被湮没了。今天的通俗或称流行歌手，有的自创词曲，有的是先有乐曲然后填词，在电子合成器上作曲则更为省事。然而这样的“倚声填词”却并非时代的主流，属于个例，从乐理和作曲学的角度看，不是需要大力提倡的方法。作曲家要依据词意进行构思，例如赵元任把刘半农的诗《叫我如何不想他》谱成歌曲，半个多世纪传唱不衰，就是围绕着词的主题，巧妙地运用西洋作曲技巧和民族风格相结合的一个经典之作。愚以为，“叫我如何不想他”的旋律来源于京剧西皮导板而加以变化，但是谁又听得出来它是京剧？代表中华民族精神的

《黄河大合唱》若不是光未然作词在先，冼星海怎么能谱出这样划时代的不朽名曲？《义勇军进行曲》（田汉词、聂耳曲），原是电影《风云儿女》主题歌，新中国成立后将她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都要奏国歌，这是中华民族传遍全世界的最强音。

至于我们要填的唐宋词，由于它的乐谱早已失传，依据就是词牌的句读和声调平仄，但要根据内容选择词牌，《满江红》不宜浪漫；《声声慢》不宜雄壮；《寿楼春》“声情低抑，全作凄音。有用以作寿词者，大误”（龙榆生《唐宋词格律》）。就是说，不能随意性地用文词去将就曲谱，从而降低它的艺术价值，限制它的发展。

沈祖棻认为，“苏词在当时就能够广泛地在社会上流传，固然和他的政治生活、社会地位、文学造诣分不开，但它的词并非为一种书面语言而存在，应当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许多流传的佚事都证明苏词在当时不仅是为人所传诵，而且是被人所传唱。”如有李龟年之誉的歌者袁绹，能歌《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坡为起舞。至于《江城子》密州出猎，也道“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

自度曲的产生，就是“运用诗歌的语言和音乐的语言进行酝酿、构思和创作，从而产生自度曲，即歌词与曲谱出自一手的作品”，周邦彦、姜夔等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今传苏词中有四调可以肯定为自度曲”。如《渔父》，沈先生认为应更名为《渔父破子》，破子系指曲调上的某些变化，其它还有《调笑破子》、《后庭花破子》等。变《渔父》为《渔父破子》，可能从苏轼开始。歌词和乐谱的成形有先后的区别，词曲配合上有问题，就须再加工，“或改乐以就词，或改词以就乐，使之兼具声词之美”。同一曲目，演唱者可以用不同的风格去演绎，如程砚秋师从梅兰芳，他却根据自身特点创造出另一种风格的程派唱腔。

何永沂先生发表在《当代诗词》2009年第3期上的《诗韵宽严举例谈》一文中谈到国学大师出韵的有趣事例，引述如下：陈寅恪写于1963年的一首诗：“不比辽东木蹋穿，那能形毁尚神全。今生所剩真无几，后世相知或有缘。脉脉暗销除岁夕，依依听唱破家山。酒兵愁阵非吾事，把臂诗魔一粲然。”（《入居病院疗足疾至今日适为半岁而足疾未愈拟将还家度岁感赋一律》）押“先”韵

的诗，第六句的“山”属“删”韵，为此，寅恪老特地加了一个长注：“念家山破，乃曲调之名，吴梅村吊董白诗云：‘念家山破定风波’者是也。近撰文颇论董小宛董鄂妃事，故语及之。至先删两韵古通，观再生缘第十九首二句即其一例。有人谓陈端生间用杭州土语押韵未知所指何词句，俟得暇详检。”寅恪大师对诗韵采取既宽松又认真态度，此其一例。虽然说的是诗韵，对我们亦有启发。

李广超先生在《二十世纪百年词简论》一文（《二十世纪名家词选》代序）中说：“句句合谱，字字入律者，多为小令和中短调句词。至于长调则多能工其七八，最常见者则为总体上合律，个别字句其字声平仄有突破格律之词。”并举当世名家毛泽东《贺新郎·读史》、高亨《水调歌头·掌上千秋史》、王季思《念奴娇·百战山河》、陈明远《沁园春·咏石》、施蛰存《沁园春·梅萼迎春》为例，霍松林作《莺啼序·寒飙又催冻雨》，引熊盛元先生言：“第三片末句‘那堪顿隔秋水’为‘仄平仄平平上’将拗句变为律句，且一句之中，四声俱备，诵之朗朗，闻之悦耳，有何不可？”“盛配先生言：霍松林以吴文英《莺啼序·残寒正欺病酒》为法，照填一首，以‘搅’、‘掩’、‘斗’、‘俯’、‘图’、‘呼’非去，‘芟’非平为失守。”李广超认为，“吴文英三首同调之字声平仄虽大体相同，但多有相异之处。霍词（三首）若以‘从一而终’论之，其字声多处失守。若以《词谱》而论，则无可挑剔之处。”

关于《莺啼序》，按《唐宋词格律》上所载梦窗词，未标有可平可仄之处，近有友人寄我该调《词谱》，谓“平仄非常灵活”，而是否能入乐，有待查明。前面所引，虽与论东坡词无关，但可以作为严守诗词格律与适当变通的佐证。

沈祖棻指出，“虽然声韵只是使语言符合音韵的手段之一，而远非音律的全部，但由此可知，当苏轼愿意严守这些方面的规律的时候，他是完全知道怎么去做的。”“他虽然通词乐，明音律，但却不肯受那样一些规律的绝对束缚，假若那些规律对于内容的充分表达确有妨碍的话。”说苏词不入腔，其说虽出自宋人，“却都是错误的”。

（下转 59 页）

竹韵与高洁

——读苏东坡诗词文札记

杨逢春

内容提要：以郑板桥引入评述了苏东坡爱竹、种竹、画竹、咏竹的史实，揭示了竹韵四气：灵气、生气、节气和雅气，此乃苏东坡高洁品格的象征。

关键词：画竹 咏竹 竹韵

在我国古代，以竹为主题的诗、文、画众多，然兼善画竹咏竹并以此著称的，首推宋人苏东坡、清人郑板桥。

郑板桥的画册好像一部竹谱，摇曳多姿的风竹、坚挺卓绝的危竹、淡雅娴静的幽竹各具神韵，题画诗也脍炙人口。如：

新竹高于老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明年再有新生者，十丈龙孙绕凤池。

——题画竹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南西北风。

——竹石

四十年来画竹枝，日间挥写夜日间思。冗繁削尽留清瘦，画到生时是熟时。

——题画竹

苏轼是“文人画”的实践者和理论先驱，他的竹画名躁一时，是文湖州竹派的重要成员，他自己也说“吾为墨竹尽得与可之法”。北宋大画家米芾说：画竹“以深墨为面，淡为背，自与可始”，又说，苏轼子瞻作墨竹从地一起至顶……运思清拔。南宋一位画论家也说，先生运思清拔，其英风劲气逼人，使人应接不暇。他们都极夸东坡的画竹高妙无比。

然而，苏东坡有关竹子的诗文更是情思奇妙，

令人神往。如：《记承天寺夜游》，空灵洁雅，宁静脱俗，写出了一个清凉世界之夜，其文为：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人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他还把竹子比作君子，极言其品格高尚，如诗《于潜僧绿筠轩》云：“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旁人笑此言，似高还是痴。若对此君仍大嚼，世间哪有扬州鹤。”他常常借竹子来歌颂他人的品行高洁、娴静淳美、风姿飘逸。例如词《临江仙·送钱穆父》上片：“一别都门三改火，天涯踏尽红尘。依然一笑作春温。无波真古井，有节是秋筠。”《水龙吟·赠赵晦之吹笛侍儿》上片：“楚山修竹如云，异材秀出千林表。龙须半翦，凤膺微涨，玉肌匀绕。木落淮南，雨晴云梦，月明风袅。自中郎不见，桓伊去后，知孤负，秋多少。”诗《傅尧俞济源草堂》：“先生卜筑临清济，乔木如今似画图。邻里亦知偏爱竹，春来相与护龙雏。”

人们爱竹喜竹，就是因为竹有高雅气韵，这是世人所欣羡而欲得之的品格。即使争名于朝争利於市的人，也想自己有些“竹韵”，借以冲淡他们的一些俗气。那么，何谓“竹韵”？我认为有四个特点：一是灵气，二是生气，三是节气，四是雅气。

竹子的灵气，来自空中的云龙。《汉书·方术

传》有种竹化龙的故事，从此竹与龙发生了联系。龙是一种神物，仙风道骨，充满了灵气。《易经》乾卦称，龙的作为，可以预示人事的否泰、成败、兴衰。它上天入海，腾云吐雾，无所不能。龙是不易见的，竹子遍地皆是，于是随着竹化龙的故事，在人们的心目中，龙的灵气也就注入了竹子，使竹子不仅具有灵气，甚至把竹子，当成了龙的化身。所以，人们常常称新竹为“龙子”“龙孙”“龙雏”。

竹子的生气，尽人皆知。所谓：“一夜春雨过，遍地是新笋。”正如郑板桥的诗：“明年再有新生者，十丈龙孙绕凤池。”竹子不怕风、不怕雨，顶严寒、送清凉，永远充满勃勃的生机，给人们以积极向上的姿态。

竹子的节气，是自然赋予他的神韵，因为竹子生性有节。人们常常以竹节来歌颂有气节、有骨气、有志向的人，或以竹节来鼓励勇于任事的人。临危可以受命，遇凶不畏强暴，不义之财不取，与朋友交有信。人们把竹子的节韵，立为人生要义的第一位。

竹子的雅气，在于它摇曳多姿，娴静洒脱，不与富贵的牡丹为伍，甘同梅兰菊结盟，人称“岁寒四友”，把忧喜得失，一概置之度外，正如古贤所说：“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安贫乐道，随遇而安。

苏轼爱竹、种竹、画竹、咏竹，与竹同好，有不解的情结。此乃是，他以此寄托自己的身世品行；反过来，它的四韵也正好写出了他一生为人的高洁品格。苏东坡积极向上，忠君爱国，坚强有节。他在官场的浮沉中，决不趋炎附势，一身正气，大义凛然；他在恶劣的环境中，决不消沉，旷达潇洒，随遇而安；他多才多艺，富有感情，随手拈来皆成佳作，充满了灵气。高雅的竹韵和高洁的品行，和谐地集中地体现了苏东坡的一生。

（民主法制出版社原社长）

（上接 57 页）

愚以为，诗歌能有人演唱和广泛流传，至关

重要，直到今天，能听到歌手用唐宋诗词谱曲和演唱最多的就当数李白、李煜和苏东坡了。不仅因为他们作品的内容真实感人，其可入乐性也是不容置疑的。词律在当时尽管严格，但没有人敢说哪个就是唯一标准，最多也就是所谓正格与变格，都能通用，这就是变通。词牌最初的曲调早已失传，精通音乐的柳郎的“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曲谱试问现在谁还能唱？

恰恰就是被称为“当代李清照”，其早期词作又被指“遂近少游”的沈祖棻为苏东坡“不懂词乐”正名，这是有其特殊意义的。我们知道东坡同时也是古文大家，在他的大量散文和赋中曾多次提到与音乐有关的事，足以证明他不仅通晓音律，而且对乐音、乐者和自然界的物什有着非常精当的辩识能力和生动形象的比喻。《喜雨亭记》：“既以名亭，又从而歌之”；《放鹤亭记》：“山人欣然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鹤招鹤之歌”；《石钟山记》：“至唐李渤，始访其遗踪，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宫音），北声清越（商音）”，“舟回至两山间，将入港口，有大石当中流，可坐百人。（石）空中而多窍（小眼），与风水相吞吐，有窾坎镗鞳之声”；《前赤壁赋》：“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客有吹洞箫者，依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等等。东坡之多才多艺，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沈先生既以词名，谙熟音律，对音乐一定不是外行；她的词作，现已有三十多首被谱成歌曲，《涉江诗词选唱》正式出版并已多次演出并被广泛传唱。因此，沈祖棻先生对东坡的研究，最具有权威性，但她的文章注重论据，旁征博引，客观而不武断，这种治学态度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学习的。我既景仰东坡，又是沈祖棻的“粉丝”，我的解读，只能算是一篇读后感吧。

（西藏军区歌舞团原创作者）

浅析《秦邮帖》拓本

万波

宋元丰七年（1084）十月，苏轼途经高邮，与友人王巩、孙觉、秦观品酒论文、吟诗作赋，时广陵郡太守欣然题写“文游台”三字于此。清嘉庆乙亥年（1815）师亮采在秦邮（今江苏省高邮市）任太守时，在文游台增祀六君子牌位。阮元题跋补记曰：“师司马权知高邮，雅意汲古刻秦邮帖置文游台，皆苏黄秦孙诸贤文事也，司马又增祀黄山谷、孙览、孙巨源、秦少章、少仪、陈唐卿六君木主于四贤之后。”并且嘱咐钱泳（当时著名金石家）汇聚苏轼、黄庭坚、米芾、秦少游、秦少章、赵孟頫、董其昌诸名家墨迹刻于文游台的石壁之上，其拓本谓之《秦邮帖》。师亮采跋文记述镌刻经过曰：“嘉庆甲戌七月余摄篆秦邮，暇时登文游台谒四贤祠，意谓苏文忠与孙莘老、王定国、秦淮海辈，尝游是台而无诸公遗墨为阙典，乃嘱金匱钱梅溪先生聚诸名迹刻石壁间，命曰秦邮帖，可增艺林中一段佳话也。次年秋八月韩城师亮采书。”

眉山三苏祠博物馆珍藏有两套清嘉庆《秦邮帖》拓本，纵13.8厘米，横25厘米。拓本拓制精良，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研究价值，其中苏轼的五帖尤其让人爱不释手。

眉山三苏祠博物馆藏《秦邮帖》拓本共四卷：卷一为苏轼《春帖子词》、《墨妙亭诗》、《烟江叠嶂图诗》、《挑耳图题后》。

《春帖子词》（见40页，局部）帖是苏轼于北宋元祐二年（1087）所书，帖的内容是苏轼在“立春”日写给皇上和皇太后的节日祝词，字体为行楷书。春帖子，又称春端帖、春端帖子。原

本是一种在“立春”日剪帖在宫中门帐上书有诗句的帖子。诗体近于宫词，多为绝句，文字工丽，内容大都是歌功颂德的，或者寓规谏之意。立春日作春帖词的风俗，盛行于宋代。苏轼《春帖子词》中的“草木渐知春，萌芽处处新。从今八千岁，合抱是灵椿。”从中可见苏轼迎接春天时的欣喜、浪漫与豪迈之情。“宫中侍女减珠翠，雪里贫民得袴襦”，意思是说只要宫中的侍女们少戴一些珍珠翡翠，少搽一些香脂花粉，生活在贫困中的百姓就可以“有裤穿有被褥用”，字里行间反映出苏东坡为民请愿的精神，难能可贵！

《孙莘老求墨妙亭诗》作于北宋熙宁五年（1072），苏轼的好友孙觉（字莘老）建“墨妙亭”于吴兴府第中，以藏古碑刻法帖，向苏轼求诗题咏。苏轼欣然作此诗于杭州。苏轼在诗中提出了著名的美学观：“短长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

《烟江叠嶂图诗》帖据苏轼自署书于北宋元祐四年（1089）三月十日，款识后有一枚方形印“赵郡苏氏”。《烟江叠嶂图》是宋代著名画家王诜（字晋卿）的名作。苏轼在诗中表达了归隐之意。

《挑耳图题后》帖，又名《王斋翰勘书图跋》，是苏轼于北宋元祐六年（1091）六月二日行书题跋一则。《挑耳图》是南唐画院待诏王斋翰所作。苏轼曾见到王定国收藏的《挑耳图》，也正是从王晋卿那里得到的，于是，苏轼在题跋中记载了一件有关王晋卿的逸事。（下转79页）

读《黄州寒食诗帖》的体会

翁寒春

一直钦佩那种有悟性的艺术天才，似乎他们做哪一行都出色，在哪一门类都能驾轻就熟、出类拔萃。他们站在高高的艺术殿堂上，让世人为之景仰、为之向往。他们也永远指引着后人。以榜样卓立于千秋万代。

因着小儿姓苏的缘故，从小输灌“苏轼是你爷爷的爷爷的……”搜罗到的有关苏轼的文、辞、歌、赋、诗词等文献资料，一古脑地教小儿遍读遍背，其中《黄州寒食诗》这本薄薄的小字帖一读便是大半年，先不说小儿对此有多少理解与接受，自己倒是慢慢地悟出其中的滋味来，字里行间渐清晰明朗。甚至于其中一个个形态各异、浓淡不一的字也鲜活了起来，他们在争相表达，为能出现在苏公的笔下而欢欣雀跃。但是它们又无奈又凄苦，因为它们没有给苏公带来愉悦和祥和……

是的，在这样一个淫雨霏霏的寒食季节，既无酒肉与膏黄，亦无丝竹与美景，更无佳人与良朋。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团练副使这个闲职的苏轼，抑郁寡欢。看着破旧的灶台、湿漉的柴火，听着门外的凄风厉雨，聊赖烦闷，思绪万千……苏轼移步书台斜握笔管，二首寒食诗一气呵成……无意无谓无惧，字在思绪飞扬中伴着风声雨声说了话，其中的“苦”字，笔画紧迫、急促，上半部“廿”头与下半部“古”字粘连在一起，特别是“古”字中竖与右竖粗实、厚重似两块大石头，令人苦闷令人窒息。再有“萧瑟”两字，就是不认识这两字的小儿也能感到萧条、凌乱、孤寂的气氛。而“欲”字表现出的夸张动态使人真想与苏公一起承受这绵绵苦雨，真想在这寒夜为之斟上一杯酒，端上一盘东坡肉……而帖中拉长笔画的“年、中、来、苇、纸”字于章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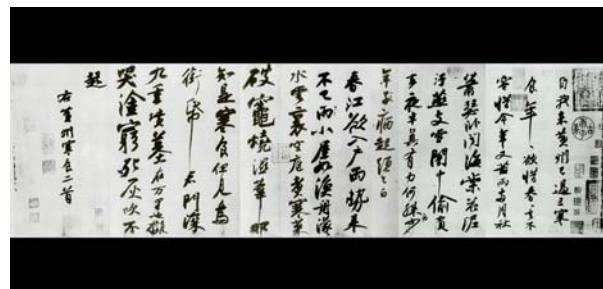
处理上冲实补虚，于郁结中舒张，于拥挤处添白的妙处更是神来之笔！

苏轼有对“在黄州已呆了三年的无奈”，有对被泥沾污的海棠的怜惜，也有对“病起须已白”的伤感。于是笔势的连贯性便不同，浓淡干湿的对比一任自然，大小错落斜正穿插的字迹灵动传神。而后半部分的字迹明显偏大是否也意味着苏轼书写诗文时的宣泄而心情逐渐开朗？而“死”字，这个带有明显悲剧色彩的字，竟然让人感觉不到一丝丝的哀伤与无助，笔势跳动似雀跃，左低右高显飘逸，厚重的笔画与细小的虚笔暗示着苏公的张弛有度、昂然特立。

吴德旋《初月楼论书随笔》有云：“坡公文章气节等皆为一流，余事作书，便有俯视一切之概，动于天然而不自知”。其中“余事作书”便作出了天下第三大行书之《黄州寒食诗》，可见苏公之才，才已盖世。然，“动于天然而不自知”，更是苏公之字外功，诸如学问、修养、品格、情操之综合体现，书法品味至此，难怪黄庭坚发出“本朝善书者，当推为第一”之赞誉来。

此本“黄州寒食诗”帖自当一直读下去、写下去，以弥补自己为文的不足，书写的靡弱，也为着小儿对苏公《黄州寒食诗》帖的传承与发扬……

（香港诗词学会秘书长）



《苏轼为官之道》序

曾枣庄

苏灿、张忠全先生主编的《苏轼为官之道》是他们多年研究的成果。早在2006年，他们就提出了这一课题，并成立课题组，共同讨论确定了全书的框架结构，分头开展研究和写作。他们不仅阅读了苏轼的有关著作，而且用了48天时间，行程万余公里，沿着苏轼当年为官的10个省16个城市进行了实地考察，取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实际感受苏轼的为官经历、为官之道，态度之认真十分感人。

苏轼为官之道，就整个苏轼研究来说，只是一个小小题目。但就这一具体题目而言，它所涉及的内容却非常丰富，包括苏轼为官的民本理念、改革理念、经济理念、教育理念、军事理念、廉政理念、哲学理念及其在各个领域的业绩，他们对这些问题都进行了十分全面的阐述。苏灿和张忠全都是苏轼故乡——眉山市政协的领导，他们“以官论官”，以苏轼故乡的官员论苏轼的为官之道，这与学院派的苏轼研究有很大不同，从各章标题既可看出他们对苏轼的仰慕，更可看出他们对自己为官的要求。

本书编著者围绕苏轼为官之道这个总题目，总体上分为三论：一是绪论；二是政论；三是事论。在绪论部分，分别阐述了苏轼为官的时代背景、为官经历，综述了苏轼为官的基本理念，概述了苏轼为官的千秋功业，在此基础上，深刻地阐述了苏轼为官给我们现在的领导干部如何执好政的三点重要启示：第一，为官之道，要以民为本。要顺应民心，推进改革；要让利于民，多给少取；要急民所难，帮民所需；要启迪民智，培养人才；要保障民安，居安思危。第二，做事之道，要以实为魂。要深入基层，察看实情；要求真务实，敢说实话；为官一任，多办实事；在危险关头，带头实干；不图虚名，重视实效。第三，做人之道，要以廉为先。要充分认识行成于廉，功毁于贪的深刻道理；个人生活要计划开支，加

强自律；要反对奢侈，提倡节俭。这些论述和提炼十分精到，启示十分中肯，对当今做官从政者有较深的启迪。

在政论部分，编著者概括了苏轼为官的七大理念，民本理念、改革理念、经济理念、教育理念、军事理念、廉政理念、哲学理念。民本理念，在论述了苏轼民本理念产生的渊源基础上，揭示了苏轼民本理论的三观：一是“爱民”“忧民”的仁政观；二是“轻赋”“裕民”的惠民观；三是为民而歌的创作观。改革理念，概括了苏轼改革的目的、改革的方法、改革的内容。经济理念概括“忧国”“忧民”的求是观，“减赋”“重农”的富民观，“节用”“廉取”的理财观。教育理念，概括了敦教化，重环境，讲方法。军事理念，概括了尚武思想，治军主张，戍边策略。廉政理念，概括了功废于贪，行成于廉；贫富有别，生死无异；循理无私，节用廉取；建章立制，考课百官；非我所有，一毫莫取。他的哲学理念，主要概括了“无过不及”的中庸观，“时乃日新”的运动观，“刚柔自断”的辩证观，“内圣外王”的人生观。

在事论部分，主要阐述了苏轼在各地担任地方行政长官所做出的业绩，包括经济业绩、军事业绩、社会事业业绩、文学艺术创作业绩。经济业绩方面主要是疏浚湖渠，徐州抗洪，颍州求是，技术革新，登州榷盐。社会事业业绩方面主要是杭州助学，捕蝗赈灾，创建医院，修碓引水，找水打井，筹资修桥，文化使者。军事业绩方面主要是登州固海防，整顿弓箭社，定州固边防。文学艺术贡献方面主要是古文革新，诗的改革，词的开派，一代书家，士人画派和学史考古。

我读了书稿后感到十分欣慰，觉得该书很有学术价值。一是具有创新性。它开拓了苏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填补了苏学研究的一个空白。由过去学术界一直重视对苏轼文学艺术领域的伟大

成就的研究，转移到对苏轼从政为官、治国思想的研究，对苏轼为官、谋事和做人的研究，开创了苏轼研究的一个新天地。二是具有系统性。本书全面地系统地从理论上对苏轼的为官理念、为官实践进行了梳理，为我们批判地继承和借鉴苏轼的为官理念提供了一份比较系统的资料。三是具有实践性。本书不仅从理论上研究了苏轼为官的基本理念，而且紧密结合苏轼为官的实践、现有资料，系统地展示了苏轼为官的千秋功业，使我们既看到了苏轼为官的“知”，又看到了苏轼为官的“行”。

读完书稿，掩卷而思，觉得该书还有三大特点：一是具有现实性。全面系统地展示苏轼的为官之道，对于贯彻执行“古为今用”的方针，批判的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遗产，特别是批判的继承中国历代政治家、思想家的治国理念、治国方略，为各级领导干部提供了一份可借鉴的历史资料。二是具有针对性。本书提出的问题，既是苏轼当年为官从政的理性概括，又给予今天治党、治国、治军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本书的许多观点，例如，“民者，天下之本”的民本论，“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而民不惊”的改革渐变论，“功废于贪，行成于廉”的廉政理念，“全民皆兵”的军事理念等，对于推进科学发展观，推进改革，加强廉政建设，加强国防等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三是借鉴性。本书提出苏轼的为官之道、谋事之道、做人之道，对于现在从政为官的各级领导干部都有一定的借鉴和启发作用。本书的宣传、出版将为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中青年干部为官从政提供一份重要的历史参考资料。它对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建设精神家园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写完上述文字后，我特别对第六章廉政理念，感触更深。书中叙述道：“一是功废于贪，行成于廉。苏轼在《六事廉为本赋》中提出来的‘乃知功废于贪，行成于廉。’讲清了廉洁与功名的关系，廉洁是功名成败的决定因素。二是贫富有别，生死无异。他在《后杞菊赋》中提出一个主要观点：贫也好、富也好、吃肉也好、吃菜也好，最终都不免一死，人生在世何必去贪图荣华富贵。三是循理无私，节用廉取。苏轼认为：‘君子之顺也，岂有他哉，循理无私而已。’（《东坡易传》卷一）实际上就是要求人们按照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办事，不要受到私心杂念的干扰。节用廉取，就是指朝廷要带头减少开支，要减少苛捐杂税。四是建章立制，考课百官。苏轼提出要从制度上约束和惩制腐败官员，他在《六事廉为本赋》中提出，要把廉政考核结果和官员的使

用结合起来。他在《进策》中详细地阐述了考课百官的具体方法，特别强调要严格执法，用法律来约束官员，并依法处理违法的官员。五是非我所有，一毫莫取。苏轼在他那篇著名的《赤壁赋》中提出‘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意思就是说，只要不是自己所拥有的东西，一丝一毫也不要拿。他实际上提出了廉政要从我做起，从自身做起的要求，这对于一个封建官吏来讲，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这些节标题，几乎都是从苏轼原著中提炼出的文字，既可看出他们用功之深，更可看出他们是有感而发。编著者显然在问，今之官员是否真正懂得“功废于贪，行成于廉”，“循理无私，节用廉取”，“非我所有，一毫莫取”的道理呢？

这里提出来的贪与廉，公与私问题是我国讨论了几千年的老问题。我国古代的杨朱是鼓吹大私无公的代表。《孟子·滕文公下》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他还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斥之为禽兽：“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但批判归批判，而实际信奉者却不少，正如宋人吕南公《杨朱》（《灌园集》卷六）诗所说：

战国功名尺寸劳，先生持论异吾曹。
孟轲解辩承三圣，后世谁曾拔一毛？

“先生”即指杨朱，他力主为我，故说他“持论异吾曹（指儒家）”。三圣，有不同说法，《孟子·滕文公下》指夏禹、周公、孔子。“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说得虽好，但包括孔孟之徒在内，有多少人付诸实践了呢？“后世谁曾拔一毛”，这是对孔孟之徒的无情讽刺。

假公济私实质上也是大私无公，因为在假公济私论者看来，公仅仅是手段，私才是目的。我国春秋时代的老子可说是假公济私论的发明人，《老子》第七章说：“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耶，故能成其私。”以“无私”为手段，以“成其私”为目的，老子这套办法，成为后世很多人的处世妙诀。所谓“吃小亏占大便宜”，不过是老子以“无私成其私”的翻版而已。

公与私、贪与廉的问题，说俗一点，就是对金钱的态度问题。《晋书》卷四三《王衍传》载有一则笑话，王衍之妻郭氏“刚愎贪戾，聚敛无厌”。王衍“疾郭之贪鄙，故口未尝言钱。郭欲试之，令婢以钱绕床，使不得行。衍晨起见钱，谓婢曰：‘举阿堵物却！’（把它拿开）。”后来，

阿堵物就成了钱的代名词。

晋人鲁褒撰《钱神论》（《文选补遗》卷二二），称钱为孔方兄，尖锐讽刺钱能通神的社会现实：“亲爱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强。……钱多者处前，钱少者居后，在前者为君长，在后者为臣仆。……钱之所佑，吉无不利，何必读书，然后富贵！（卓）文君解布裳而被锦绣，（司马）相如乘高盖而解犊鼻，官尊名显，皆钱所致。……由是论之，可谓神物。无位而尊，无势而热，排朱门，入紫闼，钱之所以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争辩讼，非钱不胜；孤弱幽滞，非钱不拔；怨愁嫌恨，非钱不解；令闻笑谈，非钱不发。”他把“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成语，改为“生死无命，富贵在钱。何以明之，钱能转祸为福，因败为成，危者得安，死者得生。性命长短，相禄贵贱，皆在乎钱，天何与焉？……夫钱，穷者能使通达，富者能使温暖。”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就是几千年来的社会现实。

唐代徐夤的《咏钱》（《全唐诗》卷七一〇）诗云：

多蓄多藏岂足论，有谁还议济王孙。
能于祸处翻为福，解向仇家买得恩。
几怪邓通难免饿，须知夷甫未曾言。
朝争暮竞何归处，尽入权门与倖门。

诗一开头就感叹，世人都忙于多蓄多藏金钱，没有人以钱接济贫困的人，包括破落的贵族子弟（王孙）。三四句感叹金钱的能量太大了，它能转祸为福，化敌为友。邓通，汉文帝时的上大夫。看相的人为邓通看相，说通将贫饿而死。文帝自以为能使邓通富有，于是以蜀之严道铜山赐邓，允许他自铸钱。因此，邓通之钱布满天下。汉景帝立，有人告发邓通铸钱，下吏按问，尽没入官，后邓通竟饿死。此诗第五句“几怪邓通能免饿”即咏此事，谓有钱的邓通结果饿死，似乎令人奇怪；但他之所以饿死，恰恰因为后来无钱了。第六句咏王衍（夷甫）口不言钱事。最后两句咏贪官污吏对钱是“朝争暮竞”，钱还能到何处去呢？自然是尽入有权有势的人家与受君主宠幸的人家了。

宋代常州有一位十六岁的女子写了一首《拾得破钱》（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一四）的诗：

半轮残月掩尘埃，依稀尤有开元字。
想得清光未破时，买尽人间不平事。

前二句咏破钱，它像半轮残月一样埋在尘埃之中，开元通宝的字样还依稀可见。后二句想象它未残破时（“清光未破时”）的威力，可以“买尽人间不平事”，也就是《钱神论》所说的“钱能转祸为福，因败为成，危者得安，死者得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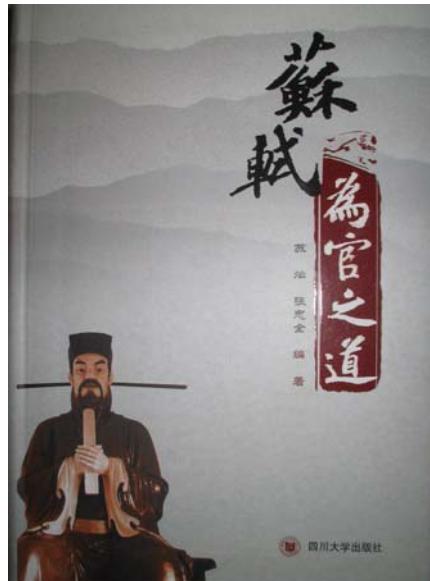
明人沈周《咏钱》诗（《佩文斋咏物诗选》

卷一五四）云：

个许微躯万事任，似泉流动利源深。
平章万物无偏颇，滥泛儿童有爱心。
一饱莫充输白粟，五财同用愧黄金。
可怜别另为贿赂，多少英雄就此沉。

前五句亦写金钱万能，钱虽个子很小（微躯），但万事都可胜任，它像泉水一样流动，利源很深。它虽不能充饥，但却胜过粟米，金、木、水、火、土五材（“五财”同“五材”）的用处也有愧于黄金。钱可筹措（平章）万物，无所偏颇，故为人人所喜爱，包括儿童在内。最后两句比前引诗文都更深刻，可怜它还成了贿赂的工具，多少英雄都在它面前堕落沉没。“多少英雄就此沉”，就是本书编著者所说的“‘功废于贪，行成于廉’，讲清了廉洁与功名的关系，廉洁是功名成败的决定因素”。上述关于钱财的一段文字，虽与本书的关系不大，我把它写出来，目的是想让人们在学习研究苏轼为官之道时，有所启发和警醒。

（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名誉会长）



苏灿、张忠全编著《苏轼为官之道》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定价：25.00 元

苏海畅游情甚笃

——记知名苏东坡研究者韩国强

王诗波 王霞

“苏海畅游情甚笃，云帆直挂志弥坚。”是江苏盐城师范学院王文龙教授赠诗；“清风两袖何惆怅，意足东坡伴此生。”是知名苏东坡研究者韩国强的独白。生于苏东坡晚年谪居地——中和镇的韩国强，在儋州具体负责筹办过两次全国性学术研讨会议；曾11次应邀出席全国苏轼学术研讨会，主要苏学成果有：《寻访东坡踪迹》（游记散文集）、《苏东坡在儋州》（论文集）、《意境清新，情趣盎然——苏轼海南诗文选读》（鉴赏集）。他一生对东坡的景仰、追求以及取得的成果，可概括为“三个创新”：

创新一：以游记塑造东坡形象

在苏学研究领域，韩国强独辟蹊径，选择游记散文记叙东坡踪迹，并刻画东坡形象，同时可借景抒情表达对东坡的仰慕，在《寻访东坡踪迹·后记》中写道：“怎样表达对苏东坡的崇敬，又不重蹈前人的旧辙，提高文章的可读性？我苦苦地思索，努力寻找一种与众不同的表达形式。”

韩国强的第一篇游记散文《游东坡赤壁》发表于1983年5月5日《海南日报》副刊，不久，另一篇散文《石钟山记》又在《海南日报》刊登。从此，下三峡，走秦川，东观渤海，北履中山，留连黄州、惠州，专访开封、杭州、徐州、颍州、扬州、常州、宜兴、高游、密州。东坡经行处，几乎都有他的足迹。

韩国强的写作非常严谨，著名苏学专家孔凡礼在《寻访东坡踪迹·序》中说：“他是一个向导，一个严谨的学者，但也不是一般的向导，一般的严谨的学者。”一次，他跟南京的同志打听王安石故居情况，却一无所得；后来，在常州文友的帮助下，终于从《江南胜迹》一书中找到。他便到

南京寻访，人地生疏，他不厌其烦地问路，才来到海军学院门口。但那里却挂着一块“军事禁区”的牌子，使他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经过一番磨嘴，最后取得哨兵的谅解，才获准入内探访王安石故居。回来后，他阅读了大量苏王来往的诗词和有关的评论。他吸收当今苏学研究的成果，纠正过去一些错误观点，写出苏、王的真诚友谊，肯定了王安石和苏东坡都是改革派，只是改革的方式不同而已。《访王安石故居》写出来后，很快就被《广州日报》采用。

历时18年，尝尽了文学创作的酸甜苦辣，但是，他的汗水没有白流，《寻访东坡踪迹》1996年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2001年由该公司再版。《寻访东坡踪迹》的出版为他赢得了声誉。

中国人民大学朱清华教授在《情系东坡魂》一文中这样评论：“韩国强魂萦梦绕，以其寻踪散文，概括出了苏东坡苦旅的一生。并在其散文中，展开了想象的翅膀，处处塑造和再现着崇高而具有丰富内涵的东坡形象，以使读者获得一个可视、可触、可亲的艺术形象，从性情、节操上受到陶冶。更为重要的是，作者还着重在逝去的岁月云海中寻觅东坡的诗意图灵，给我们提供出富有人生哲见的种种有益启迪，这应是本书的巨大艺术贡献。”

厦门大学黄鸣奋教授说：“捧读大作，不胜欣喜。多年来，我们经常面对的是‘学术化’的苏轼，而您以生花妙笔展现东坡多方面的情趣；我们习惯于利用卷宗、典籍里的材料去与古人为友，而您却不远万里，实地踏勘，勾勒出今人眼里的苏东坡。”

《寻访东坡踪迹》一书掀起如此大的波澜，是韩国强始料未及的。

创新二：以论文再现儋州的苏东坡

韩国强于1982年加入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为了研究有所突破，他把研究范围锁定在儋州。

苏东坡晚年应当是个什么形象呢？众说纷纭。他在《东坡居儋生活初探》引用翔实的资料分析东坡居儋的心态后指出，我们“在看到东坡居儋乐观一面的同时，也看到东坡在逆境中忧伤的一面。”在《从〈和陶诗〉看苏轼晚年的心态》一文更是展现一个充满复杂心态的苏东坡形象。他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对政治彻底厌倦，对功名心恢意懒；揭露官场龌龊，怀百姓之深情；反省人生，内心充满种种矛盾。

苏东坡在困境中仍然不忘为百姓做好事。在《以民为本，是苏轼一以贯之的政治思想》中他全面论述这个观点。他的《苏轼居儋功业述评》全方位展示东坡的居儋功业。如劝导民族团结、敷扬文教、鼓励发展生产、传授治病药方、倡导改变落后习俗，等等。

《论苏轼小品文的价值》展现东坡对儋州风土民俗的热爱，对黎民百姓的关心。《论苏轼儋州词》、《情感奔放，想象瑰奇——苏轼〈行琼儋间……〉赏析》等篇，表现东坡的豪放性格。《意境清新 情趣盎然——苏轼《纵笔三首》》则表现东坡的在逆境中闲情逸趣。《苏轼晚年的两篇酒赋》阐述东坡的饮酒观——饮酒不求酒量，但求酒趣。《〈艾子杂说〉的政治倾向》展示东坡暴露官场的黑暗，怒斥暴君的残暴，揭露变法的弊病的情况，使人看到东坡的傲骨，并没有因被迫害而改变。

苏东坡居儋创作十分丰富，举凡诗、词、赋、小品、史论、寓言等文体，无不让人看到他晚年思想在字里行间闪光。韩国强在《论苏轼反映汉黎关系的诗篇》、《苏轼居儋生活初探》、《从〈和陶诗〉看苏轼晚年心态》、《论苏轼儋州小品文的价值》、《论苏轼的儋州词》、《苏轼居儋功业述评》、《评苏轼的海外史论》等论文，剖析苏东坡晚年的内心世界，让人们认识一个真实的儋州苏东坡。

韩国强从开始写作第一篇论文《论苏轼反映汉黎关系的诗篇》到最后一篇论文《〈书传〉是苏轼晚年的学术力作》，历时20年。他把这些论文汇集成册，名之曰：《苏东坡在儋州》。

创新三：创办全国首个家庭仰苏书屋

创办仰苏书屋是韩国强对东坡景仰的独特方式。他在退休后，发挥余热，创办仰苏书屋，无偿供青少年和东坡爱好者参观和查阅资料。

在决定创办“仰苏书屋”之初，可谓困难重重。韩国强虽然收藏大量东坡的著作和后人的研究专著，然而，要办成一个像样的书屋，显然差距尚远。为了办好“仰苏书屋”，他一边制定“仰苏书屋”陈列方案，一边继续收集资料。他告诉记者，仰苏书屋的资料来源，一是自己掏钱购买。为了购买东坡著作，不惜重金，“该出手时就出手”。一套《三苏全集》近千元，毫不吝惜。有一年，他在四川眉山开会，已上车，发现有人买到东坡的书画，便立即托工作人员去购买。二是国内苏学专家赠送。如朱清华的《苏轼论》、唐凯琳（美国）的《苏轼史研究》、王文龙等的《苏轼词新释辑评》、刘尚荣的《苏轼著作版本论丛》、黄鸣奋的《论苏轼的文艺心理观》、刘乃昌的《苏轼选集》、周伟民和唐玲玲的《苏轼思想研究》、薛瑞生的《东坡词编年笺证》、王洪的《苏东坡研究》、王友胜的《苏诗研究史稿》、颜中其的《苏东坡论》、陈慧君的《悲歌为黎元——苏东坡》等。企业家尧军是东坡爱好者，知道韩国强创办仰苏书屋，也从遥远的四川寄来台湾出版的《苏东坡大传》和《千年英雄——苏东坡图传》。他家中的东坡资料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积累起来，成为他人生的宝贵精神食粮。

仰苏书屋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诞生。海南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韩秀仪为书屋题写匾名。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吴运环书写书屋楹联。中堂的《东坡醉酒图》为海南大学教授、著名画家李锛所画。书屋共分五部分：一是东坡生平，二是东坡踪迹，三是东坡神韵，四是东坡魅力，五是东坡遗风。书屋资料翔实，图文并茂。它通过图片、文字、实物（著作、书画）展示东坡的无穷魅力。韩国强的仰苏书屋为全国家庭首创，也是儋州市精神文明建设的创举。目前，书屋已陆续接待不同层次的来访者。

“高风人景仰，苏学世推崇。”韩国强撰写的这副对联表达书屋主人，及后人对东坡的景仰之情。韩国强用心血营造的仰苏书屋已拉开陈列序幕，一册册书本，一张张图片，一幅幅国画，蕴含着他的悠悠仰苏情结……

（本刊编辑根据《今日儋州》记者王诗波、王霞通讯删改）

日本苏轼研究述略一

(日本) 池泽滋子

中日文化交流在远古史前时期就已开始，在公元3世纪中国文献典籍已开始东传日本。在8世纪以前，中国典籍主要通过人口迁移流传日本①，在中国唐代，日本皇室掀起学习中国文化的高潮，日本常派遣唐使来华，其成员有不少为世俗、僧侣学者，带回大量的中国典籍，当时中国图书半已流传日本。中国的著名文人如王维、储光曦、李白、刘禹锡等等，都曾与日人唱和，留下了不少佳话。

但从唐末五代起，直至整个宋代，日本政府停止了向中国派遣使节、留学生和学问僧，唐代中日文人相互唱酬的盛况，在宋代见不到了，故宋代中日文化交流远逊于唐。但中日民间的文化交流仍在继续。如建隆元年(960)，吴越王钱俶曾遣使备金，去日本和高丽写天台教籍。太平兴国八年(983)日僧周然曾乘商船至台州，次年即雍熙元年(984)到京城开封，献日本国的《职员令》、《王年代纪》；又携来《孝经》1卷、唐太宗子越王李贞《孝经新义》，可见中日文化交流是双向的。双向的内容一为日本典籍也流传到中国，一为中国典籍在本土失传，而从日本回流。欧阳修《日本刀歌》云：“传闻其国居大岛，土壤沃饶风俗好。其先徐福祚秦民，采药淹留卯童老。百工五种与之居，至今器玩皆精巧。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所咏即此事，后两句说的正是有一些图书在中国已经失传，而日本却还保留着，并回流中国。咸平六年(1003)又有日僧寂照奉师源信之命，渡海来华向四明名僧知礼问天台教义，知礼《四明尊者教行录》卷四收有源信来函及知礼《答日本国师二十七问》。王钦臣《王氏谈录》云：“祥符中，日本僧寂照来朝，后求礼

天台山。先中令守会稽，寂照经由来谒。寂照善书迹，习二王，而不习华言，但以笔札通意。时长兄为天台宰，中令以书导之，兼赠诗云：‘沧波泛瓶锡，几日到天朝？乡信日边断，归程海面遥。秋泉吟里落，霜叶定中飘。为爱华风住，扶桑梦自消。’既至天台，至书来谢，累幅勤至，其字体婉美可爱。”天圣六年(1028)又有日僧绍良奉师命来华向知礼的嗣席文智问疑10条，并以金字《法华经》为贽见之礼。其后日僧来华学佛者更多，到南宋时更是络绎不绝，有名可考者就有荣西、道元、辨圆、普门、静照、绍明、义尹、义介、安秀、长贺、净业、湛海、智镜、道玄等。宋版《大藏经》如蜀藏、福州藏，都曾由日僧携回日本。

除日僧来华外，也有一些中国僧人去日本传法。淳祐六年(1246)，宋僧道隆应日本入宋僧的邀请，率弟子数人东渡日本，创建长寺，宣扬祥风，颇受日本幕府及僧众的欢迎。景定元年(1260)，道隆又写信回国，邀请普宁赴日，继道隆住建长寺，留日五年返宋。祥兴元年(1278)，道隆卒于日本，日本幕府派神僧德隆、宗英入宋，迎请宋僧祖元赴日，主持建长寺，也受到日本朝野僧俗的一致欢迎，成为日本圆觉寺的开山祖师。此外，赴日宋僧还有正念、士昙等人，他们对在日本传播佛教文化，促进中日文化交流都有贡献。

宋代的中日文化交流主要是由两国僧人进行的。但也有非僧人。咸平五年(1002)，建州海贾周世昌遇大风飘至日本，7年后携日本藤木吉来华，受到真宗召见。世昌以其国人唱和诗来上，《宋史》卷491《日本国传》载其事而未录其诗，谓“词甚雕刻肤浅无所取”。《月令广义》“二月令”条“桃

李春”注所引藤木吉诗，却并不“雕刻”：“君问吾风俗，吾风俗最淳。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意思是说日本的制度礼乐、饮食习惯、自然景色都与中国相似。日本典籍也有记载，《邻交征书》初编卷2载有《和藤原为时》诗，原注引《宋史·日本国传》有关周世昌、藤木吉的记载，断言“姜世昌、周世昌盖为同人”。姜世昌、周世昌既为同人，那么《宋史》所载的藤木吉与日籍《邻交征书》所载的藤原为时，很可能也是同一个人。严绍璗先生的《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引了这条材料，但很谨慎，谓“藤原为时与藤木吉，究竟是同一个人，抑是两个人，尚因实证材料不足，姑且存疑”。但他显然倾向于为同一个人，认为“如果记载确实，那么这在中国古代文学关系史上，便是饶有意味的了。藤原为时系平安王朝后期显赫的藤原氏族的成员，他是著名的女作家紫式部的父亲，本人又极擅长汉诗”。总之，宋代的中日文化交流虽不及唐代发达，有关记载仍不绝于书。

但苏轼著述是否在北宋已传入日本，没有明确记载。秦观《客有传朝义欲以子瞻使高丽，大臣有惜其去者，白罢之，作诗以纪其事》诗，有“颖士声名动倭国，乐天辞笔过鸡林”句，似乎苏轼在世时，其声名已“动倭国”。但这仅仅是作为咏“子瞻使高丽”的衬笔，还是实录，现仍难以确定。苏轼著述流传日本，见于文字记载始于南宋，南宋理宗嘉熙四年（1240）入宋僧辨圆（圣一国师）从中国带回图书数千卷，藏于京都东福寺普门院。百余年后，元代至正十三年（1353）日本东福寺大德一以编成《普门院经论章疏语录儒术等目录》（此目录中的书多半是普门开山祖圣一国师从宋带回来的），著录该寺所藏的102种汉籍外典中，就有《东坡词》2册、《东坡长短句》1册、这是现在所知苏词在日本的最早著录，惜已失传。神田氏判定此《注坡词》就是《直斋书录解题》卷21《歌词类》中的“《注坡词》2卷，仙溪傅干撰”。托名苏轼所作的《历代地理指掌掌图》却保存下来了，收藏在东洋文库。南宋、金、元流传日本的苏轼著述，肯定远不止此，因为在日本镰仓、室町时代（14-16世纪），苏轼著述在日本已很多，且研读苏诗成风，出现了日本四僧的苏诗注《四河入海》。

第一节 日本镰仓、室町时代

（14-16世纪）禅僧的苏轼研究

《四河入海》25卷是五山禅僧笑云清三编的苏诗的讲义录集。五山是在京都、镰仓分别有的五个大寺庙。镰仓的五山是建长寺、圆觉寺、寿福寺、净智寺、净妙寺。京都的五山是天龙寺、相国寺、建仁寺、东福寺、万寿寺（还有南禅寺，在京都五山的上层）。以这些五山禅僧为中心，中国诗文的创作活动和研究很盛行。这些五山禅僧做的诗文叫做“五山文学”。镰仓时代有入了日本籍的宋僧一山一宁和他的门人虎关师链、雪村友梅等人。他们对后来五山禅僧的中国诗文的创作活动起了先驱的作用。后来在从南北朝时代到室町时代前期（14世纪前期—15世纪）五山文学“的活动很昌盛。在那个时代不断涌现出了中岩圆月（虎关的门人，曾渡元）、义堂周信、绝海中津（他们是梦窗疏石的门人）等伟大的诗人。室町时代后期（16世纪前期）在五山僧之间广泛地流行阅读《三体诗》、《古文真宝》，杜甫、苏轼、黄庭坚的别集，并为此出了很多注释本。就在这个时候（1534）《四河入海》成书。

关于《四河入海》的研究已有仓田淳之助氏、铃木博氏的论文②和中田祝夫氏的《四河入海解说》③。在此，首先参考这些文献，介绍《四河入海》。

一 《四河入海》的成书

《四河入海》的最后部分，有编著笑云清三的后记和清三之友大痴贤淳的后跋。这些文章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四河入海》的名称、成书情况、编者等资料。笑云清三《后记》云：

此抄者集北禅和尚《胜说》、慧林和尚《翰苑遗芳》、一翁《翁听书》、万里居士《天下白》，以题句下，故名曰《四河入海》也。一翁之听书者竹处和尚（桃源瑞仙，下述）之口诀也。愚又受一翁口诀矣。翁一日告愚曰，集以大成则可矣。愚之抄之起本者，盖翁遗意也。大永七年（1527）丁亥始笔，天文三年（1534）甲午绝笔矣。字字鲁鱼，句句传傅，庶几后君子以是正焉。天文三年甲午七月五日，笑三书。

大痴贤淳的后跋云：

惠日（1272-1340）派下，笑云清三和尚者，势（伊势）之奇产也。自幼好学，手不

释卷，臂不离案者，四十有余年，至老益壮也，读书既破万卷矣。最殚思于苏玉堂之诗也，校雠本邦《胜》、《翰》、《白》诸抄，受业师一韩《翁听书》抄合成一集而分卷为五十，名曰《四河入海》。譬诸江、河、淮、济之四滨，流入大洋者耶。……书已成，告愚曰，诸子书一语于厥后。愚笑曰，鬓雪深而眼日晦，荆于口，苔于砚，见狭于牛迹，闻浅于潢潦。实如以蠡测海焉，其然也。师曰，吾所求者同门之旧好也。苟非论才之浅深，名之轻重。愚感激于兹矣。披卷阅之，苏公七世之涕唾，舌上捲万亿香水海，胸中吞千阿耨池，盃看鲸波鲲浪，芥视虬宫蜃藏，玉堂云亦得，赤壁月亦得，混融得失于世波，乌帽底即是，白沤前即是，冰消是非于眼宇，淆之不浊，澄之不清，注而不盈，酌而不竭，浩浩乎，荡荡焉。四翁注释之余波，榷万斛舟抬巨灵乎。诚可谓雾海南针，夜途北斗也。东涌西没，南涌北没，无处不究其渊源。呜呼，至矣，尽矣。不出巷而知大宋天下者，其唯斯一集耶。睂夫先生，在汉为邹阳，在唐为乐天，在宋五祖戒，在元虞邵庵，今在日东盖非师其谁欤，我又何言乎。所希使学者誊写之弥漫于四海，亦使后人传写之，复使后人传之无穷。（天文岁舍甲午（1534）腊月立春前数日，同门小比丘伊衲贤谨跋。）

从上文可知，笑云清三继承其师一韩智翊的遗志，从1527年到1534年共花了8年的时间写完这部《四河入海》。《四河入海》这个书名是取集成瑞溪周凤的《脞说》（1461年左右），太岳周崇的《翰苑遗芳》（1940年后），一韩智翊的《蕉雨余滴》（一韩翁听书），万里集九的《天下白》（1482）而编成的意思。开始编的时候，没有《四河入海》这个名称。中田氏在《解说》中指出，在东福寺藏亲笔稿本《四河入海》第10下卷末有“坡诗六卷杂抄，大永八年（1528）戊子孟春二十八日在归田寺之南轩抄毕。三志。”第25下卷末有“坡诗十卷抄，亨禄二年（1529）己丑五月十九日在归田寺之南轩抄毕。清三志”。可知1528、1529年还没有《四河入海》这个名称。④

据中田氏的《年谱》，《四河入海》成书（1527年抄）具体过程如下：

1423年，太岳周崇卒，著《翰苑遗芳》；

- 1428年，岩中周噩卒，著《东坡诗抄》，已佚；
- 1437年，惟肖得岩卒，著《东坡诗抄》，已佚；
- 1446年，江西龙派卒，著东坡诗抄《天马玉津抹》（《续录》）；
- 1463年，瑞溪周凤《脞说》25卷，补遗1卷成稿；
- 1482年，万里集九《天下白》成书；
- 1489年，桃源瑞仙卒，他曾讲解坡诗《一韩翁听书（蕉雨余滴）》；
- 1499年，笑云写抄《帐中香》（万里的黄山谷诗抄）；
- 1527年，笑云开始编《四河入海》；
- 1534年，《四河入海》完稿。（未完待续）

论文注释：

①据日本《古事记》，邹有恒、吕元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日本书记》，日本东京堂刊岸本宗道校本，日本明治二十五年。

②仓田淳之助《施注与〈翰苑遗芳〉》（《苏诗佚注》），铃木博《四河入海》（《抄物资料集成》第7卷）。

③《抄本大别刊·四河入海》。

④阿部隆一氏在《东福寺藏笑云清三自笔稿本〈四河入海〉，万里自笔跋文清三书入〈帐中香〉及其他》（《阿部隆一遗稿集》第2卷，汲古书院，1985年）里已经指出名称的问题。

（日本中央大学教授）



（右一：池泽滋子）

苏东坡的政治人生（二、三）

雷金贵

第二章 昏世而出思想家

6 对历史不公平

宋代国运，前后三百多年，不可以说不长，却没有重振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一样的汉唐雄风，更没有实现中国的大一统。三百多年而无有大的作为，这是一段很让人气闷的历史。

本来，宋朝诞生了火药、发明了指南针、创造了活字印刷术，又承继了唐朝的造纸术，拥有了四大发明的大宋王朝，完全可以大作为于中国，甚至可以大作为于世界。远在欧洲的马克思，我们尊为革命的导师，曾经精辟的说过，这三项伟大发明，具有划时代意义。但是抱残守缺的宋王朝，不但没有因此而划出崭新的时代，反而在屡败于西夏、契丹以后，丧失了所有的志气，丧失了所有的骨气，而妄自尊大，而苟且偷安。

历史上，最软骨的就是宋朝了。

赵家宗室碌碌无为，却催生了一批名垂千古的风流人物。

这不奇怪。

真的不奇怪！

愤怒而出诗人！

乱世而出英雄！

昏世而出思想家！

包拯，包青天，青天可是贪官污吏的天敌，是恶霸地痞的铡刀，而对百姓来说，却是温暖而灿烂的阳光。一千多年了，在民间，包青天还有那么崇高的地位，北宋的污浊可见一斑。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者，却处于江湖之远。欧阳修、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唐宋八大家”者，同时著名于北宋

中叶。古文运动，狂飙突起，扫除了靡靡之音，一批至大至刚的思想诞生了，一批磅礴气势的文章诞生了，一座巍峨于中国历史的文化高峰思想高峰诞生了。以及杨家将、李纲、岳家军、辛弃疾、文天祥……驰骋疆场，却抱憾疆场；精忠报国，却报国无门。

宋朝的确是值得研究的。

宋朝的若干政策之得失，比如农业的、工商业的、财政的、人事的、文化的、思想的、军事的等等，至今都具有警示意义。过去的一个时期里，我们一方面赞扬王安石变法，并把他编入了政治课本语文课本；我们一方面又赞扬水浒好汉，除了把宋江列为右倾的投降派以外，武松等等又是英雄好汉。剔除《水浒传》的小说成分，王安石的以富朝廷为目的的变法，是不是官逼民反的始作俑者呢？盐都买不起吃不起了，人民难道还不造反！

以后我还要说到北宋对四川的苛政，比猛虎还凶，以及那些结果对苏东坡的影响，那是不可以忽视的，那是苏东坡跌宕人生的根源。

根子已经深深的扎下，火是烧不尽的。

宋以南北分水，北宋多文学家思想家，南宋多军事家民族英雄。

苏东坡开一派豪放词风，领袖百家，彪炳千秋，大家都认帐的。一个蝇营狗苟的人，一个鸡肠小肚的人，一个求锥末之利的人，写出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写出了“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那就怪了。

言为心声，文乃心血。

君子坦荡荡的苏东坡，所以写得出那些抗暴的诗，所以写得出豪放的词，所以写得出行云流水的文章，甚至他的奏章、他的书信，也是耿耿然堂堂然的东坡风格。“乌台诗案”和苏东坡死后不久的“元祐党人案”，毁了他多少抗暴的诗？

以及其他宝贵的文章，谁也不得而知。

这是文学和历史的双重遗憾。

明知要获罪，却偏偏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仅仅以他旷达的人生观来注释，其实只是处在表象阶段，不足以服人的。苏东坡好象也说过，吃了苍蝇，必须要吐出来。天性使然也。而有的人，不但吃了苍蝇，就是吃了一桶狗屎，也不一定要吐的，甚至为了讨好，还要连声说，香得很呢！

千年以来，研究东坡诗文，探讨东坡命运，各种著作，可谓汗牛充栋。然而遗憾得很，苏东坡为什么会平生为文字累？为什么苏东坡所到之地，至今留下的许多故址和故事，都与老百姓息息相关？诸如此类，缺少追根溯源，所以得出的一些结论，大多知其一面而不知其另一面。比如豪放的苏东坡，也有消极厌世的佛老思想；比如说苏东坡的诗文成就卓然，但是他反对变法因而在政治上是保守的；比如说苏东坡的政论文章，虽然也是下了一番工夫的，但不具备理论上实践上的可采纳性，“大抵驰骋其词，以空辩相矜，而言不轨则”。到了近代，梁启超写《王荆公》，为王安石定下了正面的调子，也为苏东坡定下了反面的调子。到了已经被人民和历史否定了的“文化大革命”，苏东坡成了大地主阶级集团的代表，更是被划进了“反革命两面派”的阵营里。

这是不公平的。

对苏东坡不公平。

对历史不公平。

7 苏东坡不保守

苏东坡不保守。

无论厚财货，无论治冗兵，无论课百官，无论安万民，苏东坡振荡涤刷的变革纲领，对于表面承平的北宋，其实下的是猛药，如同反对派所言，苏东坡如果得用，将甚过王安石。

苏东坡的政论文章，以及言事奏章，也不是流俗的策士之辩，最早给他戴上流俗帽子的王安石，孤老金陵后，再见苏东坡，却引为知己，感叹苏东坡是治国人才，而且是几百年才出现的难得人物。

王安石清醒了，才认识了苏东坡。而且不仅仅是从文的角度认识苏东坡。

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呢。

人总是有睁着眼睛，却什么也看不见的时候。

苏东坡是个说真话的人，讲道理的人，干实事的人。

说一件事情，并非虚构，历史上确有其实。

元祐四年（1089），苏东坡二次莅杭，江南地区，遭遇水旱之灾，坐席未暖，苏东坡连上奏章，先是乞请赈济浙西七州灾民，得以落实，避免了大灾之后的社会动荡；然后疏浚茅山河和盐桥河，一举两得，解决了治水抗旱和通航，又解决杭州城的淡水水源；然后重修六井，浚开西湖，设公立医院，惩治黑恶势力，忙得不亦乐乎。眼急之事，做得差不多了，苏东坡召集相关人士，博采众议，实地勘察，研制三吴水利大计，奏请朝廷批准执行，以解江南地区由来以久的水患灾害。在接到朝廷批准文件之时，苏东坡同时接到回朝廷任职的诏令。他把希望寄托在继任者林希身上，希望他来落实。因为要开凿龙山，有小人向林希进言，龙山开不得，会冲了你的好运。林希果然把这个利民工程置之不理了。苏东坡回到朝廷，奏请有司督促落实这个工程，奏章却被压了下来，始终也没有人来追究。熙宁之后的北宋，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已为常见之事。但是，数百年的明朝，意图治理三吴水利，从档案文件中翻出了苏东坡的治理方案，拿来就用。

历史真是无情得很。

这个林希，也该说两句的。他与苏东坡，为同年进士，又作为杭州太守的前后任，有很好的交道，诗唱词韵，不绝往来，元祐初，苏东坡升任起居舍人，苏东坡不想在朝廷任职，推荐林希担任这个职务，太皇太后不允，因为苏东坡的推荐，林希被提拔为记注官。苏东坡升任翰林学士时，林希给苏东坡写了贺信，把苏东坡赞美到无以复加的地位：“父予以文章名世，盖渊云司马之才，兄弟以方正决科，迈晁董公孙之学。”

就是这个人，竟是个功名利禄之徒。哲宗皇帝亲政，章惇为相，拟用林希担任苏东坡当年的起居舍人之职，而此时，林希已经是中书舍人了，章惇向他许诺，保证他现有的地位，他就毫不犹豫的倒向了章惇，因为苏东坡已经彻底失势了，而且已经被贬谪岭南。至此，无情打击元祐名臣的所有文告，都由林希以哲宗皇帝的名义草拟。

苏东坡再贬惠州的文告，就出自林希手笔，竟把苏东坡诋毁成十恶不赦的罪人：“朕初即位，政出权臣，引轼兄弟，以为己助，自谓得计，罔有悛心，妄图大恩，敢肆怨诽。……乃代予言，诬诋圣考，乘父子之恩，害君臣之义，在于行路，犹不戴天，顾视士民，复何面目？……”在林希草制苏辙由汝州再贬袁州的诰词，把东坡兄弟更是贬得一钱不值：“父子兄弟，挟机权变诈之学，惊愚惑众……”

这样的人，苏东坡遇到的不止一个，章惇即是其中之一。苏东坡坦荡荡不设防，别人却二心待他，一看他不得势了，即刻就掉转枪口，向他开枪。在以后的文字里，我还会说到的。

连接到林希插曲之前的文字上，变法、革新、革命，我们不能仅仅以这样的口号或者旗帜，为是非标准，它很有欺骗性。

得看它的目的。

得看它的过程。

得看它的结果。

王安石的新法，刚一出笼，就遭到了绝大多数朝廷重臣的异议，甚至不惜以辞官归隐表示抗议。应该说，王安石的意图，是要解决朝廷捉襟见肘的财政危机，想法的确是美妙无比的，但是所有新法的方案，并没有经过充分讨论，取得相对一致的意见，很不完备，施行的流程，也不完善，有很多空子可钻。后来的事实证明，新法的缺陷，不是一处两处的问题，是全方位的。用苏东坡的话说，新法就是穷尽一切手段，在百姓身上刮钱，而富有朝廷。这与苏东坡的富民强国理念，水火不融。事实也是如此，熙宁年间，朝廷的财政，的确增收了，但是百姓却破产了。甚至到元祐时代，司马光当政，尽废新法，在金陵舔食伤痛的王安石，也只是对废除免役法有异议，王安石到了庐山之外，才看清了庐山的真面目，他说，其他法都可废除，惟免役法不可废。这居然和苏东坡的想法不谋而合。

新法的失败，有两个致命的因素，一个是新法维护的是皇帝之家天下的利益，丧失了国之根本——民心；一个是听不得不同意见，谁有异议，就被无情打击，让吹牛拍马者钻了空子，而青云直上，而权重朝廷，至于王安石本人，最后也遭到了无情打击。

所以口号是没有意义的。你看我们现在揪出来的那些贪官，在台上反腐败，无不比正人君子

还正人君子，揭开盖子，里面之龌龊，令人作呕。

在研读东坡诗文的时候，再研读东坡为民代言的奏章，很多人会为自己轻率的结论汗颜。

苏东坡领袖百家的诗文，是他的坎坷的命运铸就的；他的坎坷的命运，是他的满怀的抱负铸就的。一个生活安逸的人，一个仕途腾达的人？写得出传世作品？除非等到太阳从西边出来，而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必须要进入苏东坡的政治世界。

政治和文学，从来都是血肉联系的。

没有纯粹的文学。所谓纯粹的文学，只是陶醉在个人的风花雪月里而已。也只会如此而已，也只能仅此而已。

第三章 贤良方正直言极谏

8 仁宗的政治遗愿最终打了水漂

二十二岁的时候，苏东坡已经成家，但是还没有立业。

苏东坡有治国平天下的大志，所以和兄弟一道，在父亲的率领下，走出蜀中小城眉山，过成都，穿剑门，越秦岭，用了三个多月，途中还累死了一匹马，也得到了好几个寺庙的僧人的救助，磨破了多少双草鞋或者布鞋，那时肯定是没有皮鞋的，闯进北宋的首都，参加科举。

我以为，有一个事情我们不可忽略了，需要探勘清楚，那就是东坡的“赶考”路径，才能帮助我们看清楚苏东坡的全貌。

这需要说到四川的相关历史，以及苏东坡的家史，以及大宋王朝的科举。

四川，苏东坡的出生地方，李白说过：“噫吁戏，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很长一段历史里，因为四境是天然生成的屏障，与中原相比，躲过了许多杀戮，偏安于西南，蜀人遂有独立天地的思想；成都平原水沛土肥，四野山乡物产富饶，经济上颇有自给自足的满足，蜀人遂有乡土之恋，不愿背井离乡闯天下。历史上，有宋以前，蜀人有名于文治武功者，实在寥寥。张艺谋为现在的成都做宣传片，提炼的关键词——成都，一个来了就不想走的地方。说明成都宜居，宜居的要素，是多方面的，吃得舒服，住得舒心，耍得舒畅，闲得舒坦，等等，都是宜居的

元素。

苏东坡的始祖，定根于蜀之眉州，需要说到武则天时候的张宗昌和苏味道。张宗昌是武则天的佞臣，少有文名的苏味道，后来亲附张宗昌，宦途于是得意起来。张宗昌倒台后，苏味道贬谪到蜀中眉州做刺史，迁成都长史，未赴任病死。他留下一个儿子在眉州，成为眉州苏姓氏族之始祖，至于苏东坡诞生，已然三百余年了。而有据可考的是，苏味道以后，眉州苏氏，五世不为官。苏东坡的弟弟苏子由，为其伯父作的墓志铭说：“苏氏自唐始家于眉，阅五季皆不出仕，盖非独苏氏也，凡眉山之士大夫，修身于家，为政于乡，皆莫肯仕者。”不仅眉山如此，承继五代之长期战乱的赵宋，一般人都不喜欢读书。

赵宋王朝以兵变起家，为防止赵家遭遇兵变覆辙，赵宋立下国策，建立士大夫政治制度。既然如此，就要广开读书风气，还要为读书人铺开仕途。

遂有真宗皇帝御笔作《劝学篇》而布示天下：
当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建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

真宗皇帝的劝学，天下士子，多被迷惑。而且还有巨大的诱惑，一旦进仕，出路宽广，俸禄丰厚，只要中了进士，就能够做官，一朝做了官，除了正当的薪水，还不时有额外恩赏的灰色收入，不仅自己受益，而且荫及子孙，大宋律例，官至学士以上二十年，一家子可出京官二十人相继承班。无论放在何时，这样的优厚，都是十分诱人的蛋糕。

苏东坡的父亲说：“自唐之衰，其贤人皆隐于山泽之间，以避五代之乱，及其后僭伪之国相继亡灭，圣人出而四海平一，然其子孙犹不忍去其父祖之故以出仕于天下，是以虽有美才而莫显于世；及其教化洋溢，风俗变改，然后深山穷谷之中，向日之子孙，乃始振迅，相与从宦于朝，染其才气则既已不若其先人，质直敦厚，可以重任而不疑也。”

这是苏洵写在《苏氏族谱·后录》里的话，应是不假。这股风气，吹到偏安的蜀中，所以能吹动五世不官的苏家，原因不止是朝廷的优厚诱

惑，还有大宋一直对蜀施行的苛政，让蜀中百姓艰困已久，我在后面的文字里将做叙说。此时的苏家，日子也呈王小二过年的态势了，需得换一种活法。苏东坡的伯父，苏洵的二哥，生于真宗咸平三年（1000）的苏涣，于仁宗天圣二年（1024）高中进士，当时是轰动了全蜀的，开启了苏家人出仕的大门。

曾巩有文为证，他在为苏东坡的爷爷的墓志铭里说：“蜀自五代之乱，学者衰少，又其乡里皆不愿出仕，君独教其子涣受学，所以成就之者甚备。……至涣，以进士起家。蜀人荣之，意始大变，皆喜其学，及其后，蜀之学者至千余人，盖自苏氏始。”

哥哥好学，而且开了很好的头。弟弟却好耍。苏涣苏洵两兄弟，性情大不一样，结果也大不一样。苏洵发愤读书，已经二十七岁了，《三字经》上都说了的：“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苏洵也参加过科举，而且雄心勃勃，却未有他的哥哥幸运，屡试而屡败。虽然也有人，比如张方平，比如雷简夫，甚至欧阳修，也引荐过他，举荐过他，却并不如愿，直到年过半百，依然无功无名。他不得不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两个儿子身上，苏东坡和苏子由，也真还没有让父亲失望。

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7月，苏家父子三人，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走进京都。8月，尘土还在，疲惫未消，兄弟二人走进了景德寺，参加举人考试。都上了榜，都拿到了参加进士考试的入场券。苏东坡还得了第二。次年正月，兄弟二人同时踏进礼部的考场。后来人说，苏东坡以一篇雄辩滔滔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而名动京师，而被欧阳修伯乐识马，从此踏上北宋的政治舞台。

事实并没有那么简单，苏东坡参加的礼部考试，欧阳修在其《归田录》中有过记载，那次考试，锁院五十天。那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战役。考题也不简单，诗、赋、论各一篇，时事策五道，这是宋代进士考试的硬规定。诗和赋，考的是词章文采，比的是文化功底；策和论，考的是实学见解，决定其上榜还是落第。

礼部考试，苏东坡考了第二名。

他的文章，不仅是振动而且是震撼了主考官。欧阳修读了苏东坡后来奉上的答谢书，很激

动的对人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他与儿子讨论一篇文章后，郑重的对儿子说：“更三十年后，无人道着我也！”弟弟苏辙也榜上有名。

三月，仁宗皇帝亲御崇政殿。

三月二十四日放榜，眉州苏轼为榜眼，建安章衡获状元。苏辙以及小时候就一起读书玩耍的同乡家定国，以及后来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同登进士榜。

苏东坡是幸运的，因为欧阳修作主考官，他力图扫除靡靡文风，不然的话，苏东坡的命运，或许会重蹈父亲的覆辙。不拘泥声律句读的苏洵苏老泉，曾经屡试而不中。苏东坡在《眉州远景楼记》里，写眉州读书的与众不同，从中可以找到苏老泉屡试不中的根由，其文曰：“始朝廷以声律取士，而天圣以前，学者犹袭五代之弊，独吾州之士，通经学古，以西汉文词为宗师。方是时，四方指以为迂阔。”

苏老泉考不中，就不足为怪了。如果不是欧阳修推进古文运动，苏东坡兄弟，同样也会考不中，机遇于人生，相当重要。

苏东坡的考试，却还没有完。考中进士，可以等待做官了，他还没有等到分配，就奔母丧而回蜀，三年后返回京都，参加吏部的任职考试，经过笔试和口试，授河南福昌县主簿，弟弟苏辙授河南渑池县主簿。他们都没有去上任，因为他们分别得到了欧阳修、杨乐道的举荐，要参加由皇帝特招而特试的制科考试，接受皇帝的亲自策问选拔。

宋朝制科考试，属于天子选材，每次考试，不超过五人，兄弟二人同时被推荐，史上无二，也说明他们的才华已经被人赏识了。

接受皇帝特选，当然很隆重很严格。宋朝制科，要考三轮：一轮是缴进辞业，二轮是秘阁六论，三轮由皇帝策问。

按规矩，苏东坡先送上五十篇策论给两位当朝丞相“看详”，被平定等级后，方能进入下一轮考试。这次考试，时间跨度长达一年，从1060年8月被推荐，缴进辞业，到第二年8月下旬，殿试才结束。

1061年7月，兄弟二人同时进入秘阁，参加“六论”考试。

“六论”很严，肚皮里如果是一包草，除非

遇到同样是草包的考官，很难过关。这一次领衔的考官，是大名鼎鼎的司马光。按宋朝不成文的规矩，谁是主考官，就有称师傅的资格，苏东坡兄弟，也应是司马光的门生。所以，元祐时，司马光主政，起用苏东坡兄弟，是有缘由的，司马光晓得他们的才华。

“六论”还有特别要求，每论不少于500字，而且必须在一天一夜内完成。

8月25日，仁宗皇帝亲试策问：“贤良方正直言极谏”。

考题本身，并不这样简单，给了考生500字的材料，要求对策字数不少于3000字，当日完成。苏东坡“敢以微躯，自今为许国之始”，下笔如涌泉，行云流水，恣意汪洋，行满腔热忱书写抱负，痛快淋漓指点国是。最后经过皇帝圈定，仅有四人有幸参加的此次制科，一人被黜落，三人中选，苏东坡兄弟二人皆中也，另一人为著作佐郎王介。

宋之制科分为五等，苏东坡获得三等，苏辙、王介为四等。

苏辙的四等，还经历了长时间的曲折，主考官司马光力主列为三等，一位副考官却认为该黜落，理由是苏辙的答策问出言不逊。皇帝差官重定，也要剔除苏辙。司马光据理向皇帝说，苏辙指陈朝廷得失，无所顾虑，最为直切，如果因此而被排除在外，蒙羞的是皇帝宽宏英明的声誉。司马光把苏辙的答问策拿给皇帝御览。仁宗皇帝看了，批示说：“此卷，其言切直，不可弃也。”皇帝又做了一个折中，降一等列为四等。

有宋以来，制科之第一、二等，皆为虚设，未曾有人中的。即使三等，苏东坡之前，只有一人享过如此殊荣。到苏东坡通过制科考试，加上他们兄弟二人，也仅有十五人。

所以说，苏东坡是百年才出的一个人物。

仁宗皇帝喜不自禁，对皇后说，我已经为子孙选好了两个宰相人物。

如果这是仁宗皇帝的政治遗嘱，最终却打了水漂。

仁宗之不幸也，宋之不幸也。

到了这个时候，而非考中进士之年，三苏父子，方以文章盛名，震动朝野，士子竞相以东坡文章为师法，新作一出，即被人传抄。

我在这里找寻东坡科举的路径，是要说苏东坡的文章本事、制策本事，不是浪得的虚名，不

是象王安石说的，苏东坡只会策士诡辩，很流俗，他说如果考官是他，他决不会录取苏东坡。

高高在上的王安石，有点狐狸吃葡萄的醋酸心理。他后来下了台，在金陵驴背吟诗了，苏东坡也离开了黄州，专程去看望他，两人交流，居然甚是得意。王安石还劝苏东坡就在金陵附近安居，便于你来我往，两人颇有相知恨晚的意思。苏东坡在金陵安居未成，不得不离开金陵时，王安石很是怅然，对随从之人无限长叹，说苏东坡是：“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对于当初的矛盾，都生出了悔意，因为都是庐山外的人物了，才看清了庐山的面目。遗憾得很，世间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后悔药。设若当年两位历史巨人，能够求同存异，能够在批评中认识真理，携手治宋，北宋又该是怎样的局面呢？

历史也没有设若。

且说苏东坡，虽然经过了皇帝的御试，因为毫无官场背景，且不善伪装自己，不会做墙头草，在封建派系如犬牙交错般制肘的皇权社会里，注定了，要风雨兼程，注定了，要坎坷跌宕。苏东坡金榜题名后，依惯例向各位考官写了答谢信，他在写给权同主考官之一的翰林学士王珪的《谢王内翰启》，有两句率性的真言，却不幸成了他跌宕人生的谶语，其言曰：“顾唯山野之见闻，安识朝廷之忌讳。”

王珪，成都人氏，本是苏东坡的四川同乡，后来却成为打击苏东坡的重要人物之一。苏东坡在黄州的时候，神宗皇帝多次有意要起用苏东坡，都被王珪阻止了。说苏东坡有不臣之心者，就是他。他举报给神宗皇帝的证据，就是东坡之诗：“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本是同乡，又是老师，王珪为什么要阻止苏东坡出头，追究起来，原因不外两方面，一则要保护自己的官帽子，他是著名的“三旨相公”，说他在朝廷里只会说“取圣旨”、“领圣旨”、“已得圣旨”，所以是北宋政坛的不倒翁，他并没有为新法出多少谋划，他最善于随风而动。二则是他的心理有问题，是著名的“至宝丹”，就是写诗作文，好堆砌金玉锦绣的辞藻，素有文名的王珪，当然不愿意自己的同乡后辈超越自己，虽然一代宗师欧阳修都断言了，苏东坡将超越自己而领袖百家。所以元祐时期的所谓蜀党里，没有王珪，要说资历，他才是最老的，要说官职，他是拜过相的。

似乎可以说说苏东坡的名和字，以及一则谜语，这也与他后来的命运有关。或是确有出处，或是后来人善意的编撰，其实不重要。

据说，苏东坡生下来，并不安静，又蹬又踢，且哭且闹，苏洵为之取名轼，字子瞻。轼者，车前横木也，登高望远之依托；瞻者，望也。屡试不中的苏老泉，把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了。可他又担心，这孩子外露不饰，要受曲折，象车前的横木，全盘的裸露，还要随着车子的颠簸而颠簸不已。苏老泉后来有“名二子说”的短文，记录了这个说法。

谜语有无出处，我有些怀疑。苏东坡姐弟三人，年少的时候，在院子里玩耍，各人出一则谜语让人猜。

小弟苏辙——

我有一间房，一半租与转轮王。

平日都不见，用时闪金光。

姐姐苏八娘——

我有一只橹，一面摇橹一面牵。

别时拉纤去，归时摇橹还。

苏东坡——

我有一张琴，琴弦藏在腹。

为君马上弹，弹尽天下曲。

他们后来的命运，都暗合了各自的谜语。我在暗想，这些人生谜语，多半是后世之人，满怀同情的编撰之作。

苏东坡初入仕途之时，以赵匡胤“陈桥兵变”起家，而轻巧建立的北宋，已近百年，乃是所谓有宋以来的全盛时期。但是，苏东坡的眼睛太“毒”，他洞悉出了北宋王朝“百年承平”的金玉其外，他居然敢说当朝“有治平之名，无治平之实”这样大逆的话，而且是对后人评价为北宋最好的皇帝——仁宗皇帝所说。

好与坏，自然是相对而论的，有宋三百年多，仁宗皇帝或许是个好皇帝，不然，苏东坡不敢那样“放肆”，也不会有那么多至今依然熠熠生辉的人物，风骚于北宋的仁宗朝，而在历史的星空里，光芒四射。虽然是皇帝金口玉言，让人指陈得失，但是你敢揭开皇帝的疮疤，划破皇帝的脓包，而且“肆无忌惮”，总是犯忌的。仁宗皇帝果然开明，不但没有治苏东坡的罪，还把他视为宰相之材。

在北宋仁宗时期，思想确实很活跃，不然，

我们的历史上，定会少了一个特别的概念——“唐宋八大家”；我们的历史上，定会少了三苏父子——“一门三父子，都是大文豪”的奇观；我们的历史上，宋之六家，不可能云集在那个时期，群星闪耀，彪炳千秋。

可惜得很，北宋后来的皇帝，一个二个，基因都变异了，并没有继承了仁宗皇帝的胸怀。

9 扁鹊仓公望而惊也

苏东坡敢说，这为他后来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每一次遭遇攻击，敌人都是从他的文字里找事。后来陪同他远谪惠州的王朝云，在别人都说苏东坡的肚子里满是文章时，独说是满肚子的不合时宜。苏东坡且是个心里不藏事的人，有话就要说，且从不吞吞吐吐，而是直指要害。

历史里，敢说的人，好象都没有好命运，只是历史的后来者，把他们从历史里翻出来，在说书里，在戏剧里，在影视里，塑造为一种刚直敢言的形象。

在苏东坡的眼里，大宋已然病了，而且病得不轻，而且不止一种病，是多种顽症集于一身，那些病一旦发作，那是要命的。

要赵宋王朝的命。

苏东坡把数十篇策、论，摆在了当朝的仁宗皇帝的御案上，苏东坡系统的治国纲领，引经据典，以古鉴今，纵横捭阖，雄图大略，涤荡振刷，把仁宗皇帝也震动了，这位当朝已经四十多年，也是北宋王朝天下坐得最长的皇帝，也是启用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的皇帝，竟说出了这样的“金口玉言”——东坡兄弟是他为子孙选择到的两位宰相人物。这也许算得垂垂老也的仁宗皇帝对子孙的政治交代。就是把苏东坡贬谪到黄州去的神宗皇帝，也称苏东坡是天下奇才。有记载说，哲宗时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对苏东坡说，你的每一篇文赋诗词，神宗皇帝都是读得爱不释手的，甚至废寝忘食的。

“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君子长者之道者，“广恩”“慎刑”之“仁政”也，此乃苏东坡坚守一生的治国安邦的政治主张。

“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这是他的政治主张的理论基础。

如此民惟邦本、君轻民贵的主张，虽非苏东

坡的发明，而是源于孔、孟的“德治”、“仁政”，但是苏东坡敢于向开创了所谓“百年承平”的仁宗皇帝提出来，胆子的确是够大的。

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在“文化大革命”里，孔孟之道，是被视为异端，而被鞭挞和批判的。历史的曲折，总是让人无言以对。

而我们的曲折，还是太多了一点。

苏东坡的主张，并非书生意气，为文而文。

现实的弊端，埋藏着大宋长治久安的祸端，仁宗以前的真宗朝就已经滋生了，到了仁宗朝而日显突凸。在苏东坡的眼里，北宋王朝清明上河图般热闹的背后，其实掩藏着积弱积贫危机四伏的无穷隐患，苏东坡看得很深刻，暂“无可忧之形”——没有“水旱盗贼人民流离之祸”，“乱臣割据四分五裂之忧”，“权臣专制擅作威福之弊”，“四夷交侵边鄙不宁之灾”，而“有可忧之势”——“咨嗟怨愤，常若不安其生”，“休养生息，常若不足以用”，“上下不交，君臣不亲”，“中国皇皇，常有外忧”。而且朝廷上下“怠惰弛废，宴安无为”。

苏东坡于是借西汉之衰，拉响了北宋的警钟：用庸医的眼光看，北宋好象还没有病，而在扁鹊仓公看来，已经“望而惊也”，因为北宋的病已经深不可测了。

苏东坡于是慷慨陈词——

“自宫室祷祠之役兴，钱币茶盐之法坏，加之以师旅，而天下常患无财。”

“自澶渊之役，北虏虽求和，而终不得其要领，其后重之以西羌之变，而边陲不宁，二国益骄，以战则不胜，以守则不固，而天下常患无兵。”

“自选举之格严，而吏拘于法，不志于功名，考功课吏之法坏，而贤者无所劝（受到鼓励），不肖者无所惧，而天下常患无吏。”

苏东坡阅古论今，在签判凤翔时，向当朝皇帝上书《思治论》，一层一层的，毫不留情的，划破了北宋王朝“百年承平”的脓疮。

苏东坡是在用历史说话，而且是用北宋自己的历史在说话。

让我们进入北宋的历史，是苏东坡忧虑的北宋的历史，也是历史记载的北宋的历史。

苏东坡所陈北宋之时弊，乃北宋作茧自缚之必然。

（未完待续，眉山市广播电视台副局长）

刘小川《品中国文人》获两项大奖

编者按：11月30日，在成都举行的巴金文学院第六届“茅台文学奖”颁给了眉山作家刘小川。据悉，茅台文学奖每两年评选一次，一次只评一人得奖，甚至空缺。12月下旬，刘小川又获得“四川文学奖”。

刘小川的获奖作品为60多万字散文集《品中国文人》1、2卷，历时3年完成，书中对苏东坡着墨最多，达5万余字。其它大部分品读文章中也对苏东坡有精彩阐释。

该书自去年5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以来，行销全国，成功输出韩国，并作为优选书目被列入全国农家书屋发行计划。目前，全国各地各行各业都已积聚起了一批刘小川的读者。

巴金文学院 第六届茅台文学奖授奖词

刘小川的散文集《品中国文人》，品读历代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文人18位，时间跨度2300年。作者凭借深厚的知识积累和良好的艺术修养，用全新的眼光打量传统的材料，以崭新的历史文化视角展示自己的发现，融文史哲于一炉，别具一格。

上海文艺出版社给刘小川的贺信

小川同志：

欣闻四川作家协会巴金文学院茅台文学奖授予你创作的《品中国文人》1、2卷，我们作为出版单位对你表示热烈的祝贺，同时也对巴金文学院以如此明确的态度给你这个奖深表谢意。

这些年来，你始终都在坚持不懈地以你的智慧和勤劳在书写着《品中国文人》这样一个宏大的题目，在这个题目下，你以惊人的视野和超人的才智完成了你对古代中国文化人人生踪迹的追寻，对这些杰出文人隐藏在他们的作品当中的文化内涵做出了不舍的探索，而你作为一个当代作

家，也在与这些古代先贤的交流和对话中，展现出了你独到和卓越的境界和才华。作为中国文学出版界的一家老牌出版社，我们对你在写作中所表现出来的顽强精神和不凡的才华深感敬佩，同时也以十分欣喜的态度来出版你的这部杰作。

事实上，这部书自从出版以来，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当中都积聚起了一批你的读者，我们出版的图书也行销全国，今年这套书还将作为优选书目列入全国农家书屋的发行计划，并且还在去年成功地输出韩国。与日本的出版商的洽谈目前也在进行之中。这套书的出版，也得到了新闻出版总署以及中国作家协会领导的肯定。这些成绩的取得都与你始终坚持在这个浮躁的年代当中，很好地以一个文化人的责任与要求严格要求自己，摆正了作为一个当代作家与当前国家快速发展建设和以文化强化国民素质的任务这些伟大目标之间的位置有关。我们十分赞赏你的这个文学和人生的选择。我们更加期待你能在未来的写作中不断地写出更为中央赞许、读者喜爱、市场欢迎、文化需要的杰作来。

特此祝贺，并转达我们对巴金文学奖评委会的感谢！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9年11月26日

青春的激情和力量 ——评刘小川《品中国文人》

张炜

最初，《小说界》上发表刘小川写中国古代人物的系列作品，每发出一篇我就找来读，高兴之余还推荐给朋友。在当代，一本好书要引起相应的好评是很难的，即便是很好的书影响都非常小，通常是出版之后就销声匿迹了。除了特有的时代喧哗之外，还因为好作品常常是属于沉默者、属于未来的。如此下来，嘈杂轻浮的文字固然难以留下来，但即便是优秀的作品，也只有极少数

能够得以流传，被大家所收藏和珍爱。

刘小川的作品能够引起反响不是偶然的，这是由非同一般的个人品质所决定的。他的性格都表现在作品中了，于是这些文字让人眼前一亮，从此记住并且追踪下去。想想看，这本书中写了18位著名的古代人士，而他们又是中国文化史上被人议论最多、关注最多的人物，哪个都不寂寞，电视报刊网络，更有众多的出版物，都在不断地重复和议论他们的事迹、推出他们的个人文集和有关的著述，总之已经非常热闹了。所以围绕他们，已经很难再写出新意，也很难找到一个新的视角，攀上一个新的思想与艺术的高度。小川这次是将自己的生命沉浸于历史长河之中，这种畅游与激动的过程，终究不会与他人重复。

《品中国文人》一书中的好多篇章我都读了不止一遍，比如《嵇康》，每次打开都愿意咀嚼一番。这些文字为什么能够吸引阅读？其中或有奥秘。事实上在研究历史资料方面，比小川有学问和积累的人可能很多，但我们知道，仅仅靠拥有资料的丰富、靠知识的渊博恐怕还远远不够。这里更需要胆识和自由，需要才华，而在这些方面小川恰恰是具备的。他能够自由进出这个世界，这是资料和学术的世界，更是心灵的世界。

说到写作，现在的惯常做法是把自己掩藏于文章，而小川却敢于把自己摆在第一线，交出自己的血肉之躯。他常常使用大段酣畅淋漓的、不无尖利和莽勇的评议，把一腔热血喷洒出来。对于他这样的“热血中年”，读来实在不由得让人产生阵阵感佩。这种文章优长，当不是老到的文笔、丰富的写作经验和深厚的阅历所能够弥补的，而是个人的品质和勇气、立场和道德自然生发出来的。所以在没有和小川见面之前，每次读来，也都能感觉到是一个什么样的作者在与我们对话。这种真实的对话在当代是非常珍贵的。偏激与否是一回事，怎样的偏激又是一回事。平庸有时也需要偏激来掩盖一下，但青春的真诚和力量却一定会抵消偏颇之憾。

读这些文字，有一股“悍气”扑面而来。这种“悍气”很多时候会引起读者的排斥，但这里却更多地表现出一种生命的真切、个性与质地，这也正是让人喜欢的地方——他把自己放在第一线，带着这个时代的所有焦虑、不安、问题、愤怒、忧伤和诸多的喜悦，来和古人今人对话。

这种古今碰撞是了不起的，所谓的时代高度，也就是如此。除了“悍气”，文章还始终有一股正气贯穿着。正气充盈，感时忧世，如今还有什么比这一点更重要更稀罕？

此外，文章诸事，作者所置身的“气场”总是非常重要。眉山这里不愧为“三苏”之地，文气盛大，土壤肥沃，作者有幸生活在这里，于是即被包围其中。这才是巨大的襄助之力，因此他才写出了这般好文章，获得了如此大幸福。

（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著名作家）

获奖感言

各位领导和嘉宾：

下午好！

今天我非常幸运，能站在这儿谈几句获奖感言。《品中国文人》获得了巴金文学院最难得的奖项：茅台文学奖。我的兴奋可想而知。这个奖的份量我是知道的，它两年评一次，每次只奖给四川的一个作家。非常感谢朱丹枫副部长、阿来主席、吕汝伦书记，感谢茅台酒业集团，感谢徐康、傅恒副主席和所有的评委！

去年九月，我的家乡眉山市为《品中国文人》举行了研讨会，市委蒋仁富书记亲自参加，山东作协主席张炜老师抱病而来，魏心宏副总编专程从上海飞来，省作协的几位领导也到会祝贺。这对我是很大的鼓励。

我是一个埋头干活的人，每天早晨五六点钟就开始干了，几年如一日。写作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脑子里每天都有新东西。写作让人活蹦乱跳。如果作家在书房里的兴奋能够辐射开去，让全国各地的读者兴奋，并在兴奋中思考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那对作家而言，就是莫大的幸福了。

《品中国文人》是在2006年的夏天开始写的，18个大文豪，从战国写到民国。出版社的要求，是在一个月的时间内，以三万字左右的篇幅写透一个文豪，还要写得好看。这对我是前所未有的挑战。开篇写《屈原》并不顺利，三易其稿。后来逐渐上路了，探索了一种文本样式，也许融会了文史哲，对古人尝试着作了一些生存阐释和心理分析，把活生生的传统精英文化带到当下。两年的时间里，我与魏心宏老师通了一百多封信，电话交流无数。上海人讲究效率，我这个长期待

在四川的人也不得不加快节奏。不过我写不快，每天在电脑前干五、六个小时的活，只能写1000多字。

今年我49岁了，终于有了一个优点，能把获得荣誉的兴奋很快转化到写作中去。现在我全力以赴写长篇传记小说《苏东坡》，这个长篇小说系列已由上海文艺社报给了中宣部。更大的写作压力，使我做梦也在构思，几乎生活在宋代。10年前我写《苏轼：叙述一种》，巴金文学院就给我发了奖，今天又再次鼓励我，颁给我茅台文学大奖。我也不多说，千言万语归于一个词：埋头苦干。

谢谢大家！

刘小川

2009年11月30日成都

在四川文学奖 颁奖大会上的发言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志们：

上午好！

我所创作的散文集《品中国文人》1、2卷，获得了第六届四川文学奖，为此我深感欣慰。获此殊荣，我首先要感谢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作家协会的领导和各位评委！

去年五月，《品中国文人》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向全国隆重推出，发行量巨大，并且翻译到国外。迄今为止，许多地方都聚集起了一批《品中国文人》的热情洋溢的读者，其中包括大量的80后、90后读者，这使我在欣慰的同时深感到作为一个当代作家所担当的责任。

简单地说，我创作这部书的目的，是要把起于屈原、止于鲁迅的2300年间的18位大文豪写得血肉丰满，点评他们的文化创造带给中华民族的贡献与缺失，把活生生的不可替代的中国传统文化带到当下。

今天，文化建设被提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软实力受到空前的重视。作为一个当代作家，有义务也有责任，把一批又一批的中国历史上的精英人物展示出来，向世界亮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我来自宋代大文豪苏东坡的故乡眉山市，我家就在三苏祠附近，四十年来搬了三次家，一直围着东坡老家转。现在我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愿望，通过更为紧张的埋头苦干，三五年强行军，写好

已在进行中的《品中国文人》3、4卷，和“中国历代文人长篇传记小说系列”。如果我的写作能让越来越多的读者爱上李白、杜甫、苏东坡、李清照、陆游、曹雪芹等许许多多光耀千秋的文化先贤，那我就感到不虚此生，感到非常的幸福了。眼下，我正全力以赴写三十几万字的长篇传记小说《苏东坡》，明年动笔写长篇小说《李白》。

这些年，我的写作受到省市各级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使我得以潜心创作，借此机会，谨表由衷的谢意！

谢谢大家！

刘小川

2009年12月11日

(上接60页)

这则逸事亦是一篇很好的杂文。在题跋后有一长方形印“东坡居士、老泉山人”。

卷二为苏轼《清虚堂诗》(即《兴龙节》)。《兴龙节》共220字，是苏轼喝醉酒时所书，写得酣畅淋漓，一首诗中出现了楷书、行书、草书三种字体，或端庄，或流丽，或狂放。黄庭坚对苏轼的这幅书法特别赞赏，他每天早晨起来，便令童子在苏轼这幅字前焚香；自己每次经过，都要恭恭敬敬地作揖。黄庭坚在评价《兴龙节》时说：“此二百余字，即东坡醒时不能复作，应作二百几十颗明珠观，世间亦有东坡字，不能得其醉中书。东坡能得一生几醉？”意思是苏轼只有喝醉了酒才能写出这样的字，等他醒来时再也写出这样的字了。此帖字字珠玑，世间少有，苏轼一生再也没有如此的墨宝了。

卷三、卷四汇聚了宋元明诸大家共七帖，书法风格各异。卷三黄庭坚行书《梨花诗》、《呈外舅孙莘老诗》，用笔遒劲有力，体势雄秀疏朗。卷三米芾的行草《露筋碑》，潇洒舒畅，妙趣横生。卷三秦观的草书《荻款帖》、卷三秦少章的《喜闻帖》，用笔丰腴宕跌，顿挫沉着，挥洒淋漓，气韵连贯。卷四赵孟頫书张耒《送秦少章序》，珠圆玉润，典雅秀丽。卷四董其昌书秦观《满庭芳·山抹微云》，自然秀雅。

(四川省眉山三苏祠博物馆)

儋州市将举办东坡国际文化节

本刊讯（流水）10月20日下午在海南海口市文华大酒店举行了“儋州东坡国际文化节恳谈会”。继成功推出调声、山歌后，儋州市将在明年3月举行为期3天的“儋州东坡国际文化节”。

据悉，儋州东坡国际文化节期间，将举办苏东坡游学会，国内外文化大师、学者将举行论坛并讲学。还将举行敬师大典、苏东坡书画笔会以及“风生水起——2010东坡之夜”大型演艺节目。

在今天的恳谈会上，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秘书

长蔡心华、海南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周洪晋、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海南省文联主席韩少功等近20位省内外专家学者，为即将举办的儋州东坡国际文化节的活动方案及东坡山水文化旅游区的建设规划，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

儋州市市长张琦表示，该市将对东坡文化进行深入挖掘和整理，并通过多种形式，打造具有儋州特色的东坡文化品牌，进而提升儋州的城市品位，扩大儋州在国内外的影响力。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首任会长

杨明照诞辰百年学术研讨会召开

本刊讯（任俊）在中国苏轼研究学会首任会长、中国《文心雕龙》协会原名誉会长、四川大学终身教授杨明照先生诞生100周年之际，由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举办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第十六届年会暨杨明照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

念学术研讨会”于2009年11月21-22日在成都金河宾馆召开。

国内外各高校、科研机构的160多位与会专家学者出席研讨，缅怀杨明照先生一生对中国古代文艺思想研究作出的突出贡献，共话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

弘扬苏学打造品牌 挖掘文化发展旅游

黄冈市东坡文化研究会成立

本刊讯（白水）12月1日（阴历10月15日）是苏东坡创作《后赤壁赋》927周年纪念日，黄冈市东坡文化研究会隆重成立。

黄州是苏东坡登上艺术顶峰的发祥地，他谪居黄州四年零两个月，自称“东坡居士”。黄州优美的山川风物、厚重的人文氛围，与苏轼特殊的人生经历和坎坷的仕途境遇碰撞，灵光闪现，创作喷发，留下了以“一词二赋”为突出代表的诗词文共753篇（首），以《黄州寒食帖》为突出代表的大量书画作品。

黄冈市委、市政府倡导并成立东坡文化研究

会，拟以此为平台，以整合资源、加强研究，尤其是东坡文化研究，以提升软实力，促进社会经济、文化旅游的发展。据悉，明年10月下旬，黄冈将举办苏轼宦游城市市长峰会暨东坡文化国际论坛。

湖北省领导、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秘书处、香港文汇报董事长等发来贺电贺词，经推选，涂普生当选首任会长、张龙飞任常务副会长。